歷史教學

LISHI JIAOXUE



一九五九年 7

中国現代史参考图片（十二）

（中央革命博物館供稿）



图　一



图　二



图　三



图　四

1948年5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的、沒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議，討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主张迅速获得全国人民的响应。1949年4月国民党反动統治正式复灭之后，經过数月的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于1949年9月21—30日在北平举行了第一届全体会議。会議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共同綱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組織法”，选举了毛澤东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会委員。〔图一〕毛澤东同志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議上致开幕詞；〔图二〕全体会議通过各項决議；〔图三〕毛澤东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全場起立致敬；〔图四〕为了紀念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議决議在首都北京天安門前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圖为毛澤东同志执鍬剷土表示对先烈的崇敬。

歷史教學

·月 刊·

一九五九年七月号（总第103期）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出版

目　录

編輯者	历史教学月刊 編輯委員会	發行者 天津市邮局 訂購处：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册 0.26元 預定价目
		代訂售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三个月三期 0.78元 半年六期 1.56元
出版者	历史教学社 （天津营口道79号）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全年十二期 3.12元

本期印数001——23,160

从曹操問題的討論談历史人物評价問題

——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对中学历史教师的講話——

吳　晗

最近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討論曹操的文章以后，国內各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都对曹操展开了討論。牽涉及的問題很广泛，归納起来有：曹操对統一的作用問題；曹操鎮压黃巾农民起义問題；民族英雄問題；屯田問題；曹操个人的品德問題；对历史人物的評价問題，等等。

既然問題提出来了，各个方面的人对上述問題发表意見，展开討論，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在这以前沒有一个学术問題象"曹操"这样被討論过，这眞是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各种不同意見的人，通过这次論爭，研究了史料，学习了理論。不明确的問題逐漸明确了，有些不了解的問题了解了，过去的一些錯誤看法澄清了，看問題的立場、观点、方法更端正了。因此，这次討論不仅是学术討論，而且是一个思想方法、立場、观点問題的学习和提高。而且，通过这次討論还养成了爭鳴的习慣和风气。这次討論是一个好的开头，以后大家都习慣了，对历史上学术上其它問題也就可以进一步开展研究了。現存的史书是旧史家根据旧观点写出来的，今天需要掌握可靠的史料运用新的观点写出人民所需要的历史。从这一点来說，討論就更有意义了。历史上其他人物的作用比曹操可能还大，但曹操有群众基础，青年以上的人都熟悉三国演义，許多人都通过戏剧和小說熟悉曹操。戏台上只要这个大白花臉一出場，誰都認識他。自北宋起，一千年来，許多小說家、戏剧家、說唱家連續地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定型的人物，給人們很深刻的印象；通过它給了人們一部分历史知識。正因为如此，我們首先就研究曹操。

首先我們研究曹操的大白花臉是誰給他塑造的。有人說北宋时，小孩听三国戏，听到曹操失敗很高兴，刘备打敗仗就不高兴。因此說曹操的大白花臉是人民給的。有人說是統治者給的。我以为两种說法都是片面的。因此在北宋以前，沒有什么人說过曹操的坏話，例如唐太宗就把曹操看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大約在十世紀以后，曹操的評价改变了，被說成一个反面人物。这說明是随着时代的轉变人們对曹操的評价才有了轉变的。从宋以来，对魏蜀誰是正統問題发生了爭論。历史上，隋唐繼自魏晋，承認魏是正統。但宋朝情况改变了，北宋的北方有辽、南宋和金南北对立。如以魏作正統，北边的辽、金就成为正統，宋便不是正統了。特别南宋和蜀汉的处境相似，以此朱熹便帝蜀寇魏，以刘备为正統。到元代这种爭論更加激烈，元人要自命正統，又反过来帝魏寇蜀，但民間广大人民和爱国知識分子，不甘心于民族压迫，又通过小說戏曲，帝蜀寇魏，說刘备的好話而大罵曹操。这中間由于封建的正統观念和复杂的民族关系，由于时代的变换，对曹操的評价也就不能不发生影响。現在我們的历史教学也不能不受这一影响，如講通史，辽金的历史占地位很少，便是例子。写小說、戏剧的人也不能不受正統思想的影响。通过小說戏剧也影响了人民大众。小說戏剧写得越好，人民大众就越容易接受。这种情况也反过来影响了对曹操的評价。总之，对曹操的評价，統治阶級的看法和人民大众的爱憎是互为影响的。現在我們这一时代的人，应該根据我們的立場、看法有充分的条件根据新的观点来重新評价曹操了。

曹操是怎样的人？他是多方面的人、复杂的人。他是大軍事家，打了几十年仗，当时孙权就很佩服他，說他用兵如神。又是大文学家，他的詩很好很动人。他喜爱文学和文学家，建安文学在中国

历史上有着光辉的地位。当然不能說有了他才有建安文学的繁荣，但是他是起过积极的推进的作用的。他是个政治活动家，从反对董卓，到挟天子以令諸侯、打击豪門貴族，做了許多对人民有利的事。他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他喜欢音乐，善草书，是个艺术家。又喜欢打猎，有武艺，是一个好运动員。他的儿子、孙子都有点象他，爱好音乐，喜欢文学和打猎。他們一家人的兴趣是很广泛的。

研究曹操的人，因为他的方面多，成就大，缺点也多，从各个不同角度去了解，因此，各人的看法不一致是很自然的。要研究討論曹操，首先要去掉正統观点。旧史家不能不用正統观点对待曹操，把曹操看成是乱臣贼子，他挟持皇帝，废掉皇后，在旧时代是了不起的坏事。旧史家不这么說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們这个时代，虽然，正統观点被我們的革命革掉了，在某些人思想中，却依然把曹操看成坏蛋，認为他欺侮皇帝，废除皇后，把刘家糟蹋得不成样子，为汉献帝喊冤，这倒是值得奇怪的。看来汉献帝本身是一个无能的人，他做不了什么坏事，但是他也没有做过什么好事，除了作为皇帝的符号画“詔书”外，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做过。他的地位，是靠曹操的軍力支持的，除了他是刘家子孙这一点以外，別无長处，曹操欺侮他一家子，正如曹操欺侮别的家族一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以此作为曹操的主要罪状，显然是中了正統观念的毒。相反，我們評价一个人要看他对大多数人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我們要从当时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民的感受来估价曹操，而不能用今天的时代、今天的标准来估价他，如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曹操，曹操是一定不及格的，势必非把曹操完全否定不可，这是和当时的历史实际不符合的。因此，有好些文章把曹操完全否定，說得一无是处。

还有另一种情况，把曹操的时代往后拉了，把他說成完整无缺的英雄，說他不仅是民族英雄，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是完整无缺的。另外也有些人把舞台上的曹操和历史上的曹操合起来談，想用历史上的曹操来糾正舞台上的曹操。这样一来，历史戏就会被改得没有了。有了历史，但是没有了历史戏。我認为历史与历史戏有联系，但又应当有区别，历史要符合当时客观实际，不应当有虚构成分，但历史戏則可以有虚构，有夸張，虽然它不能完全脫离历史实际。把二者互相混淆起来也是不恰当的。

曹操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統一了当时部分地区。他打了几十年仗，打败了袁紹、公孙瓚、馬騰，合并了許多小地主武装，打败了烏桓。但是他在208年为了統一东南地区而进行的战争，却在赤壁之战中失败了。后来，他几次想統一东南都没有成功。因此，他只統一了局部地区。統一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时全国大分裂，北方許多軍閥集团互相攻战，形成大混战局面。这个局面造成白骨盈野，人民流散，田园荒蕪，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进行生产，阻碍生产发展。河北的袁紹政权是建立在大地主的基础上，是为大地主阶級服务的。大地主胡作非为，农民为他們耕土地，并被迫替大地主交納很重的租税，生活十分痛苦。曹操平冀州后，和袁紹的做法相反，他抑制豪强，給人民规定一定的赋税，除此以外，地方官不許多征。这就和袁紹除了压迫人民为大地主出租賦外，徭役税收是无限制的情况相反，对当时人民是有好处的。有人說曹操統治区人民的負担很重，不錯是很重，但是要有一个比較，应該說他比袁紹时期輕得多了。統一以后，他兴办学校，让青年能上学。他兴修水利，在北京附近就有他兴修的水利。他防御外族入侵，对人民起了保卫和安定作用。統一对人民来說是有利的，有好处的。不但如此，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曹操的局部統一，为后来晋的統一打下基础，我們現在祖国的大統一局面，如果没有我們祖先的辛勤努力也是不可想象的。也有人認为統一是不好的。他們說如东汉桓帝、灵帝时代，造成人吃人的慘剧。但是看問題恐怕不能这样去看。如果統一时期一切都很好，农民就不用起来斗爭了，也就没有阶級斗爭了，封建社会也就不用推翻了。应該說統一本身是好事，但我們不能把統一时期的某些坏事算在統一的賬上。統一时期的某些坏事主要是封建时代的特点决定的，是阶級压迫的必然結果，并不是由于統一造成了这些坏事。难道統一不如分裂好？而且看問題应当有一个比較，三个小統一的局面总比大的分裂好，从許多軍事首領的割据到形成三国分裂局面也肯定不会如全国統一的局面好。

关于农民战爭問題，是爭論最多的。曹操是鎮压黄巾起家的，他打败黄巾，收編为青州軍。有人說他鎮压农民起义，因此他是坏人；另一种說法是曹操虽然鎮压了黄巾，却継承了黄巾，把黄巾組織化了。这两种看法都不全面，值得商榷。曹操鎮压黄巾是事实，是坏事，不能为他粉飾。那么，是不

是他一件好事都没做呢？好事是好事，坏事是坏事，都不能抹煞。是不是可以将功折罪呢？也不可以。曹操做了許多好事，而且好事比坏事多。因此，他应当是一个被肯定的人物。現在，关于黄巾起义的史料很缺乏，历史上不过記載了当时人民生活很苦，有張家三个兄弟，还有个姓馬的組織起义，后来秘密被洩露了，所以提前起义。他們的口号只有"蒼天已死，黃天当立"。現存史料没有告訴我們黄巾其他的綱領、方針和口号。我們不好說曹操繼承了黄巾，他繼承了什么呢？我們不知道。而且問題也在这里，黄巾是要推翻东汉封建統治的，曹操却并没有要推翻，相反，他是維护东汉封建統治政权的。說曹操的封建政权繼承了黄巾起义，这样說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这里涉及到阶級斗爭的問題，曹操的政权虽然压抑豪强，反对和削弱大地主的力量，但是他的政权还是建立在中小地主的基础上。无論如何，曹操的政权还是为地主阶級服务的，一个为地主阶級服务的政权說他是繼承反对地主阶級統治的黄巾，这种性質不同的情况无論如何是不应該混淆在一起的。黄巾起义虽然失敗，但农民战爭对封建統治的压力，使后来的統治者不能不对当时的法制法令有所改革，这也无論如何不能說成是繼承。但是应当看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管規模大小，时間長短，都失敗了。原因是他們那个时代不可能提出我們現在人所熟知的革命綱領，严密的組織紀律。我們不应該以現代人的意識强加于古代的农民战爭。即使农民战爭把旧的統治打垮了，也不可能建立另一形式的政权。当时农民看到的只是皇帝将軍，他們胜利了，也只能称皇帝将軍，学皇帝将軍办事的方法办事，这是因为他們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受到旧思想意識的束縛的緣故。假如因此而批判农民起义是烏合之众，不进步，諸如此类等等，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

民族关系問題：曹操的时候，中国北部有烏桓，經常引起局部性的战爭。各地方的軍事集团首領为了維护自己的割据，曾依靠过烏桓的騎兵。如袁紹、公孙瓚等都这样做过。曹操打敗袁紹等人后，为了統一北方，当然一定要打烏桓，結果是把烏桓平定了，巩固了北方边疆的国防。但是当时烏桓的力量并不是很强大的，它和前代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和后来的契丹女眞都不能相比，他不可能吞并全中国或中国的北方，它只是不断在北方騷扰搶劫，給人民带来一些麻煩。曹操平定烏桓对人民有利，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我們却不能把这件事夸大，說成曹操不打烏桓，中国就有了民族危机，因此就称曹操为民族英雄。其次，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烏桓居住的地区没有內战，汉人居住的地区却是战乱頻繁，北方边疆上有些人曾向烏桓那边迁移，希望能在烏桓那边获得安定的生活。但是我們却也不能因为有这样的事实就說当时的烏桓比汉人进步。

屯田問題：屯田是个軍事措施，曹操要統一中国，对孙权作战，首要的問題是要解决軍粮問題，因此曹操在淮南、河北、許下等地区采取屯田措施。屯田的好处是可以解决軍粮問題，減少軍运的困难，这是有具体記載可以根据的。同时，屯田也減輕人民的負担。有人認为屯田戶的負担很重，把他們变成了农奴。其实，根据历史記載，我們知道屯田戶的負担是对半分粮，使用官牛的也不过四六分。这样的負担在历史上比較起来是不算重的，如和北宋比，北宋时的官田也是对半分或四六分，基本上相似。也不能把曹操时的屯田戶說成是农奴。有人認为汉朝的人民都是奴隶，曹操屯田，把奴隶变成了农奴，是前进了一步。有人認为屯田是改变了社会性質，这些說法牽涉及社会性質問題，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要得到大家一致的同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无論如何屯田开墾了荒地，使粮食增产了，这总一件好事。

曹操杀人的問題：曹操杀了不少人，著名的例子，一个是打徐州。他的父亲曾經过徐州，徐州牧陶謙派人护送，送的官吏杀掉了曹操的父亲，后来曹操攻徐州，杀掉了許多人，历史书上的記載是杀得鸡犬不留。另一个例子是打袁紹。官渡之战后，曹操坑杀了袁紹的降卒八万人。其他如曹操杀了名医华陀，杀了楊修，都是人所共知的杀人事迹。杀人好不好？当然不好，但具体說是有着不同的情况。古时候打仗用刀枪弓箭，不杀掉对方打不了胜仗，因此在战爭中总是要杀人的。但是在战爭結束后的屠城行为則是另一回事。曹操的軍法是"围而后降者，不赦"。这一点是无法为他辯护的。有人为了替曹操翻案，說曹操杀的人没有那么多。其实这不是数量多少問題，而是該不該杀的問題。不該杀的人即使杀几个也是罪恶。反之，另一种情况，例如杀孔融，后人的反感很大，杀楊修也是如此。其实曹操杀的是政敌，孔融、楊修都是名門大族，在当

时很有威望，曹操自己是宦官之后，比不上孔、楊，为了打击名門大族，他把孔、楊杀了，这是政治斗爭，以这些例子来责备曹操，立場站在当时名門大族这一面去了，这也是不对头的。应該把曹操杀人問題区别分析，有人想替曹操的杀人辯护，这是沒有多大意思的。

根据上述几个問題的分析，我們应当說評价历史人物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要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而不要凭自己的爱憎，美化古人或丑化古人。如果有人特别喜欢曹操，給曹操写了一本书，写一个戏，书中写曹操是一个大好人，这我們自然不能反对，但这个曹操却只是某个人的曹操，不是大家所公認的曹操，不是历史上眞正的曹操。反过来說也是如此。

拿曹操和他同时代的人比，他比孙权、刘备都要高明。他想統一，沒有完全做到，只做到了部分的統一，但对历史的发展还是有其貢献的。曹操是第一流的軍事家，他很会打仗，他研究过孙子兵法，并且发揮了它。曹操又是第一流的文学家，他对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对文体的解放起了作用。他提倡新詩，建安文学是在他的統治地区形成的。有人說建安七子中的王粲早先不是曹操的人，在荆州时已写下很多詩了。但不管怎样他后来是到曹操那里去了，并且継續写詩，受到曹操的器重。曹操也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家，是法家这一派的，他懂得用法貫徹他的政治方針；他善于用人，用人的原则是凡有本領的都要，不管其私生活如何，因此曹操手下的人多数都不是大族出身，都是很能干的人，这样也就加强了他的統治机构。他这种做法对东汉以来的名門大族政治、乡选里举的清議是很大的反抗，在政治上是极大的改革。在政府的組織方面，魏晋以来，"政归台閣"，曹操采用中书监令管机密事务，这些机构里掌握实权的也不是出身于名門大族的人，这一制度对后来的发展也有着長远的影响。

曹操的罪过是不小的，鎮压农民起义是一条，杀人也是一条；但是从全面来評价曹操，应当說他是功大于过，对历史是有过貢献的，算得上是个历史人物。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也不是一个万恶的人。

对于历史人物的評价，我們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那就不会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那是因为今天的实际情况不同于历史上曾經存在的实际情况。应当把我們的今天和历史上的昨天前天有所区别，但是又应該把它联系起来，历史的发展不能切断。不这样看，就会把我們祖宗的臉完全給抹黑了。要看到今天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土地，都是历史上留下来的遺产，我們是我們祖宗的好子孙，不但継承了他們的事业，而且发展了，提高了，超过了他們。我們的事业是我們前人所不能想象的，我們对我們的时代、我們的事业感到自豪，也对我們的祖宗的成就，他們的英雄业績感到自豪。我們对于历史人物应当还其本来面目，还其历史实际，学习他們的長处，吸取他們的經驗，使历史为今人服务，古为今用。

有人提出这么一个問題：我們講我們祖先的光輝事迹，是不是会掉入个人迷信的泥坑呢？我認为这也不必顧慮，因为根据历史客观实际表揚历史上的好人是好事情，并不是坏事情。現在有些研究历史的人怕提到个人，講課編书时把个人講得越少越好。其实把人从历史上去掉，历史也就講不成了。眞正对历史起过进步作用的，或对历史起过破坏作用的，我們都应当講，因为去掉了对立面，阶級斗爭的历史也就写不成了。

再有一个問題是打破王朝体系的問題。打破王朝体系好不好呢？很好。但是有人認为打破王朝体系就是把王朝和封建統治者都从历史上抹掉，这样做就不对了。我們应当感謝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了最丰富的史料，封建时代有史官記載历史，这是个好的傳統，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很少有的。当然，旧的史料在立場观点方面是有問題的，我們应当以新的观点去分析批判。例如曹操的史料并不很多，主要的問題是个观点、立場問題。西藏問題发生后，我們大家对西藏就注意起来了。从史料里我們知道西藏是中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有关西藏的史料全在我們这里。

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学习历史，这話不仅是对历史工作者說的，而是对全国人民說的，因为历史是經驗的总結，是阶級斗爭和生产斗爭經驗的总結。我們不但要了解祖国的今天和明天，而且也要了解祖国的昨天和前天，从而了解整个历史的发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前途，百倍信心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

我对历史教学中怎样評价曹操的看法

青島三十五中 朱 活

近来关于曹操評价問題，郭老、翦老及其他的先生們正在各抒己見，展开爭論。在历史教学工作中究竟怎样处理曹操的历史地位問題，也該及时提出让大家討論。这里，我提出几点个人的見解。

曹操究竟什么时候开始遭到歪曲，我看不必作过多的爭論，許劭早就評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陈寿也評曹操是"矯情任算"。也不好过分强調他"能够不信天命，不信鬼神，毁灭邪祠，破除迷信，禁止厚葬，禁止复私仇，誅不避权貴，举能揚側陋"，以至于"多才多艺，是一位多面手"来肯定他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些行动和品質是处在同时代同阶級內的其他分子所不容易办到的事。至于孤立排比曹操一生的功过，也不是評論历史人物的正确方法，这就很难看出曹操一生活动的基本綫索，很容易把主观与客观分离。

評論历史人物要全面来看，要把他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同时还要从发展上来看，这便是历史观点和发展观点。曹操为什么是一位英雄人物，我認为他一生活动中前后对于历史的影响有本質的差异。

首先，我們无法諱言曹操是鎭压农民軍起家，并且他始終对农民軍所抱的态度是敌对的，尽管所采取的鎭压手段有所不同。据史冊記載，灵帝光和末年，黄巾起义时，"三十而立"的曹孟德被征为騎都尉，曹操的自述也說"意遂更欲为国家討賊立功"（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已亥令），他积极地协助皇甫嵩、朱儁消灭了潁川一带以波才为首的黄巾起义軍（后汉书皇甫嵩傳）。正因为破黄巾有"功"，才被迁升为济南相。中平五年（188年），灵帝置西园八校尉时，又被征为典軍校尉。一直到他后来执政的时期，他对行动起来的农民軍并没有轉变原来的立場，始終进行鎭压。例如：青州黄巾及張燕为首的"黑山軍"，以及汝南、潁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余如汉中張魯，西北边章、韓遂为首的汉羌人民联合起义，最后的命运都落在曹操的手里，至于侯晉在宛起义，結果也是"屠宛斬晉"。所以不好說曹操"打了黄巾，而黄巾农民拥戴他"，甚至于說他打了黄巾"但沒違背黄巾的目的"。他所以从鎭压黄巾的劊子手上升到英雄人物，其中关鍵性的問題之一，在于曹操打了黄巾能够接受黄巾起义軍的教訓，对农民采取让步政策。他在建安九年（204年）的令文中說："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又"重豪强兼併之法"，以便保障"下民貧弱"，特别是打了黄巾起义軍，除选其精銳改編为青州兵以外，难能可貴的是把"男女百余万口"組織起来进行农业生产，以及減輕租調，实行屯田。这些緩和阶級矛盾的認識和措施，应該說是曹操接受农民起义教訓的具体表現。

其次，曹操在进行战争中，特别在軍閥混战的时候，从史冊的記載，杀戮非輕。据"魏书"所載："围而后降者不赦"（魏志程昱傳注）的峻法来推测，不仅曹操两次攻打徐州杀戮过甚，必为事实（从荀彧对曹操所說："前討徐州，威罰实行，其子弟念其父兄之仇，无降心"，更可置信），就是官渡之战，袁軍被坑杀七八万人（魏志武帝紀注）的說法，也并非无的放矢。当然我們不好說曹操每战必屠城，在降青州黄巾起义軍的办法就截然不同。扩大曹操杀人来否定曹操是不妥当的。但是鎭压黄巾以及在一些战役中的坑杀屠城，必然在一定时間留給人民极其恶劣的印象和仇視，这不能說不是曹操一生活动中最不光彩的事。因为他究竟只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或軍事家，而不可能成为人民英雄。

为了进一步分析曹操一生的重要活动，对于当时的历史情况有作簡单叙述的必要。东汉末年，由于宦官集团及豪門世族的腐朽无能，已經糟透的东汉政权，在黄巾起义軍的强大力量冲击下，实际上已

宣告垮台，黄巾起义軍虽然被地主阶級的联合武装所鎮压，而統治阶級內部却引起了更大紛爭，特别是董卓乱起以后，“群雄”割据混战的結果，黄河流域呈現了“出門无所見，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詩）的悽慘景象，社会突出問題表現在“統一”和“割据”的对立。在当时所謂“群雄”中，認識到这个問題的并不多，豪門大族如袁紹、袁术、刘虞、刘焉、刘表、公孙瓚之流，各据州郡；余如任峻、許褚、田疇之輩，力虽不足割据，却組織宗族部曲結塢以自保，这些都是造成分裂的因素。但是曹操就与众不同，且先看他的述志令：“設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确实意味着具有“統一”的抱負，他的一生活动中最主要的部分，也就是这方面。他能够自覚地或非自覚地站在反对分裂割据的立場，从事有益于中国再統一的活动，并且在他的努力下，确实获得了相当的成就，这就是我們評价曹操个人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关鍵所在。

为了进行統一工作，曹操在經济、政治和軍事方面都做了有利于这个目的的措施。

在經济方面，他接受了农民起义的教訓，采取对农民让步政策，实行屯田，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这些經济措施执行的后果，既能緩和阶級矛盾，又支援了軍事行动，并可以巩固足以进行統一的封建政权。

屯田制度本来是两汉以来的“实边”办法，曹操实行屯田是各郡国例設田官，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組織形式，这在当时中原地区“人民分散，土地无主”（魏志司馬朗傳），劳动力特别缺乏，以及在混战中农民生命沒有保障，无法进行生产的情况下，以政权力量保护組織起来的农民，在政府掌握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当时确是“强兵足食”，恢复生产，緩和阶級矛盾，具有現实意义的好办法。

有些拘泥于經傳的政論家，就和曹操的看法不同。如荀悅主張‘耕而勿有”（申鑒卷二）；仲長統主張恢复井田（論損益篇）；司馬朗更具体地建議乘此“田业无主”的机会恢复井田制（魏志司馬朗傳）。可是曹操采取的是棗祗、韓浩的建議，实行屯田制，这就是比一些书呆子高明的地方。屯田制不仅是解决軍粮問題，对于收容安置流散农民和俘掠人口也是有效办法，因而不仅具有重大的經济意义，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我看来，曹操固然是接受了棗祇、韓浩的建議而实行屯田，更实际的是曹操接受了黄巾起义軍的教訓和經驗，并掠夺了黄巾起义軍的資財。“魏志”“晋书”都有类似的記載：“及破黄巾，定許，得賊資业，当兴立屯田。”（魏志任峻傳注，晋书食貨志邓艾济河論）曹操打敗了青州黄巾及汝南、潁川的黄巾，因为这些队伍都是农民組成的，不管男女都有生产經驗，他們既是战斗組織，又是生产組織，在他們起义的时候是以武装自卫的形式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所以拥有不少农具和耕牛，这种又战斗又生产的办法，实质上就是屯田的办法。曹操在打敗农民起义軍以后，进一步把劳动力、生产經驗、农业技术及耕具耕牛組織起来，以政权力量保护这种生产組織形式，进行生产。因为行而有效，所以在建安元年（196年）明令試行屯田，后来扩大到州郡例置田官。

曹魏屯田的剝削量是相对减輕的，而收获量却有显著的提高，这都是事实。无論軍屯和民屯大致是有牛者对分，用官牛者四六分，更重要的是不給杂役(基本情况)，这就給屯田客士(农民、軍士及其家属）保持着一定的劳动成果，保証了有更多的时間从事农业劳动，因而也就給提高产量和丰收創造了条件。

为了配合屯田及农业生产，又能够注意兴修水利，推种高产作物。我們从屯田地区多半是水利沃壤的地区，已可見其密切注意水利，如夏侯惇为陈留、济阴二郡太守，“断太寿水作陂，……种稻，民賴其利”（魏志夏侯惇傳）；刘馥为揚州刺史，数年中，“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魏志刘馥傳）。特别还注意到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增产，所謂“不务其頃畝，但务其功力”(晋书傅玄傳)。所以屯田的收获量确有显著的提高，大致屯田普遍能达到“一亩十斛”的良田收获量，有的地区可以增加三倍（見邓艾济河論），以至于“每亩数十斛”的产量（見晋书傅玄傳）。“魏志”記載屯田的結果是“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曹操在追贈棗祇的諸令中談到“丰足軍用，摧灭群逆，共定天下，以降王室，祇兴其功”（魏志任峻傳注）。总之，剝削量有固定数額，收获量又有很大的提高，这必然减輕对农民剝削。曹氏在經济上这种措施的結果，既解决了軍粮，又增加了財政收入，并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恢复，阶級矛盾也因而趋向緩和，还可以爭取割据势力統治下的农业劳动力，既能瓦解敌对势力，又

能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力量。这对于他的統一事业确实創造了物質基础。

在政治方面，能够緩和阶級矛盾，压抑豪强，唯才是举，实行法治，以及"挾天子以令諸侯"，这都是有利于統一，不利于割据的进步政策和必要措施。

曹操接受农民起义軍的教訓，知道"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他对农民所采取的剝削比較割据势力要輕得多，在当时也可以說是"輕徭薄賦"了。对于組織起来的屯田客士，前已述及。对于沒有組織到屯田里的农戶，特别是新扩張的領土更注意这种措施。例如建安九年（204年）占領袁紹的根据地——鄴的时候，就下令减輕剝削，規定"田租亩粟四升，戶絹二疋，棉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魏志武帝紀注）。姑无論田租亩粟是四升还是四斗尙有爭执，然而剝削有了定額，总比袁氏統治时期农民破产卖子的情况要好一些。并且"重豪强兼并之法"，保障"下民貧弱"不至于迅速破产。因此，阶級矛盾緩和了，后方出現比較安定和巩固的局面。至于个别地区，因战争的破坏等客观原因的影响，阶級矛盾呈現尖銳的情况，应該另作别論。

曹氏在統治集团內部矛盾的蠶烟里，觉察出豪門世族的腐朽，多半是成事不足，而敗事有余，无法也不可能依靠这些势力的支持来进行国家的統一，所以在他执政的时候，对这个腐朽的阶层，給予相当的打击和瓦解。"魏志"不乏其例，如杀"四世淸德，海內所瞻仰"的弘农楊彪；武力解决了"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的汝南袁紹；平荆州时，司馬芝杀了旧大族刘节、刘勳；余如楊修、孔融、崔琰之輩，均不免于死。但在暫时不反抗自己的情况下，又采取合作态度来瓦解敌对的势力，如潁川荀氏，河內司馬氏。

跟压抑豪强相适应的是进一步爭取非豪門地主，特别是地主阶級中下层来支持他的政权，因而他的政权基础得到扩大。他在建安十年（201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三下求賢令，所謂"被褐怀玉"，"盜嫂受金"，"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唯才是举"，这就是指原来被門第所限，而不能被重用的非豪門地主阶层的"异質之士"，实質上是对割据势力进行斗爭的另一种表現形式。据"魏书"所載："拔于禁、乐进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虏之內，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將，其余拔出細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魏志武帝紀注）。陈寿也說曹操所以能取得政权的原因是"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旧恶，終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魏志武帝紀）。他的吏治确实比較清明，我們讀"三国志""魏志"，他的地方官吏人选陣容很强，不是能抑制豪强，尽忠职守（如王修、司馬芝）；就是能兴修水利，勸劝农桑（如刘馥、梁习）；或則招徠流民，鎭撫边疆（如鍾繇、張旣）。这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曹氏政权，同时也会相对地减輕和解除对农民的剝削和压迫。

曹操是主張法治的，陈寿說他"攬申商之法术"，而"用法峻急，有犯必戮"，但是"勋劳宜賞，不吝千金"。这种賞罰分明，有利于防止政治的迅速腐朽。在曹氏执政的时候，确实是吏治淸明，傅干曾說："曹公……法明国治，上下用命"（魏志鍾繇傳注），实非虛說。

曹氏在政治上另一个有利于进行統一的措施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这个問題并不能輕視，应当認識出曹操这种措施是有利于統一工作的，它是孤立敌人，扩大自己，招攬人心，巩固政权的手段。毛玠、荀彧都向曹操建議"宜奉天子，以令不臣"（魏志毛玠傳），"奉主以从民望"（魏志荀彧傳）。这一措施确实是有作用的，实际上农民本来就是"皇权主义者，他們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斯大林与德国作家路德維希的談話）。农民当时反对軍閥、豪門的混战和割据，可是盼望統一和出現一个能够輕徭薄賦的"好皇帝"，因此，献帝在某种情况下倒做了"統一"的幌子。另一方面，对于具"正統"观念特别深的地主阶級及其代表人物来說，就更起作用。試看賈詡劝張綉："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魏志賈詡傳）；崔琰諫袁紹："天子在許、民望助順"（魏志崔琰傳）；傅干說馬騰："曹公奉天子誅暴乱，法明国治"（魏志鍾繇傳注）；赵儼本来避难荆州，当曹操迎献帝都許，他就說："曹鎭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魏志赵儼傳）；其余如郭嘉之流，莫不賛成曹操这种措施。就是敌对方面也不得不承認这种优势，諸葛亮初見刘备就說："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与爭鋒"（蜀志諸葛亮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氏降刘琮以后，准备順江东下，东吳群臣就認为"曹操挾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

之，事更不順”（吳志周瑜傳），可見对于敌人能够起瓦解作用。

曹氏初“挾天子”时，最强的对手是袁紹，袁紹覺察出这个問題的严重，會經用兵力威胁曹操要将献帝迁都鄄城，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內，甚至于田丰要袁紹去袭許都，爭夺献帝。曹氏取得这个优势，以及标榜“唯才是用”等措施，使当时北方的地主武装如李典、許褚、任峻、吕虔、李通之流，率宗族宾客家兵归附了自己；北方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如郭嘉、鍾繇、陈群、袁祇、赵儼之輩，也都支持曹氏，这种力量在軍事上是构成曹操武力的基干部分，在政治上是政权的有力支柱。

曹操在軍事方面，从起兵討卓以后所进行的战爭，其主流是逐步趋向从事中国再統一的战爭，无論是官渡之战，或赤壁之战，是以战争方式来进行統一工作的，何况确实在他的領导下，統一了北部中国，这給中国的再統一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曹氏对边疆落后部族所进行的战爭，虽然有的部族因而遭到鎮压和迁徙，如西北对羌族、氐族及賨人的情况；但是对于北部破烏桓敗鮮卑的战爭，都是保卫边疆的正义战爭，并且对于战敗者的处理也比較适宜。因为这两种部族，据史冊所載，社会性质还是处在奴隶制初期，东汉末年以来，一直为中国北部的边患，并且参与中国的內乱，三郡烏桓（遼西、遼东、右北平三郡）曾助袁紹攻打公孙瓚，所过多所殘毁，官渡之战以后，袁尙、袁熙就投奔烏桓，企图組織联軍，东山再起。至于代郡上谷烏桓，和鮮卑軻比能联合为寇，也是事实。曹氏在建安十二年（207年）亲征烏桓，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命其子曹彰击破代郡上谷烏桓和鮮卑軻比能的联軍，这对于当时北部沿边人民的和平生活起了保障作用的；同时巩固了北部边疆，这种战爭是可以得到人民支持的，应該說为自己的民族立下了汗馬功劳。

总之，我們从当时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从曹操一生活动中的主要綫索和轉变来看，以及他在經济上、政治上、軍事上各項措施与行动来看，远非同时期的刘玄德、孙仲謀所能比量，其余袁紹、袁术、公孙瓚等輩更不足道。諸葛亮曾說：“先帝每称操为能”，这倒不是一句恭維話。“魏书”說他“譎敌制胜，变化如神”，陈寿許他“明略最优”。他不仅有武功，而且重文治，他自己是“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留給后人不少佳作。建安文学高潮的出現，也反映了曹氏政权基础的巩固，他确实是具有封建政治天才和軍事天才的傑出人物。

历史唯物主义認为“英雄，傑出人物，只有当他們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了解应如何改进这些条件的时候，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的作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頁）。曹孟德为什么能够从鎮压农民起义的劊子手上升到英雄人物，便是由于他能够从“党錮之禍”里，認識到宦官集团的腐朽統治，必然招致恶劣的后果；特别是从作为推动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基本动力的农民起义农民战爭里，接受了深刻的教訓，了解农民痛恶割据，强烈的要求統一朝代的出現，認識到必須对农民采取让步政策；又在董卓之乱前后紛爭割据里，認識到豪門大族総必失敗。因而他在董卓之乱以后，开始站在反对分裂割据的立場，知道依靠非豪族地主，特别是中下层的力量，压抑豪强，进行統一战爭；在政治上和經济上执行了一些有利于統一的进步政策和措施，对农民减輕剝削，推行屯田，恢复社会生产，消灭割据，打敗落后部族的侵扰，北中国实現了統一。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曹操确实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所以魯迅先生說：“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臉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眞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魯迅：晋魏风度及文章与葯及酒之关系）



有关1927--1937年我国苏維埃革命的几个問題

魏　今

一　苏維埃革命的性質

在我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曾經历了十年的苏維埃革命。苏維埃，这是俄国工人阶級在1905年革命时期所創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含义就是代表会議。我党在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所建立的紅色政权，其組織形式近似于苏維埃政权，故称这一时期为苏維埃革命时期。

苏維埃是政权的組織形式，但我国的苏維埃和苏联的苏維埃是不相同的。在苏联，它是无产阶級专政；在我国則是人民民主专政，目的是在資产阶級叛变革命后継續进行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为什么这样說呢？因为就任务来說，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內容。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苏維埃形式？因为資产阶級叛变后，要进行革命，只有以土地革命来发动千百万群众，組織苏維埃政府及工农紅軍，才能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統治。从政治上講苏維埃制度是最民主的，它最能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到政治生活中去管理自己的政权，給劳动人民以空前未有的民主权利。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十年国內斗爭中，苏維埃在战爭动員上，如扩大紅軍运动、粮食运动、經济建設、公債动員，在土地斗爭中，如查田运动、春耕、夏耕、秋收、冬耕运动，在苏維埃建設上，如經济建設、文化建設、选举运动等都发动了千百万劳苦群众参加到各个战綫上来。从經济上講，在苏維埃政权下，沒收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把这些土地无代价地分給貧苦农民，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稅及高利貸剝削，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增加了工資，消灭了流氓乞丐与失业者等等，所有这些都沒有超出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范围。因之，十年的苏維埃革命是在无产阶級領导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

苏維埃政权既然是无产阶級領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就可以"巩固工农在經济方面的联合，保証无产阶級对于农民的領导，爭取国營經济对私人經济的領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一条不可踰越的鴻沟，但也不能把二者混淆在一起。苏維埃革命是資产阶級民主革命。

二　苏維埃革命发展的几个阶段

事物的发展总是在变化着，新生的东西虽然在开始时不大为人注意，但它是发展的东西，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苏維埃革命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同样的道理。在1927年，当苏維埃政权刚开始建立时，只是星星之火，就是在党的六次大会时，也只是一个雛形。但是几年之后，这星星之火就燃燒到全国許多地区，成为燎原之火。到1930年时，在广东的海陆丰、江西的西南部与东北部、湖南的平瀏、广西的龙州百色、福建的西部、湖南的东南、鄂豫皖边区等地建立了不少苏区。苏維埃革命运动这样不断地向前发展，就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力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125頁。

量。到1931年各个分散的苏区开始有了联絡，这一年的11月7日在江西瑞金經过全国工农兵代表会議的选举，正式成立苏維埃临时中央政府。苏維埃全国政权的成立，这是一件大事。从此以后，我国就出現了两个相对峙的性質不同的中央政权：代表工农人民的苏維埃政权和代表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反革命政权。就是在全世界上，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竟产生了第一个苏維埃国家。虽然这个国家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但它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政权，它是中国革命的方向和灯塔。它在成立的那一天就发表了告全世界工农劳苦群众的宣言，說明中华苏維埃政府在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自由，为人民的政治經济改善而奋斗，并頒布了宪法和劳动法、土地法、选举法、經济政策、民族政策、婚姻法等，确定了苏維埃的財政政策和教育方針。

苏維埃革命是在斗爭中成長壯大起来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曾企图在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把它扼杀，并在它发生的地方把它消灭掉，不使它蔓延。但是这种打算失败了。苏維埃在向前发展着，短短的几年，它就由游击区发展成为有广大領土和人口的苏維埃区域。这种由小到大的发展是經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从井岡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圍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紅軍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圍剿'到第三次反'圍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縮小了許多，方面軍已經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經存在。从第三次反'圍剿'后至第五次反'圍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縮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軍事委員会已經建立。長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錯誤地否認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沒有战胜第五次'圍剿'和大流动，紅軍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縮小了，但又已經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陝甘宁边区根据地。"①在这整个发展过程中，从第三次反"圍剿"后，或者說从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起，到1934年2月間第二次全国苏維埃大会时为苏維埃政权最发达的时期。在这以前，它的特征是从游击队向紅軍轉化，游击区也轉为苏区。在这个时期以后不久，紅軍就退出了中央苏区，从一个根据地轉移到另外一个根据地。接着在国民党抛弃內战、独裁与不抵抗政策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也宣布放弃两个政权对立的政策，停止沒收土地，取消苏維埃。这是因为在日本的侵略下，国内阶級关系已发生了变化，民族矛盾已超过了阶級矛盾。抗日成为全民族的要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継續苏維埃运动，那就是仍要推翻国民党政权，必然継續內战，使抗日战爭不能实现。所以在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苏維埃形式虽然依旧存在，但不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是和国民党就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完成談判。当抗日战爭开始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就代替了苏維埃，这种轉变是革命更向前的发展。

三　苏維埃的农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一般地說，苏区在建立的头两年，由于在分配土地期間，地权沒有确定，新的秩序还沒有走上軌道，农民的生产情緒还有些波动，所以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但这个下降时期并不長，在党和政府号召发展农业后，农民的生产情緒立即提高，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

苏維埃政府是尽一切力量来发展农业的。农业生产在苏維埃經济建設中占着首要地位。因为"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問題，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②。

苏維埃政府怎样发展农业呢？

苏維埃政府不仅建筑堤坝、沟渠，兴修水利，还帮助农民以种子、肥料与耕牛耕具，告訴农民如何耕种他們的土地。在耕牛不够分配的地方，就設立耕牛站耕具站，供沒有耕牛耕具的农民使用。苏維埃政府并通过粮食合作社、国家銀行，把种子貸給貧雇农。帮助农民研究土地的好坏，适宜种什么东西，籌划田地的肥料，并帮助农民运輸和购买肥料及研究制造肥料的办法。在春耕和秋收时，就动員所有苏区的人民，組織生产队、栽秧队、割谷队。妇女和儿童都参加了生产。举例来說，湘鄂西苏区，除了发种子給一部分群众外，还在县和中心苏区組織有农具制造厂，专門制造鋤头犂耙来帮助群众，同时还把沒收来的牛发給群众，发展群众志愿的犂牛站的組織。在解决耕牛耕具种子不足方面，曾采取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225—226頁。

② 同上，第126頁。

了許多措施：如鼓励群众集股买种子，組織粮食合作社；宣傳灾民到白区从斗爭中带回种子春耕；群众間举行友誼的耕具种子借貸；爱护和保养耕牛，修理农具；組織群众的耕种互助队、代耕队和竞賽队，并成立生产委員会計划和領导春耕等等。赣东北苏区創造了生产模范队和冲鋒队的組織，采用生产統計数字，鄂豫皖苏区于春天則举行春耕运动，到了秋天，就举行秋耕秋收运动，开展生产比賽。为了鼓励群众自动种植杂粮，如瓜豆等类，党和团曾发起了粮食运动周，有"每个党团員至少必須种五棵瓜藤（最好是南瓜）或等量的其他杂粮，种了以后必須負責照料直到收获后为止"的决定。总之，各苏区均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来增加农业的生产。土地的增产，这是发展农业的一个主要方面，开悬荒地也是增产的一个途徑。苏維埃政府为了鼓励群众开荒，曾宣布开悬荒地的农民不仅可以免去三年的土地税，还可以得到奖品。这样一来各苏区的荒地大大减少。

由于党和苏維埃政府的領导，由于苏区农民生产热情的提高，苏区农业产量增加了。"1933年的农产，在赣南閩西区域，比較1932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閩浙赣边区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①粮食問題不仅根本解决了，而且还有儲蓄，每年約有三百万担谷子可以出口。当时粮食价格降低到两块錢一石，甚至两块錢还不到。这就保障了苏区人民的生活。

四 苏維埃工商业的发展状况

苏維埃一直处在战争环境中，并且在敌人严密的封鎖下，对外貿易几乎完全断絕，在这种情况下，苏維埃工商业的发展是极端困难的。

毛主席曾說："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鎖和我們对小資产阶級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指紅区和白区——引者）几乎完全断絕貿易，食盐，布疋、药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輸出，农民断絕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貧农阶級比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級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紳阶級。"②这种經济的压迫最严重的是没有盐吃。一般人家經常每天得到一两食盐，甚至无数的貧苦民众四五天尝不到盐味，没有盐吃，就不能走路。苏区的物产虽然很丰富，但因无銷售市場，故物价低落，出产大减，如鄂豫皖苏区所产的竹木茶麻等物，虽經合作社极力努力也运不出去，困难的确是很严重的，但这并不能阻止苏区的建設，也不可能使苏区的工商业就此停止。苏維埃政府在糾正了对中小商人和資本家的过左政策（如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等）以后，工商业的发展就逐漸好轉。为了发展工商业，鼓励資本家投資营业，苏維埃政府曾頒布了工商业投資条件。苏維埃政府曾設法同資本家訂立合同，恢复他們的企业，极力鼓励資本家在不增加对工人剝削的条件下，扩大生产。并宣布只要他們不投机或抬高物价，一定保証商业自由，不干涉經常的商品市場关系。当时湘鄂赣省苏維埃保証商人自由貿易的布告中，曾公开指出立三路綫对工商业发展的不良影响，"認为对过去的这种錯誤，应予以严格的糾正，而坚决执行中央所頒布的苏維埃經济政策，保証商业自由，号召商人恢复貿易，以增进苏区商业的兴盛，而解决群众和紅軍的需要"。鼓励私人資本，这只是工商业发展的一个方面。为了需要，苏維埃政府改进了旧有的生产基础，建立了一部分国营工商业，并大力鼓励合作社經济的发展。合作社經济在发展中获得了极重要的地位。苏維埃政府曾把过去自己所办的商店，租給工农群众，使其成为合作社性质，并鼓励工农群众自动集股开办各种合作社，苏維埃政府并且将一部分被没收的房屋与商店交給合作社使用。在苏維埃政府提倡之下，工商业得到恢复，使人民日用品的供給，在敌人封鎖之下，还能够継續发展生产。举例来說，在江西兴国，消費合作社占有一条二里長的街道，出卖各种貨物，以供应人民的需要。

当然，就工业产品而言，小手工业占主要地位，但是苏区也有紡紗工厂、毛織工厂、被服厂和机器作坊等，如宜春的慈化鎮就設有紡織工厂。苏維埃的国营企业則只限于必要的軍事工业、造币厂和印刷厂以及大的矿业。这些厂矿，数量虽然不大，但极其重要。如江西的鎢矿，每年出产一百万磅，經过商人之手卖給广东陈济棠所垄断的鎢矿专卖处。江西瑞金的中央苏維埃印刷厂，有八百个工人，許多书籍杂志和全国性的机关报——紅色中华日报，就是在該厂印刷的③。关于工业，毛澤东同志在"我們的經济政策"的报告中，曾具体地告訴了我們当时的发展情景。他說："两年以来，特别是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125—126頁。
② 同上，第72頁。
③ 斯諾："西行漫記"1938年复社版，第301頁。

1933年上半年起，因为我們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漸发展，許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是在开始走向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紙、鎢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而且自己織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視的。在閩浙贛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紙、織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效。他們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①

由此可知，在敌人的严密封鎖下，苏維埃曾創造了奇迹，解决了迫切需要的东西，进行了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济建設。这种建設首先必須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了战争的需要，苏維埃的国营企业特别注重于必要的軍事工业的发展；但对人民日常的生活必需品也没有忽視。在这方面，手工业的生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党和苏維埃政府极力动員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

苏維埃的經济是由国营經济、合作社經济和私人經济共同組成的。在当时私人經济无疑的是居于优势的，但合作社經济和国营經济联合起来，曾对私人經济进行了斗争，逐漸取得优势和領导。国家銀行当时曾尽力帮助国家企业和合作社的发展与私人資本相竞争。在竞争中，粮食調剂局、对外貿易局以及合作社工作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国营企业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很重要。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說：“我們之注意公营經济建設事业，有其历史的与现时的原因。还在內战时，中共中央曾經为了战争需要而在江西苏区建立了一部分公营工商业。”②走过了这一段路，这对革命是非常有益的，这就为以后的革命建設事业創造了經驗。

五　苏維埃的金融貿易

为了发展經济，冲破敌人的封鎖，为了商品流通的需要，苏維埃政府曾发行了各种貨币，如銀币、銅币、紙币与布币等，并极力开展貿易活动。苏維埃銀行的发行貨币，不是为了生利，而是为了需要。銀行对于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等实行借貸，并掌握苏区的汇兑。当时各苏区都有銀行組織，如中华苏維埃共和国国家銀行，湘鄂贛省工农銀行，鄂东工农銀行，閩浙贛省苏維埃銀行等。农村交易，则通过合作社来进行。

苏区的貿易是实行統制政策。由国家直接掌握若干必要的商品流通，如江西的药材、紙張、木料、矿产和瑞金的烟草就是由国家經营，負責向外推銷，用以购买苏区所需要的食盐、布疋、五金、交通用品和医药等。內地的貿易除粮食統制外，其他各物均自由交易，为了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1933年中央苏区曾設立了对外貿易局和食粮品管理所。对外貿易虽然非常困难，但在1933年也有一千二百万元以上的收入。这些貿易大部分是由南方敢于冒险的商人經手的，他們越过国民党的封鎖綫，而得到很大的利潤。

六　苏維埃的財政来源

苏維埃政府的財政来源是什么，它怎样維持自己，保証革命的給养与供給，保証苏維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

大体說来，在1927至1931年游击战争期間，岁入完全由没收地主和豪紳的財产得来。没收了他們的財物以后，除以最大部分分給当地工农群众外，自己还可留一部分，1930年时，財庫已积聚了三百万元，第一次反“围剿”的費用，就是靠这笔錢的。有时因没有土豪可打，紅軍的給养的确很困难，但群众知道紅軍为苏維埃而战，自动捐助大量的衣服食粮和金錢，而紅軍自己也設法解决經費和給养不足問題，如在击破敌人二次“围剿”以前，紅軍的給养特别感到困难，所以紅軍战士自动地到田中找鰍魚、虾子，到竹林中挖筍，到山中拾柴，以便节省一点軍費而能長久作战，結果在党与苏維埃政府領导之下，在广大的群众帮助之下，解决一个月的給养，争取第二次反“围剿”的完全胜利。战争的胜利就可以夺得敌人的輜重、兵站粮庫来装备自己。国民党在几次“围剿”中，供給了紅軍很多物資。从1932年到1934年長征时，苏維埃政府实行了严格而集中的統制經济，創办了国家矿山与工业，一部分没收的土地收归国有为紅軍生产，这样，苏維埃就从国家貿易、从紅軍土地、从国营工业、从合作社等方面来充实財政。这就是說从发展国民經济来增加苏維埃財政收入，这是苏維埃財政政策的重要部分。为了发展經济，并为了充实战争經費，苏維埃曾发行了几次公債，計第一次革命战争公債六十万，第二次三百万，第三次經济建設公債三百万，依靠群众力量

---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127頁。

② 毛澤东：“經济問題与財政問題”，“毛澤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10頁。

来解决經费和資金問題。励行节約来解决經費和給养問題也有很重大的意义。各地在节省粮食、节省財物帮助紅軍动員中都有相当的成績。特別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苏維埃中央政府为充分积蓄和准备战争經費起見，曾号召苏区工农群众与紅色战士实行經济节省运动，对紅軍每天的供給也作了規定：每个战士每天发米一斤半，食盐三錢，猪肉或茶油四錢，至于柴炭，菜蔬等，每人每天发洋五分或一角。他們对每一种可能的节省都做到了。

但苏維埃財政来源不只如此，毛主席曾說："苏維埃的財政来源乃是：(一)向一切封建剝削者进行沒收或征发；（二）税收；（三）国民經济事业的发展。"①可見税收也是一个重要的組成部分。

税收是采取統一的累进税。税收的基本原則，是建立在阶級的与革命的原則之上，把重担归于剝削者。对于农民的税收是很微小的，等于沒有。依照江西省农业累进税的規定，每人收获量在麦谷三担以上者才开始征收，如三担征收百分之四，四担百分之五，五担百分之六，依此类推。富农和商业的税則比較重。富农每人从一担谷起，就征收百分之四，二担谷百分之五，余类推。商业税以营业基金为标准。資本在100元以下，群众的合作社以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品，都实行免税。資本在101元到200元征收百分之六，201元到400元征收百分之七。在税收中还有一种收入就是关税。貨物輸入和輸出苏区都要征税。凡不是生活必需品的东西和苏区能生产的东西收入口税就多。苏区需要而且缺乏的东西則不收税。反过来多抽苏区正在急需的东西的出口税，而不抽苏区不必需的东西的税。1935年以后，在西北，除了在延西的百分之十的盐税，每月約达西万元外，則沒有征任何种税。苏維埃政府的費用大半靠从南方带来和从国营工业——如毛皮、小兽皮、煤、羊毛、油和盐——的盈余来維持②。总之苏維埃的財政完全建筑在阶級的与革命的原則之上。財政的支出，完全根据节省的方針。在江西时，全年的預算才一千万元，到陝北后，全年仅一百万元，这在世界上是絕无仅有的，这种情况是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和政治的基础。

七　苏維埃的文化教育成就

苏維埃政府把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当作一項严重的任务。苏区人民的文化本来是落后的，又处在長期的战爭之中，但在苏維埃政府号召之下，苏区群众文化教育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农村教育普及了，各地苏区遍設列宁小学、民众俱乐部及其他教育机关，每县以百数十計。根据江西福建等省二千九百三十二个乡的統計，有列宁小学三千零五十二所，学生八万九千七百一十人；有补习夜校六千四百六十二所，学生九万四千五百十七人；有識字組（福建在外）三万二千三百八十八組，組員十五万五千三百七十一人；有俱乐部一千六百五十六所，在俱乐部工作的有四万九千六百六十八人③。这个数目还是一般的統計，还不能說明入学与失学的比例，若以兴国为例，計有学龄（八岁以上）的儿童总数为二万零九百六十九人，那时正在入学的約一万三千人，失学的占八千一百余人（內女的占半数），入学与失学的比例恰为百分之六十与四十之比。但这些失学的儿童也都加入了儿童团，在儿童团內有許多学习机会，如識字、唱歌、打球比賽等。至于补习学校与識字組，則是为失学青年与成年而設的，是在从事生产之外来提高文化水平。俱乐部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文化工作的④。为了让工农在較短的时間掌握文化，当时还开展了字母簡字运动。字母即国音字母，簡字乃将习用的繁笔字，改用簡笔，如縣、鄉、聲、園，改为县、乡、声、門，以便認識和书写。总之苏区以各种方式来吸引人民加入文化运动。这結果就出現了一种新的局面。从十岁到三十岁間的文盲被扫除了，鴉片賭博妇女纏足等現象消灭了，迷信大大减少了，一般的都能懂得或說普通話。文化水平的提高还可以从报紙发行方面表現出来。中央苏区有大小报紙三十四种，如"紅色中华"、"青年实話"、"斗爭"等，每种每期都发行到数万份之多，这些报紙发行出去之后，經过讀报組的方式，每份至少能吸引十个讀者。由此可見苏区文化的巨大发展。

因为苏維埃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和培养大批領导斗爭的高級干部⑤所以干部教育在苏区也很突出。从1931年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学校开办

---

① "苏維埃中国"，第276頁，现代史資料編輯委員会翻印。

②韋尔斯"續西行漫記"1939年复社版第108頁。

③同①，第283頁。

④"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南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72頁。

⑤同①，第285頁。

以后，因为紅軍的日益扩大，需要領导干部日多，于是成立了中国工农紅軍大学（又名郝西斯大学，以紀念苏联駐广东領事郝西斯同志），专門培养团長，参謀長、团政委以上干部，还成立了公略步兵学校、彭楊步兵学校、特科学校、通訊学校、卫生学校、供給兵站学校、地方武装干部学校、少年先鋒队干部学校等校。此外各軍区还有教导营，各軍团有教导团，师有教导队的組織，都是培养中級干部。一般說来，紅軍中的連長、政治指导員以上干部，都經过紅軍学校的訓練。班長排長都經过教导队的訓練①。

为什么社会教育和干部教育的发展格外发达？这是由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紅軍的需要決定的。不可能在沒有基础和条件的情况下去发展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教育必須从实际状况出发。教育是上层建筑，它是反映一定的社会經济基础的。苏維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針，"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群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級斗爭服务，在于使教育同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②。

八　苏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

苏維埃政权是工农自己的政权。土地是农民的，工厂作坊是由工人监督或由工人自己管理的。土地与工厂作坊內的生产的发展，同整个苏区內劳苦群众的生活改善，有直接的关系。工农群众知道他們的生产是为了什么，都为苏維埃美好的前景而奋斗。而苏維埃也曾給了劳动人民以空前未有的民主权利。在苏維埃政权下，工农不但有罢工、集会、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而且苏維埃政府还以开会場所、印刷局等供給工农团体，在物質上保障民众享受这些权利。工人在苏維埃政权下完全有組織自己的自由，苏維埃政府也用种种办法帮助工人建立工会。在苏維埃区內当时成立的工会有手工业工人工会、木船工人工会、雇农工会、苦力工会与店員工会等，总工会有二十万以上的会員，这些工会都在省工会和全国总工会指导之下。同时因为土地的平均分配、劳动法的实行，一般民众的生活都得到了普遍的改善。

在劳动法公布以后，八小时工作制就实行了，工資也增加了，对于失业工人，苏維埃政府还給以劳动介紹与失业津貼，专門成立了社会保险与劳动介紹所来解决此类問題。工人在国营企业的工資，在江西和福建苏区每月达四十元，私人企业二十五元。最低工資在汀州为十二元五角，学徒工資約十元。工人如果有病，不但不扣工資，还可以免費到苏維埃国家医院去治疗。女工和男工同工同酬，产假前后，給以休假，工資照发。工人因为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得到保障，生产热情也就更加高漲，各贛东北苏区上饒煤矿工人，在实行每天作六小时工后，产量反比以前增加。贛东北被服厂的工人在未实行八小时工作时，每班八人，每天只作四件单軍衣，八条单軍褲，实行八小时工作后，同样八人能做六件軍衣，十二条軍褲。兵工厂的工人甚至志愿多做半小时或一小时工，到下班时不愿下班。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揮，生产力大大提高。

农民群众因为分到了土地，解除了一切苛捐杂稅的痛苦，生活状况发生了变化，就貧农和中农生活而言，比革命前提高了一倍到两倍。如果是紅軍，則受到更大的优待，粮食衣服首先要拿来滿足紅軍的需要。紅軍士兵的土地，都由苏維埃政府負責，采取共耕的办法来耕种。紅軍在服务区內，本人及其家属免納一切捐稅，免納国家房屋的房租，有优先权购买当地缺少的物品，廉价购买物品，免費寄信，子女免費受教育等等。

总之，在苏維埃政权下，沒有失业，沒有飢荒，人人都愉快而紧張地工作着，都在为苏維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而貢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

①見"紅軍时代"，第105—106頁。

②"苏維埃中国"，第285頁。

戊戌政变前后湖南維新运动的社会基础和思潮的演变

陳 熊

一 狂热的战斗的湖南維新运动的产生

梁启超在其所著“戊戌政变”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中說：“湖南以守旧聞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燾氏、曾紀澤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維新之区也。”“他省无眞守旧之人，亦无眞維新之人；湖南則眞守旧之人固多，而眞維新之人亦复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者也。”从梁启超这段話里，可見湖南是当时維新和守旧两派斗爭得最为激烈的省分。梁启超在这段話中，虽然还提出了“发逆之役，湘軍成大功，故嚣張之气漸生，而仇視洋人之风以起”，和“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課士，于是风气漸开，而譚嗣同輩倡大义于天下，全省沾被，議論一变”等，作为維新守旧两派斗爭激烈的原因。然而这是唯心主义的梁启超，从現象上看問題的皮相之談，远沒有掌握住当时湖南守旧、維新两派激烈斗爭的本质。

我們認为，当时湖南的頑固派与改良派的斗爭，远較他省激烈的根本原因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第一，自从第二次鴉片战争后，英美法德俄等資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資本輸出代替了商品輸出，为着保証对落后地区廉价劳动力的掠夺和資源的搜括，帝国主义从80年代起，展开了瓜分世界的斗爭。既然这样，对于我国的侵略，也就不再停留在第二次鴉片战争时期及其以前的象恭亲王奕訢所說的“不利我土地人民”的那样，而是在完成了对我四围友邻国家殖民地化以后，展开了爭夺我国优良海港，建立“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豆剖”的竞爭。这种空前严重的亡国慘象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形势，促使了每一个較有远見和热爱祖国民族的人，不能不惊心动魄地和严肃地正視現实，考虑祖国民族的出路問題，因而維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們看到李鴻章經营海軍陆軍近三十年，却为維新不久的日本小国击敗到全軍复沒。所謂“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求富之道，也是“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飾，难望至精”（康有为語）。針对上述情况，当时湖南維新派骨干譚嗣同在“报貝元征书”中認为：当时国人所見的輪船、电綫、火車、枪炮、水雷及織布、炼鉄諸机器，为“洋务之枝叶”，而以西洋的“法度政令”为其“根本”，进而指出当时欲救中国之道，輒維“变法”。他責备当时秉政“諸公，处无法而当变法之时，不能出鉄肩，下辣手”，“以力遏”当时反对洋务的“稗士乱民”，因而“著著落后，寖并落后之著而无之，是以陵迟至有今日。”

第二，自資本主义国家商品大量輸入后，我国封建社会內部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济，就从沿海到內地逐渐受到破坏，同时中国城乡商品經济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抽出过去一直投入到土地上面的資本，轉而投資于买机器，开工厂。然而由于洋务派的軍閥官僚，害怕“倘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潛师洋法，独出新意，一旦輟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孰能御之”（李鴻章同治三年致总理衙門书），因而采取了“只准华商搭股，不准另行設局”（李鴻章創办上海机器織布局的声明）的限制政策，对机器实施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监督办法。洋务派的这种限制私人經营工业的反动政策和外国資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使中国新兴的民族工业只能象小脚女人一样蹣跚地非常困难地前进着。这对那些投資工业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来說，感到不能暢快地轉移資本的憤懣。他們要求“兴紳权”以扩大較大范围的“民主”与“自由”，刷新政治，維护国权，实施限制貿易，使他們能在商战中不受到外国資本的排挤，进而促使民族資本得到長足的发展。然而他們的人数不多，实力不足，远不可能进行这样一場反对封建和帝国主义排挤压抑的斗爭。因而刷新政治，变法图强，突破工商业限制，倡导自由竞爭，

使用机器，发展实业，以“保种”、“保国”、“保教”的呼声，就只能由本身是官僚，或者由官僚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的口中，替他們喊出来。生長在湖南浏阳、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的譚嗣同在“仁学”下篇里代表了这一呼声。他說：“用机器則一人一日为之有余，是貨可饒于人也”，“机器兴，斯乃治平之效也。”他在“报唐佛塵书”里也提出“专主散利于民”，使他們“趋利若鷙禽猛兽之发”而“其民日富，其国势亦勃兴焉”的主張。

第三，湖南社会自乾（隆）嘉（庆）以来，土地日益集中，农民脫离土地的現象即已非常严重。經过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农民大量参加了太平軍的革命行列，或者参加了湖南各地天地会領导的起义队伍，或者受了曾国藩等地主武裝集团的誘騙，参加了湘軍和其它軍队，这些脫离土地的农民在战爭中有过大量死亡，地主阶級也受到过沉重的打击，照說湖南地区农民无以为生的社会問題应得到和緩。但是，情况却与此相反，在內战时期的龐大軍費又与日俱增地强加在湖南人民的头上。据駱秉章在“湖南軍餉缺乏請免再撥黔餉摺”里說：“近数年来，用兵益繁，餉項益絀，地丁錢粮而外，所恃以挹注者，全賴本省厘稅輸得。……四年以来至今，援邻之师，均系裹粮从軍，且系有时接济邻餉，約計所費，不下六百余万两，而本省防御之費不預焉！”这些龐大数字的軍餉厘稅，加重了湖南地区农民的負担，他們不得不將过去僥倖保留的些許土地全部出賣。另一方面由于屠杀太平軍的地主武装湘軍，多起家于湖南，在鎮压太平軍的过程中，他們到处掠夺財物，“每破‘冠’，所擄金币珍貨不可胜計，人人足于財，十万以上貲殆百数”（“湘軍志”籌餉篇）。这些劊子手們，在屠杀太平軍以后，“衣錦还乡”，便傾出擄掠得来的大量金銀，瘋狂地从农民手里搶夺土地。于是湖南地区的土地又較以前更为集中，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人数較前大为激增。曾国荃一人就拥有土地百頃，而跟随他們的那些用湖南人民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的文武官員們的数字，又龐大到惊人的程度，即以湘乡一县而論，一二品大員即不下千家。如果以祁阳欧阳利見（原先一无所有，鎮压了太平軍以后，被任为提督軍門）积田千余亩（年收租三千石）的数字为例，那么湘軍系統中的官僚地主們，在湖南拥有土地的总和数字，是龐大得非常惊人的。农民既日益失去土地，就不能不被迫租佃地主的土地，受地主的殘酷剝削。地租又跟随着佃种土地人数的增加而日益增加着，以押租一項而論，醴陵一县，押租金額就从道光时（1821—50年）的一石租，銅錢三千百文，增加到咸（丰）同（治）間（1851—74年）的五千七百文，再增加到光緒时（1875—1908年）的六千五百文（参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第35頁）。地租剝削到如此殘酷的程度，加上清政府在此时期，因战費、賠款费和办洋务而增加的賦稅和厘征，使湖南地区的阶級矛盾又空前的尖銳了。哥老会組織的活跃和会众人数的增加，說明湖南社会又頻临于农民大起义的前夕。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滿楼”的暴动前夜，地主阶級內部具有远見的知識分子自不能熟視无睹、充耳不聞，他們企求找出一个和緩这一阶級矛盾之道，解除即将到来的大起义的威胁。維新运动的骨干分子譚嗣同对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同情的，他說：“洪楊之徒，苦于官吏，挺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对于屠杀太平軍的汉奸劊子手曾国藩等地主武裝集团的湘軍，也曾指責其为“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余。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嚾然驕居，自以大功”为“至可耻恶”。从而提出：“富而能設机器厂，穷民賴以养，物产賴以盈，錢币賴以流通，已之富亦賴以扩充而愈厚”的“理財富”（仁学下）开財源的办法，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来解决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人口問題，使他們不致“挺而走险”。在政政治上还提出了“自由”和“平等”的“民主”主張，进一步从政治上去緩和矛盾。

上述这些就是以譚嗣同为骨干的改良主义者的維新运动在湖南特别活跃的社会根源。然而这个时期还是湘系軍閥，在曾国藩、左宗棠相継死后，与后来居上独攬洋务的淮系軍閥，爭夺权利，几經斗爭，从而轉入于反对洋务、“仇視洋人”的当儿。这就使得維新派在湖南的活动，遭遇到非常頑固而且是有力的反对。維新派在湖南提出的各項改良主义的主張，如“废科举”、“开学堂”、“兴实业”、“張紳权”等，全部受到湘系軍閥所支持的、以大劣紳王先謙、叶德輝为首的旣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他們为什么反对呢？道理非常簡单。八股废，改試“策論”，将使湖南的生員，弃其过去所学，轉而研究西学的“格致之求”，劣紳們过去所賴以“領导人倫”、“保卫圣道”的依据，必然丧尽，他們就不能再儼然地以老师宿儒自命了。学堂开办，各地书院势必随之关門，至少也得馬上清理，劣紳們原先以“山長”身分盘据的地方亦将丧失。特别是开办实业，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将必趋之若鶩，佃地而耕者少了，殘酷的地租剝削，自然也将降低。

至于兴紳权，劣紳們原先也自認为对他有利，等到看到維新派所賴以兴紳权的人选，不是他們，而是那些"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間，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的后生小子时，他們又感到此輩一出，他們过去所賴以作威作福的政治上的特权，也将轉移到这些人的手中。基于这些卑鄙的自私自利的打算，以大劣紳王先謙、叶德輝为首的顽固派就死硬地站在反动的地主阶級立場，并依靠湘系軍閥官僚集团中的顽固派的力量，揹起了"維护名教"、"保卫圣道"的假招牌，扭詆維新派的"倡平等"是"无君上"、"兴民权"是"墜綱常"，向維新派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瘋狂的阴险狠毒的进攻，以便扼杀这一枝正在怒发的、对他們不利的維新运动的幼芽。这就是湖南顽固派与維新派展开猛烈斗爭，并远較他省更为激烈的原因。

二 湖南維新思潮的演变

談湖南的維新运动不能不談到湖南維新运动的先驅者，也是中国向西方找寻应变之道的先驅者——魏源。他亲自看到了第一次鴉片战爭和太平天国的革命，深深感到当时中国的大患，一方面是海警迭至；另一方面是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站在統治阶級立場的魏源，針对当时情况，根据他的"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的認識，提出了"师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进而具体倡議："在广东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引取佛兰西（法国）、弥利坚（美国）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舵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盖船厂非徒造战艦也，战艦已就，則閩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爭先效尤……詎非軍国交便！战艦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一。火器亦不徒配战艦也，……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尽，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海国图志，卷二）除此以外，他还針对当时科举和政治上的流弊，認为改良政治的起点，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討朝討国故始，舍胥吏例案，而謀訏謨，图远猷始"（圣武記卷十一），并提出"墨利坚（美国）之以部落代君主，其章程可垂世而无弊"为其最高鵠的。在經济方面，他还提出了"若浙江之南田山，福建之封茶山，許民屯墾。沿海之銀矿山，許民开采。境内自然之利，用之无尽"的裕財源，尽地利，苏民困的开源主張。这些就是后来湖南維新思潮循以发展的三大核心。

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燾、曾紀澤等洋务派軍閥官僚，窃取了魏源的練新兵、办洋机器的图强主張，来实現他們的"平中国有余"的目的；也采用了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針，来办理外交。而对魏源的"竭耳目心計之力以前民用"和"討章程"、"图远猷"的主張，則一概拒絕。这就充分說明了官僚軍閥的洋务运动的买办性和封建性。

魏源向西方寻求"应变"之道所得出的三項方案，虽得不到湘系軍閥的全面支持，但他的这些主張到了改良主义維新派的手里，却在理論上得到了系統而全面的发展。这就是譚嗣同为核心的湖南維新派所提出而且部分地实施了的"兴机器"、"办实业"，"废科举"、"立学堂"、"开議院"、"兴紳权"，和"广民利"、"裕財源"的三大主張。这些是經过当时湖南巡撫陈宝箴父子、按察使黃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鑄、以及熊希齡、唐才常等人的籌划与贊同而施行的。但作为理論体系提出来的則是譚嗣同。譚嗣同在他的仁学"和他給当时人的通信里較系統而全面地闡发了这些主張。

首先，对于魏源"师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譚嗣同进一步体会到"西人虽以商战为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以商为战，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技至巧而至毒"（报貝元征书）的道理。因而在經济方面，他提出了自由竞爭以"兴实业"；亦即以西洋人之道和西洋人展开商战的主張。他說："一人获利，踵者紛起，率作兴事，爭先恐后。不防民之貪，轉因而鼓其气，使皆思出而任事。是以趋利若鷙禽猛兽之发，其国势亦勃兴焉"（报唐佛塵书）。对于政治方面的問題，由于他深刻地感受到："外患深矣，海艦潛矣，要害扼矣，堂奧入矣，权利夺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权教与种将偕亡矣！"的民族危机，就力竭声嘶地提出了"唯变法可以救亡"的主張。"不惜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即不能兴民权，亦应畀紳耆議事之权"；"夫苟有紳权，即不必有議院之名，已有議院之实矣"（致欧阳中鵠书）。并在"治事篇"中提出組織学会的办法，来作为"士会于痒而士气揚，农会于疆而农业昌，商会于四方而商会孔長"，"各以其学而学，即互以其会而会"，"会成而学成"，"近之中国，远之五洲，挈其長短，权其利弊，孰得孰失，奚取奚从，菁华萃萃，終朝可定"，"于是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的机构，来实現他們变陈法，兴民权的初步目的（当时湖南时学会就是这一理論的实現）。在

发展有用之物以裕财源、舒民困方面，由于他認識到："用机器则一人为之有余，是貨饒于人也。一人百日为之而不足，用机器则一日为之而有余，是貨可饒于日也。日愈益省，貨愈益饒，民愈益富，其为功于民何以哉"（仁学下篇）的道理。他就极力鼓吹，使用机器，兴办实业，并在"仁学"里具体指出："有矿焉，建学兴机器以利之"；"有田焉，建学兴机器以耕之"；"有工焉，建学兴机器以代之。""大富则設大厂，中富附焉，或别为分厂。富而能設机器厂，穷民賴以养，物产賴以盈，錢币賴以流通，已富亦賴以扩充而愈厚。不惟无所用俭也，亦无所用其施济。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以发其复，遂至充溢溥遍而收博施济用之功。"然后总結說："故理財者，幸毋言节流焉，开源而已。"

根据上述材料，我們可以結論說：第一次鴉片战争后至义和团革命运动前夕，湖南的改良主义維新思潮，是从魏源开始的。魏源的制造船炮、使用机器、"师夷之長技以制夷"和"舍帖括"、"图远犹"、刷新政治以图强，許民"屯墾""采矿"辟財源的裕民强国以"应付变局"的思想，經过譚嗣同等人就演变发展为：展开自由竞爭，以抵制侵略者的商战；废科举，办学校，設議院，兴民权，以改革政治制度；用机器，办实业，开财源，裕民生，以緩和国內阶級矛盾和裕国富民的改良主义思想。它的核心內容是抵制侵略，革新政治，裕国富民。他們所針对的目标是国际資本主义的侵略，国內政治的腐敗，以及民穷財尽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它的基本精神是向西方追求眞理，以应变图存。

然而由于这些改良主义者們本身就是官僚地主，或者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們除了感受到国际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尖銳矛盾外，还感受到国內社会——特别是湖南社会空前尖銳的阶級矛盾存在。因而在鴉片战争前后的魏源，在筹划应付这两大变局时，虽然从沿海人民英勇杀敌的史实中，体会到民心可用，主張把"現在广州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漁販之人"，挑練成为"一等勇壯之兵"。但其企图是要达到"岂但国家添无数之精兵，而沿海少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梟匪"的"以毒攻毒，毒气尽而药力以消"的一箭双鵰的目的。生長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的譚嗣同，虽則从革命运动中認識到："洪楊之徒，苦于官吏，挺而走险"，是阶級矛盾发展到尖銳化的必然产物。因而主張設机器厂以养穷民，并进而提出一旦"民权兴，得以从容謀議，各遂其生，各均其利"的理想。然而終究由于他家庭出身与历史的局限性，始終脫离不开統治者的立場。在主观認識上，又由于深受荀学"尽窒生民之灵思使不复"的成見，恍于"湘軍中国人杀中国人之可战可胜"，及太平軍立国十余年，轉战十余省而終于一敗塗地的結果，沒有認識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因而就将自己变法的主張，看成为"发大心，誓拯同类"的"英雄"与"仁人"，并把广大的富于革命傳統和創造力的中国人民，看做只能等待着受他拯救的"群氓"，甚至还把全国各地人民群众掀起的"毁教堂"、"打洋人"的反帝斗爭，看成为"亡国之民"。这就使得譚嗣同及其同道只是同情人民，而不肯和不敢依靠人民，用革命的手段，从下而上的去实現自己的主張，因此，他只能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当譚嗣同及其同道者，期待着"变之自上順而易"（唐才常語）的希望已临近幻灭时，他們还不惜和素无信义的袁世凱打交道，希望能以口舌动权奸，图僥倖之一逞。临到政变已經发动，光緒已經被禁，譚嗣同在无可奈何之中，只有以"流血"来昌大"变法"，这自然是改良主义者必然的归宿。譚嗣同等六君子的流血牺牲并沒有使維新派人士完全放弃那种毫无希望的"变之自上"的主張，即以譚嗣同最接近的同志唐才常而論，在"殷鑑不远"的情况下，唐才常虽然发展了譚嗣同和他在以前曾經从事过的联絡会党的主張和办法，并組織和掌握了为数十余万的两湖哥老会会党群众，也考虑到使用武装起义的手段。然而他对于人民的智慧与力量，还是認識不足，仍然托名"保皇"以企求康有为的海外汇款，要挾張之洞来接受他的拥护，甚至还把希望附托于日本人的援助。因循复迁延，終于促成了自立軍起义的殞灭，和唐才常自己的喋血。

尽管这样，湖南維新派的志士們在历史上是起了巨大作用的。第一，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死，教育了人們，使他們認識到清朝腐朽統治者是不会放弃其任何权利，实現任何政治改革的。要想拯救中华民族，就必須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統治。基于这一認識，湖南的革命志士在此后就逐漸增多起来。第二，自立軍的失敗使湖南留日学生，和全国留日学生及华侨認識了康梁等保皇党的本质，而逐漸脫离他們的影响，轉移到革命派方面来，从而加速了民主主义革命势力的发展。第三，通过譚嗣同、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絡会党的先例，湖南的革命派如以后的黄兴等人，就更注意于联絡会党，和策动軍队的工作，并掀起了多次武装起义。所有这些都是湖南維新派的鮮血培育出来的幼芽。

关于甲骨的基础知識

李学勤

一 甲骨和甲骨学

从夏代到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材料，研究这一段的历史，必须更多地依靠考古学的成果。关于商代的史料应以甲骨卜辞为主。对甲骨卜辞的內容及其規律的研究属于甲骨学，这是一項新兴的史料性的輔助学科。

甲骨是古代占卜的遺物。在商代，崇拜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原始宗教是占据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态，有疑难事情一定要求神問卜，燒灼龟甲或兽骨，看甲骨上的裂痕，借以“决定”吉凶。这种巫术在中国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龙山文化），在商代异常盛行，到周代及其以后也还有遺留。

甲骨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有字的古代甲骨，主要是河南安阳地区出土的大量的殷代（盘庚迁殷后的商代后半段）甲骨。此外，在郑州二里岡也曾采集到三片殷代有字甲骨；在陝西長安張家坡和山西洪赵坊堆村則出土了少量的西周的有字甲骨。

安阳是殷代商王国的首都遺址。清光緒初，当地农民在耕作时偶然发現了甲骨，充作药材出卖。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有古物商人把甲骨运到北京；第二年（1899年），北京的金石学者王懿荣第一个鑑定了甲骨是重要的古代遺物。从那时到現在，恰好是六十周年。

1903年，著名小說“老残游記”的著者刘鶚刊印了第一部甲骨結集“鉄云藏龟”，可以視为甲骨研究的起点。1904年，孙詒让写了第一部論述甲骨卜辞的著作“契文举例”。从1928年起，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陆續进行了十五次发掘，有很大的收获。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継續在安阳作更有系統更科学的发掘工作。截至目前，科学发掘或解放前私人盗掘所得有字甲骨，数量已达到十万片（包括整版和碎片）左右。

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其时代为商王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和帝辛前期。它們絕大多数是商王問疑的卜辞，即“王卜辞”；也有少数是商貴族問疑的卜辞，即“非王卜辞”。

二 卜辞和占卜程序

甲骨上面所刻的卜辞是关于占卜的記載，因而要理解卜辞的內容，必須对占卜的程序有所認識。下面所述是以最典型的武丁王卜辞为例，其它时代的或非王的占卜一般說要簡单些，可以类推。

殷代占卜用龟的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有时也用羊、猪、鹿等的肩胛骨。胛骨一左一右为一对；龟甲对半剖开，也算一对。一对胛骨或龟甲称为一“屯”（純）。商王所应用的甲骨常是国內各地或各属邦貢納的，例如武丁时有一次就由光貢納了五百十八只龟。每批甲骨是那里貢納的，由誰送来，数量多少，都要記录下来。

甲骨在供占卜前要經过加工修治。第一步把血肉除淨，这叫作“剔”。第二步是鋸削磨平。对于腹甲是削平甲冉；对于胛骨是削平背面突起的胛岡，这叫作“工”。最后是制造若干备灼的“凿”。在甲的內面或骨的反面（原有胛岡的一面），先用刃具挖出長約一厘米的枣核形的窪穴，再在其一側用青銅鉆鉆出或用刃具挖出一个和枣核形穴通連的圓形窪穴。“凿”的排列是整齐有序的。在少数例子中，也有在胛骨下端寬薄部分（骨扇）的正面作凿的。这一步驟叫作“示”。負責加工的人名也要記录。

加工完竣的甲骨成品，就交付管理占卜的卜人保管。保管者的名字同样也应記录。

上述三項記录，都刻在甲骨的沒有鉆凿的部分，如腹甲两冉內面，背甲外緣內面或頂端，胛骨臼端或骨扇。这些記載合称为“署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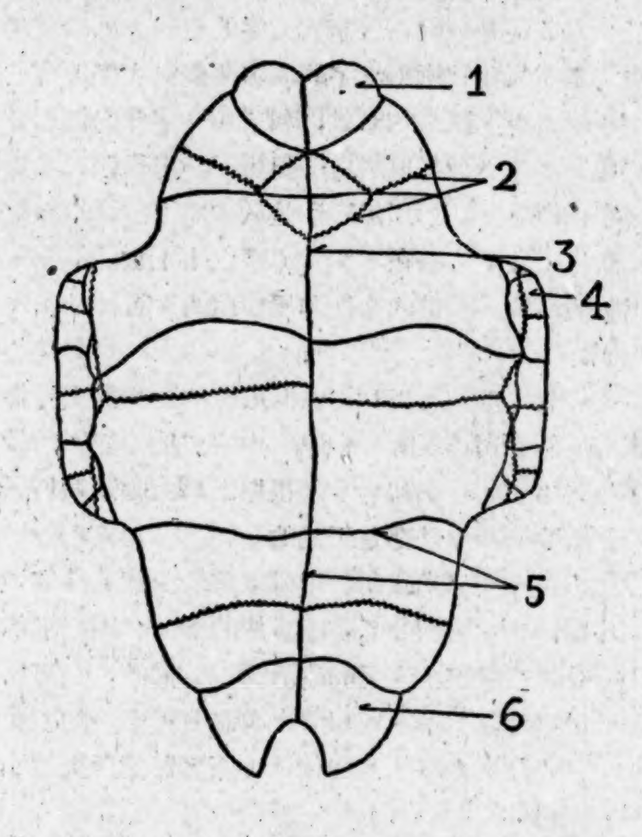
当然，在需要匆迫时，也有随凿随卜，甚至不經鋸削的例子。

施行占卜的卜者，有时是王或貴族，有时是专职的卜人。由卜者用火炷燒灸甲骨上凿的圓穴，于是在甲骨的正面就呈現“卜”字形的裂痕，称为“兆”。卜問一个問題，一定要先从正面問，再从反面問，例如先問下雨，再問不下雨，每一問要灼若干个兆。占卜的日期和卜者的名字（“前辞”）、卜問的問題（“貞辞”）都要記录在甲骨上。兆的

次序和性質也要記在兆的旁边，这叫作“兆辞”。

每次卜問，最后究竟是吉是凶的判断权属于商王，这也就体現了商王在政治上的决定权。王所作制断記在“貞辞”之后，称为“咼（果）辞”。卜問后，王应把占卜的結果告知商人的部落議事会（多君）。

最后，关于所卜事項的实际結果，是否証实占卜的預測，記在“果辞”后面，称为“驗辞”。



腹甲

1.甲首　2.齿紋　3.千里路（中央盾紋）
4.甲舟　5.盾紋　6.甲尾



胛骨

1.骨臼　2.臼角
3.骨边　4.骨扇

凿的形狀

經过占卜証驗之后，刻有卜辞的甲骨便成为一种档案。对于特別重要的卜辞，还有时在字画里塡上朱墨。这些甲骨一般是皮藏起来，例如在安阳小屯村 YH 127坑出土的某一貴族所卜腹甲上，我們曾发現記有“三冊，冊凡三”一辞，即共有九版集合在一起。

上述卜辞都是用鋒利的青銅或玉質的刃具刻在甲骨上的，但偶然也有用毛笔蘸朱或墨写成的。完整的卜辞包括上面提到的署辞、前辞、貞辞、兆辞、果辞、驗辞六部分，試举武丁前期卜辞两例如下：

殼。（署辞，卜人署名）

癸丑卜爭貞（前辞，癸丑日由卜人爭占卜），自今至于丁巳，我𢦏᠎𦉪？（貞辞，正問）一、二、三、四、五。（兆辞）

癸丑卜爭貞，自今至于丁巳，我弗其𢦏𦉪？（貞辞，反問）一、二、三、四、五。（兆辞）

王果曰：“丁巳我毋其𢦏，于来甲子𢦏。”（果辞）

旬又一日癸亥，車弗𢦏，之夕𥁕；甲子允𢦏。（驗辞）

（“殷虛文字丙編”1）

易入廿，妇巹来。（署辞）

庚子卜爭貞（前辞），西使旨亡祸，叶？（貞辞，正問）一。（兆辞）

庚子卜爭貞（前辞），西使旨其有祸？（貞辞，反問）一，二告。（兆辞）

王果曰：“其惟丁弘𢦏。”（果辞）

（同上5）

三　卜辞的書寫格式和內容

在閱讀甲骨卜辞时，关于卜辞书写格式的知識是必須知道的。

商代的文字，和后世的习慣一样，是上下排成直行，然后向左轉行，但在甲骨上就有不同。总的說来，靠近甲骨外緣的卜辞都向內轉行，在左側外边的卜辞向右轉行，在右側外边的卜辞向左轉行；在腹甲上，靠近“千里路”的卜辞則向外側轉行。

在一版甲骨上，每条卜辞原則上应刻在它所关联的兆的附近，有时还画一条綫，把它与别的兆和卜辞隔开。如果刻不下，可以轉到反面，或把前辞刻在反面。

有时卜問一件事同时用几版甲骨分卜，这时各版的兆的次序是联續的。

如前所述，卜辞要从正反两面卜問，所以卜辞

一定是成对的。在腹甲上，一对卜辞分刻在"千里路"两侧的对称部位。在胛骨上，卜辞多刻在骨边上，由下向上排列，隔一辞或两辞对卜，如第一辞和第三辞、第二辞和第四辞正反成对。

胛骨边上面积狭小，所以在武丁时常只刻几个字，而詳細的卜辞則抄在骨扇上，骨扇和骨边互相对照。

由于商王和貴族們几乎每事必卜，所以卜的內容是非常麗杂的，很难而且也没有必要詳細归納分类。最常見的是关于祭祀、战争、狩猎、晴雨和"卜旬"（十天之內的吉凶）、"卜夕"（当夜的吉凶）的卜辞。

四 卜辞的史料价值

卜辞的內容是相当丰富的，它全面地反映了商王国的政事和王室貴族的生活。根据卜辞，我們就能够研究商代的历史。

首先是商代的社会史。从卜辞中可以看到，殷代已經是相当成熟的早期奴隶制。殷代的商人还保存著氏族組織，而且商王还没有充分掌握处理氏族成員的生命的权力。商王国时常发动对邻近小部族的掠夺战争，强迫他們負貢納的义务。商人也奴役战俘（有人认为商人把战俘全部杀戮，是錯誤的）。农业是商人的主要生产，商王常命令成千的氏族成員（"众人"）进行集体耕作，通过这种集体耕作和建筑等方面的差役，对氏族成員加以奴役和剝削。卜辞中的社会史料，还有待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

卜辞也是珍貴的科学史史料。卜辞中有中国最早的日食、月食記录，这也是世界史上最古的日月食記录之一，例如：

癸未卜爭貞，翼甲申易日？之夕月有食，甲寅，不雨。（"殷虛文字丙編"59）

这是武丁时代月食的一条記載。卜辞中还有相当詳細的气象記录，例如：

癸巳卜王，旬？二月。四日丙申，昃雨自东，小采既；丁酉，雨至东。

（日本京都大学藏背甲）

这是說：丙申这天黃昏，由东方来云下雨，到了天黑时停止。从一些記有月份的气象記載，可以考察当时安阳地区的气候情况。此外，根据許多可以組合的卜辞，还可以研究殷代的曆法。

研究殷代的历史地理，也必須依靠卜辞。联系卜辞中所記地名，系統地加以考訂，就可以指出殷代許多重要城市、山川、狩猎地点和方国的地理位置，并且了解当时各次战役的行程。例如帝乙两次征伐的人方，以前都誤认在商的东方，仔細考察，知道它实际在陝西省渭水流域。又如成湯所居的亳，汉代以来有种种推測，从卜辞才知道它位于河南北部，黃河以北，沁水以西，太行山以南，"商君书""賞刑"篇說湯封于修武以北的贊茅，乃是唯一确实的記載。

卜辞还是研究古代語言文字的資料。卜辞所用文字是今天我們所用汉字的最古的直系文字，有些字还没有脫离繪画的形式，如"馬"字象一匹馬，"鳥"字象一只長尾的鳥；但也已經出現了許多形声字和指事字，如"洹"字是从"水""亘"声，"厷"（肱）字是在"又"（手）字上加一笔标识出肱的部位。卜辞的文法和周以后的文言文法基本相同。

甲骨卜辞又可以和文献与殷代的器物銘文互相印証。例如司馬迁的"史記"中的"殷本記"記載了商代諸王的世系和名号，根据卜辞，知道司馬迁的記載除一两点外都是正确的。

但是我們必須說明，甲骨卜辞的內容是具有很大片面性的。它們都是王或貴族的卜辞，因而不能充分反映当时广大人民的生活情况。因此，在研究商代历史时，除了运用甲骨卜辞和各种器物銘文外，还应該更多地注意商代遺址墓葬发掘所提供的考古資料。

甲骨卜辞是一种珍貴的史料，我們必須在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指导下，充分占有这項史料，但决不可以甲骨学代替科学的古代史研究。

六十年来出土的甲骨卜辞，絕大多数已經著录发表了。但甲骨学这一学科，解放前長期被封建学者（如罗振玉）、資产阶級学者（如董作宾）和帝国主义分子（如明义士）垄断把持，他們鼓吹无用的煩瑣考据，斤斤計較于点滴孤立的一字一义，实际阻碍了甲骨研究的发展。关于甲骨眞正的科学的研究是由郭沫若先生开始的。郭沫若先生等历史学者在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指导下，占有了这項珍貴史料，用来研究商代社会的历史，才使我們对商代的历史有了一定的認識。郭沫若先生在1933年編印的一部"卜辞通纂"（近将再版），截至現在仍是初学者最便利的途徑。其他如胡厚宣先生所編著的"五十年甲骨学論著目"及"殷墟发掘"也可供查閱。

十九世紀中叶印度民族革命

〔印度〕 P·C·乔希

馬克思在他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里引述并且評論了英国反对党領袖狄斯累利1857年7月27日的演說："他（狄斯累利）断言直到最近十年为止，英国在印度的帝国是建筑在分而治之这个古老的原則上的，在施行时尊重了印度所包括的各个不同民族，避免干涉他們的宗教并且保护他們有土地的紳士。土兵軍队是一个保险栓，用以吸收印度的扰乱分子。可是近年来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种新的原則，一种消灭民族的原則。它是以粗暴地摧毁土著王公，扰乱财产安定和干涉人民的宗教来实現的。

"狄斯累利先生……得出結論，印度目前的扰乱不是軍队叛变，而是民族反抗，土兵軍队只是反抗的有力工具而已。他在辯論結束时劝告政府致力于改革印度的內政，以代替目前所遵循的高压路綫。"①

让我們回顧一下当时英国历史家和傳記家的意見。那时候他們写得更坦率些，还没有后来那些研究印度問題的英国专家們的自以为是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气味。

麦卡塞說："事实上是印度半島北部和西北各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土著种族反抗英国政权的起事，并不仅只是土兵軍队起来反抗；无論如何决不只是軍队叛变。这是由于民族仇恨、宗教热狂和軍队中的不滿相結合而引起的对于英国占据印度的反抗，土著王公和土著士兵都参加在內。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泯除了他們古老的宗教成見，联合起来反对基督教徒……。"②

包尔写道："洪流終于冲决了堤岸，而滲透印度的精神土壤。当时預料浪潮会压倒并且扫除全部欧洲的因素，而革命的洪流再度氾范的时候，摆脫了异族統治的爱国的印度，将只背向一个独立的土著王公低头。运动現在已帶上一层更重要的色彩。它已变成整个人民由于对英国統治的反感而引起的、并且以一种热狂的仇恨而維持下去的起义。"③

伦敦泰晤士报的名記者罗素尔写道："这里我們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奴隶的反抗战争和农民暴动的混合物，而且是宗教战争、种族战争、复仇战争，全民族决心并且希望摆脫异族枷鎖，重建土著君長全权統治，恢复本土宗教全部势力的战争。"④

馬力逊以土兵軍队叛变为主題写出了三卷本的历史。在起义被鎮压后八年，他又来到印度并与各行各业的人談起1857年起义的旧事，后来在他1891年所发表的那本小书"1857年的印度兵变"內，承认起义的背景的民族因素的重要性。"环境为我証明，外在的原因发生作用，在一世紀以来一直是我們忠实可靠的仆人的心里，鼓动起一种恶感，一种民族的而不是个人的仇恨。"⑤

且让我們看看英国历史家們关于1857年风暴中心奥德地方的起义的重要議論吧，英尼斯說："至少必須說奥德人的斗争是一次独立战争。"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秘密小組于1858年4月19日給总督的信里提到："奥德的战争由于突然废立君主和断然处理財政，令大批地主失去土地，而带来很浓厚的群众性。

在这种情形下，在奥德发生的敌对行动，宁可认为是带有正式战争的性質，而不能认为只是一場

① 馬克思于1857年8月14日在紐約每日論壇报发表的名为"印度問題"的未署名文章。据柏林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所藏的照像版本。

② 轉引自薩瓦卡："印度独立战爭史"，第12頁。

③ 包尔："印度兵变記"，卷1，第642頁。

④ 罗素尔："1858—59年我在印度的日記"，第164頁。

⑤ 馬力逊："1857年的印度兵变"序言，第8頁。

⑥ 轉引自薩瓦卡书，第357頁。

叛乱。”①

奥德的斗争虽然有最广闊的基础，最深的根源，是最发展的并且是横扫一切的，可是它与其他各地的斗爭并没有什么本質上的差别，而仅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参加的人員和領袖、面对的敌人、問題和爭端都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形下承認在奥德发生的是独立战爭，而別处的不是，是既不合于常識也不合乎历史的。另一方面科学的方法論要求我們在研究一个在过渡期間发生的起义，象印度于1857年的那样，只能从它的最发展阶段，例如在奥德的，去观察它的眞实性質。

另一个判断起义的性質的方法，是查明究竟是誰，究竟有多少人效忠于英国政府，和广大人民对于这些忠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如果有人想提出一个在叛变地区內效忠于英国政府的印度官員名单，我們就可以看出大部分印度官員加入了起义軍方面。这可以在各个地方長官向总督所提供的回顧叛乱过程的报告內得到証明。

甘浦尔地方長官于1859年1月3日报告說：“奥姆拉們（Omlah 指印度官吏）的变节自然在本地区內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他們以副征税官为首，全体一致地悄悄地投向对方，而屈服于新政权。副征税官在組織那拿的政府中极其活跃。我对于这种公开的叛逆，这种败坏官常的叛逆，在刚刚到达当地以后，就用死刑来加以懲处。”②

章西地方長官于1858年11月20日写道：“奥姆拉和土著下級官吏們的行为一般都是很坏的或者中立的。”③

沙哈兰坡地方長官于1858年11月15日向西北省政府秘书長报告說：“警察們苟且偷安，簡直一无举动。他們仿佛是已与人民有了勾結，彼此互不干涉。如果乡民們容許警察安坐在派出所里照支薪水，警察們就让乡民們任意犯罪不加干涉。”④

坎尼地牧师說：“在很多事例中叛乱已經扫除一切个人关系和对于旧主人的感情。在这种情形下再向英国政府效忠所可能受到的指責是难堪的。大家都曉得那些少数为我們效忠的士兵不仅为同僚們所不齿，也为与他們同种姓的人所排斥。有的人甚至連自己的家都不敢回，他們不但会挨罵，或受不到兄弟般的爱撫，而且有丧失生命的危险。”⑤

如果这些士兵或其他为英国服务的人們能够这样地在社会上被排斥，这豈不是1857年起义具有民族性和群众性的肯定証明嗎？

尽管如此，我們仍看到馬朱姆达博士写道：“事变的失败可以归咎于叛軍和他們的領袖，以及广大群众都不是为任何崇高理想所鼓舞的这一事实。”⑥

让我們撇开人們所熟知的例子，不从叛乱的重要中心，而从辽远的外围地区，不在革命高潮易于使人奋勇的时候，而是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选一些不为人們所知道的例子来加以检查。

德里和勒克脑陷落以后，英軍总司令甘柏尔計划用三支野战軍包围并且驅逐奥德和多阿布的叛軍退向法蒂加，以备最后消灭他們。华浦尔将軍从甘浦尔进軍，但在伊塔瓦地方为一小股叛軍所阻。这支軍队“人数虽少，并且只配备些火繩枪，但为一种甘心就义的精神所鼓舞，决心为他們的事业而献身”。华浦尔偵察了这地方。作为一个阻拦大軍的据点，它并不是很重要的，也不是难于攻下的；但是面对着守軍来征攻这个据点也要付出重大的生命代价，而看来似乎可用輕易的不用花多大代价的手段即可以奏效。这些簡易的方法最初都使用过，英軍投擲了手榴彈，并且企圖用稻草的烟把守軍們熏出来，但都无效。守軍們不断地从他們的枪眼內向攻击者发射了有效的火力，整整的三小时使攻击者无法推进。最后，决定炸掉这个地方。为了这个目的，布奇耶，在工程队的帮助下把一些枪彈当作地雷埋在地下。爆炸后，守軍們都埋葬在瓦砾之下，他們得到所想望的烈士荣誉。”⑦

1858年2月25日强大的尼泊尔和英国大軍，越过郭格拉向安姆拔坡进軍途中，在丛林深处遇到一个险要的堡垒。它的战略价值很大，仅由34名叛軍防守。这座堡垒被攻击了，“它是用如此坚强的决心和勇气固守着，以致攻击者不得不付出死亡7人伤34人的代价才把它攻下。守兵們全部陣亡在他們的崗位上”⑧。

12月15日柯尔哈坡发生了一次地方起义，但它被鎮压下去了。英国軍官杰可勃在起义者被枪斃以

① 轉引自馬朱姆达：“1857年的士兵叛变和革命”，第224頁。
② “大事記”，甘浦尔，1857—58年度，第268號。
③ 同上，章西。
④ 同上，弥薩。
⑤ 轉引自薩瓦卡书，第281頁。
⑥ 馬朱姆达书，第275頁。
⑦ 馬力遜：“印度兵变全史”，卷2，第285—86頁。
⑧ 同上，卷4，第227頁。

前向他們說，如果供出同党姓名就可免死。他失敗了。后来他分析自己的經驗时說：

“整个阴謀策动过程中所具有的惊人的保密性是难以形容的。而計划的富有預見性，以及在每一組分別活动，隐蔽彼此間的关系，指示他們只够应付当前目的的內情时的小心謹慎，也是难以形容的。这一切都可以与他們彼此間的坚貞不渝相比美。”①

英国人搶劫勒克脑城的时候，有些印度的貴族妇女落在他們手里。英軍队長問这些妇女說：“你們不以为斗爭已經結束了嗎？”她們回答說：“正相反，我們相信你們終久是要打敗的。”②这种即在大失敗以后的自信心是民族起义所激起的革命精神的表現。

当我們談到革命的領导問題时，馬朱姆达博士为当时英国代表与义軍封建首脑之間暗地勾結的紀录所蒙蔽，指責了义軍的整个領导。他忘記了这次起义曾产生許多任何国家都会引以为荣的、甚至英国历史家也深致敬意的伟大領袖。

馬力遜用这些言語来称贊茂拉維·阿馬杜拉。

“茂拉維是一个非常的人。关于他的軍事領导才能，叛乱中有許多事可以証明。除了他以外，沒有人能夸口曾在战場上两次打敗甘柏尔的。如果說一个为自己祖国的独立横被摧殘而奋斗的人是一个爱国者，那么十分肯定茂拉維是一个眞正的爱国者，他从不用暗杀来沾污自己的宝劍，他也从不縱容杀戮。在战場上对于侵占他的祖国的异族，頑强、勇敢而光荣地作战。他的記忆是应受到各国一切勇敢而正直的人們尊敬的。”③

这些来自英国方面的热烈的頌贊，还可以在章西皇后、塔蒂亚多披、鼯瓦信和許多地方領袖們身上找到。

因此让我們学着向那些在1857年反英民族起义中尽了他們責任的普通人民和他們的領袖們重新致敬吧。

在这里回忆馬克思对于1857年民族起义的看法是大有启发的。早在1857年7月31日，他根据印度郵件中帶来的截至6月17日的德里的消息，用下面的話結束了他給紐約每日論坛报写的未署名的新聞通訊：“慢慢地会有旁的事实透露出来，足以使約翰牛自己明白他所認为的軍队叛变，实际是一次民族革命。”④

印度的历史家們可以継續爭辯1857年起义的性質，但是印度的人民大众早已認为它是印度民族运动的源泉。1857年的傳統对于印度民族思想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就連馬朱姆达博士也以如下的字句結束了他对問題的研究：

“1857年爆发的事变必然会当作对于英国在印度的統治的首次直接大規模挑战而在历史上流傳下去。这样它就启发了半个世紀以后为了从英国的奴役下爭取自由的眞正印度民族运动。1857—58年的回忆支持了以后的运动，为战士們灌輸了勇气，为冷酷的斗爭提供了历史基础和道义上的鼓舞。它的价値是无法估計的。被曲解了而籠罩在神圣光輝里的1857年的回忆，給予英国在印度統治的打击，也許比起义本身还重。”⑤

1857—58年的斗爭究竟是士兵軍队叛变，还是民族起义？这一爭論只能以公正地摆出事实，并且忠实地分析爭論者双方的特点，和这次斗爭的政治、經济和意識形态的性質才能解决。简言之，一个正确的历史評价要求正确說明究竟誰跟誰斗爭，和究竟是为了什么斗爭。本文就是按照上面所述来研究这一爭論中的問題的尝試。

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馬克思曾于1853年以如下的意味深長的話，作了扼要的說明：

“英国在印度的統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莫臥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們推翻了，总督們的权力被摩訶剌陀推翻了，摩訶剌陀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推翻了而当大家正在互相混战的时候，英国人突然闖了进来，并把大家都征服了。既然一个国家里不但有回教徒与印度教徒互相爭执，而且各个部落互相隔絕，各个种姓互相隔絕；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一种由其一切成員普遍互相排斥和永恒隔离状态所制約的均势上，难道这样一个国家和这样一个社会不是注定要成为侵略者的俘获品嗎？即使我們对于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难道一个巨大的不容爭辯的事实，即英国甚至今天还在利用由印度出錢豢养的印度軍队把印度控制于奴隶地位这一事实，还不够說明一切嗎？所以，印度不能逃

---

① 轉引自薩瓦卡书，第500—501頁。
② 罗索尔书，第400頁。
③ 馬力遜：“印度兵变全史”，卷4，第381頁。
④ 前引1857年8月14日馬克思未署名的文章。
⑤ 馬朱姆达书，第278頁。

說被人征服的命运。”①

伟大的起义开始以后，馬克思于1857年7月15日在一篇写給紐約每日論坛报的未署名的文章內評論說：“一百五十多年来英国力图保持它的印度帝国。英国霸权的根本政策一直是利用那些聚合起来形成地理上統一的被称为印度的各个种族、部落、宗教、种姓和主权之間的互相敌視。后来这种霸权的情形經过了一番改变。英印帝国在征服了信地和旁遮普以以后，不仅已达到它的天然限度，而且踐踏了印度各独立邦的最后痕迹……。

“它已不再利用印度的一部分去攻击印度的另一部分，而自处于首脑地位，全印度都已在它的脚下，它已不必再去征战，而已經成为征服者了。”②

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說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統治的特点是：“欧罗巴的专制主义移植在亚細亚的专制主义之上。③

在另一篇关于各土邦的文章里，馬克思又用有力字句分析英国人怎样征服印度，和終于引起反对他們統治的叛乱情形說：

“英国侵略者一經插足印度，并且决心保持它以后，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暴力或阴謀来摧毁土著王公的权力。英国循着罗馬政治的故轍，把自己置于与古罗馬对待其同盟者一样的地位。一位英国作家說：‘那是一种喂肥同盟者的方法，正象我們喂牛直到他們肥到值得一吃一样’。东印度公司按古罗馬的方法爭取同盟者以后，就用伦敦錢兌街的現代方法宰割了他們。

“为了能够履行他們对东印度公司所承担的义务，土著王公們被迫向英国人用高利举借巨款，等到債务无法清理的时候，債权人就鉄面无情，扭紧了螺絲，王公們只有被迫或者把他們的領土乖乖地让給公司，或者动兵打仗。他們不是成为向他們的篡夺者領取恩俸的人，就是被当作叛逆而驅下王位。現在印度各土邦約占地699,961平方英里，人口52,941,263人。但是他們已經不再是盟友，而是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条件的保护和津貼制度下的英国政府的属国了。这些制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邦放弃自卫和建立外交关系的权利，和放弃不受总督干涉自行解决爭端的权利。

“許可他們保持表面独立的条件，同时也是使他們永久腐朽，和丧失进步能力的条件。机能上的衰弱是他們能够生存的宪法，正象一切寄生者的生存一样。”④

这是对于接受津貼的同盟者的制度所产生的危害性的一个极其忠实的描述。回顧起来显示出一个可注意的事实，即印度学者直至本世紀头二、三十年才得出的結論，馬克思早在这些伟大历史事件实际发生时，就已指出其广泛而具有重要意义的梗概了。

当时英国作家中比較有远見的，对于馬克思所犀利分析出来的道理也多少捉摸到一点。例如霍威曾說：“一世紀多以来在正义和方便的借口下，不断剥夺印度王公領土的制度，也是一种世界上从未发現过、无可比拟的最微妙最堂皇的精神奴役制度。”⑤

达孚說：“在他們（印度王公）的首府設置着常駐的英国代表，这是使他們毁灭的原因，因为这些常駐代表的責任之一就是煽动分裂，”⑥

达豪西統治时代，开始了一种新的压迫政策，无原则地吞并土地，削减地位最高的被罢黜的王公的年金，因而使全印度斯坦惊惶失措。事实經过是大家都知道的。吞并奥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足以証明英国貪得无厌的侵略政策和无原则的吞并土地在全印度所造成的騷乱。

吞并政策的性質和后果可以用奥德作为典型例子来說明，馬力逊，研究印度叛乱的英国正統历史家，曾說：“不論为吞并奥德提供什么理由，就这个政策的执行方法来看，无可疑問它非但不能怀柔，反而使英国人与印度的每一阶級都疏远了。”⑦

当时曾在勒克脑任征税長官的古賓司，后来在他所編的勒克脑地区印度民族起义的报告內，記录了他所接触到的印度人的談話，其中之一說道：“印度斯坦的人民一致地在說，奥德属于国王，无論他的政府好坏，他并没有对英国人失信，或者有所損害。如果英国政府竟把一直对他們忠順的奥德国王废了，还有哪一个独立的王公能够保全呢。”⑧

英、印政治家中比較有远見的已經明白看到英

---

①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来結果”1853年8月8日，据柏林馬列学院本。（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29頁。）

② 馬克思的未署名的文章，1853年7月15日。

③ 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統治”，1853年6月25日。

④ 馬克思：“土邦”，1858年7月25日。

⑤ 霍威：“广地制度”，卷1，第43頁。

⑥ 达孚：“馬拉他人史”，卷1，第340頁。

⑦ 馬力逊：“印度兵变全史”，卷1，第348—49頁。

⑧ 古宾司：“奥德叛乱紀实”，第557—58頁。

国这个破坏一切的侵略政策的后果。例如馬尔康在更早的时候就曾警告說："君長們的傳統权力和他們属下的忠誠全都被扫除了，原来构成社会安定和秩序的最强联系的感情和关系被破坏和蹂躏以后，都变成不满和反叛的因素。"①

东印度公司的統治不仅是政治压迫，而且是狂暴的种族主义，每一个印度人都曾飽尝痛苦。这是东印度公司自从它統治印度以来的特征，也产生了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肖尔在东印度公司初建它的統治时說："印度人被认为是卑劣的异端。"② Seir Mutaqherin 一书的作者于1780年辛酸地記录着："英国人从来没有过問或关怀过我們③。这本书的法文翻譯者說："英国人在印度的一般心理是藐視作为一个民族团体的印度人，认为它比死尸强不了多少，可以不必多所顧虑而随心所欲地宰割。"④

印度人受尽了一切由于这种种族态度而来的侮辱和委屈，而最后开始了他們对于建筑在种族主义上的异族統治的斗爭。伦敦泰晤士报派来采訪起义新聞的記者罗索尔，在赴巴那拉斯途中发覺："从来没有看見有人对于白种人的車子投以友善的眼光"，"啊！那些眼光中所带来的言語，誰能再怀疑呢？誰能再誤解呢？仅只从这件事就可以知道我們白种人并不是为多数所惧怕的，而是被所有人所憎恨的"⑤。

英国統治下专横的种族压迫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从一切高級負責职位中把印度土著排斥出去。

1818年孟罗曾为了要求在行政机关中任用印度人員說："外国征服者以暴力对待本地人并且往往极为残暴，但是没有一个征服者象我們这样蔑視他們的；没有一个征服者曾毁謗过整个民族认为不值得信任，不配有誠实的品德，而且只有在非他們不可时才适于雇用的。要貶损一个陷于我們統治下的民族的品格，这似乎不仅仅是量狹，而且是失策"。⑥

孟买参議会的一位成員在一件議事記录內，更强烈地流露了不安和无可奈何的情緒。"无数有声望的土著官吏，在旧秩序被推翻而失业以后，竟以阴謀和怨言鼓动不满，并且广泛地散布它。"⑦

这种局势的危险性是英国統治阶級中比較明智分子所清楚預見到的。下面所举1832年英国国会小組会上的問答便是一个例子。

問題第138：

主席："你是否以为我們在印度所处的地位有一种經常而又无法捉摸的危机？"

亨利·罗素："彈盒內已裝滿了彈药，但是目前还没有足以燃着它的火花……（問題140）我們在印度內部的政府的大毛病是取消了土著中的上层阶級，它已造成那个阶級的完全消灭。（問題143）现在他們不能不对政府不滿，不只因为它是一个外国政府，而且因为他們在这政府中没有份，没有足以使他們希冀或期待的东西。"⑧

薩义德·阿合买汗曾在变乱中为英人效忠，后来在叛变被平息后写了他的名著"印度叛乱的原因"。他在书內說："印度土著，特别是伊斯兰教徒們不滿的另一原因，是土著不得担任高級职位。不久以前伊斯兰教徒們还在他們自己的政府之下充任要职。他們现在仍旧希望这样。他們渴望能在英国政府下抬高自己在全世界眼中的声誉，但是并没有为他們打开这条道路。英国执政初期，虽曾挑选有身份的土著担任高級职位，但是后来又逐渐停止了。"⑨

这种有組織地排斥印度人，使他們不得充任高級官职，是一种反对印度的政策。印度上层阶級的有理由的不滿，是一个重要民族因素，是造成印度人民起来反抗英国統治的种种原因之一。

就印度的人民大众来說，他們认为英国的行政制度是既腐敗而又是外来的。

英国人勃里查指責"我們法院的腐敗和貪污"。作这样批評的不只他一个。英国法律程序的繁复，是一般没有知識的种田人所难于了解的，他也不能雇用律师为他申訴。而按照旧时的傳統，"法院对一切人都是公开的，連最貧穷的农夫也可以不受任何阻撓提出他的申訴……"。现在法院在有錢的人和坏人手里成为不公平的压迫工具，只要有錢就可以

① 1831—32年議会文件卷14，文件第735—Ⅱ，第146頁。
② 肖尔："杂記"，第116頁。
③ 轉引馬宗姆达书，第20頁。
④ 轉引自乔德荷利："印度的內乱"，第22頁。
⑤ 罗索尔书，卷1，第146頁。
⑥ 轉引自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中文見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第422頁。
⑦ 轉引自乔德荷利书，第210頁。
⑧ 同上，第210—211頁。
⑨ 薩义德·阿合买汗："印度叛乱的原因"，第44頁。

收买假証人，揑造伪証据。阿哥拉地方法院的一位法官說："他們（指西北省的人民）有充分理由憎恶我們的民事訴訟程序。"①英国統治者把各地方的代表机构如乡議会从行政职能中排除出去，而乡議会是維持秩序，保护他們自己的权利，履行对国家責任的傳統行政机构。英国人另外强行建立了一套雇佣的警察制度。

在1857年內印度人民以一遇机会就搗毁警察派出所、稅局和金庫來表示他們对这种制度的仇恨。

这种仇恨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如果記住英国制度是不合印度傳統、有損印度利益，而且为印度人所敌視的。当时的英国官吏們也知道这一点，其中比較有头脑的人，为这种現象所震惊，在英国議会內外提出了問題。罗索尔极其坦率地說："这是一种极其純粹英国化的制度，没有一点印度气味，与当地原來的体制不合，也与当地居民的习慣和意見不合……印度人民对于我們的制度毫无信心……我們政府对于他們的意見也毫不同情……其它各邦沒有得到这些便利的臣民……認为轉移到我們的統治下是他們所可能遭遇到的最大灾难。"②馬尔康的結論是全印度的各阶层看不見別的，而只見到"一种迫使他們立刻衰敗而最后毁灭的制度"③。肖尔在更早以前描写当时的情形說："我們的帝国象是一个由洪水冲积起來的沙島，我們沒有筑起堤岸，种下树木，使树根深入地下而把土壤維系住。"④在达豪西压倒一切的統治时代，罗威在他的"記录"里記載道："印度的土著在各方面都完全象世界其它各处的居民一样，对于自己的风俗习慣比外国的更喜欢。"⑤

弥盧的起义士兵在他們越过賈木那河、从英国人的枷鎖下解放古印度的傳統首都时，拥立了阿克巴的被废子孙巴哈搭沙为印度斯坦的万沙之沙（万王之王），确是一着天才的举动。

这个事件的革命意义是众所公認的。包尔曾用以下的話描述它："弥盧的士兵們轉瞬之間找到了一个領袖，一面旗帜，和一項事业。軍队叛变已經轉化为革命战争。"⑥

巴哈搭沙本人是一个迟鈍衰朽的老人，但这在当时对于日在开展的历史斗争并无多大关系。他作为曾經長期統治印度的德里莫卧儿王朝的嫡傳子孙，立为印度斯坦的君長是可以在政局中举足輕重的。英国人也認识到并且利用了这形势，自从雷克于1803年9月15日越过賈木那河，英国軍队第一次进入德里时候起，就已經决定照从前样子保留莫卧儿巴哈搭沙。

英国在德里的首長，麦梯加尔弗說："在城內保留双重的行政权力是比較好的政策。保留莫卧儿王朝的虛名，以免因为废立国王而使全印度的伊斯兰教徒惊惶。但是連头脑最迟鈍的人也可以看出，德里的新政权尽管可以暂时在土著的眼光中成为印度斯坦的实际統治者，只要旧的王朝的影子还存在，它仍旧会被人認为唯一应当尊敬的权力，唯一的光荣。貴族們仍旧使用国王給他們的头銜。各种通用貨币上面仍鑄着在位的君主的名字。各小邦的繼任人必須向国王請封，有时这种要求被拒絕，还要由英国的常駐代表出面向莫卧儿国王說情。发生变乱，象后來发生的一样时，人們还仰仗国王的保护……。

"在每次屈辱之后，君主仍旧在位，并且逐漸恢复他的声势。土著人民接受一个受过屈辱的王族为他們的皇帝时，总以为他有重掌大权的一天而愿意等待。但是当人們知道英国有意废立并且拆散王室的时候，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激起最深刻的情感……。

英国人正象是生存在一座随时都会猛烈爆炸的火山上似的。"⑦

在十九世紀的上半叶，莫卧儿王朝还是印度的主权象征。英国篡夺者保存了莫卧儿作为印度的名义元首，和英国統治的掩护。起义的士兵軍队，以英国所利用和保存的莫卧儿巴哈搭沙，反过來作为还击英国的东西。他們所作的第一件事是从英国人手里剥夺了这个傳統的象征，而自己用宣布他为独立印度的元首，來推动他們的反英战爭。

以傳統的巴哈搭沙为首的解放了的德里，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象征，虽然有某些印度历史家不承認这一点。英国統治者承認这一現象正是局势中最危险之处。

在印度古老首都的这一新发展，是康宁向英国

---

① 申："1857年"，第32頁。
② 轉引自乔德荷利书，第215頁。
③ 同上，第205頁。
④ 肖尔："杂記"，第166頁。
⑤ 凯依："士兵战爭史"卷1，第80頁。
⑥ 包尔书，卷1，第644頁。
⑦ 麦梯加尔弗："关于德里兵变的两件記述"，第18—19頁。

軍队的司令們发布紧急命令，催他們猛袭德里的幕后原因。这是劳伦司动用全旁遮普的軍力來进攻德里的幕后原因。这也是額尔金答应把調去对中国太平天国作战的英国軍队都留給康宁，并且亲自跑到加尔各答，振奋官吏們和英軍軍心的幕后原因。

在勒克脑同样地也建立起一个解放了的国家中心。因此德里和勒克脑两地，在革命者和英帝国主义者的計划中都成为极端重要的战略地点。麦梯加尔弗說："印度的每一角落，每一处軍队叛变的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殊历史，但是最大的兴趣集中在德里和勒克脑。叛变的軍队一营一营地起事以后，逐漸向北印度的这两个中心分别会齐。英国的霸权問題事实上就是在德里决定的。"①

有名的"紅色小冊"的作者(指G. B. Malleson——譯者)写道："整个奥德都武装起來反对我們了。不只有正规軍队，而且有前王的六万士兵、地主和他們的随从。二百五十座堡垒，多数是有重炮装备的，都在与我們作对。他們以东印度公司的統治与他們自己国王的政权相比較，几乎众口一辞地認为后者好。軍队中那些靠我們吃飯的人，也宣布反对我們，并且全体一致加入叛乱。"②

因此英国在奥德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武装的、有組織的群众叛乱，而且是一个建立在傳統王朝复辟上面的地区国家，是全体人民以武装的士兵軍队为首有意識地建立起來以反抗东印度公司非正义統治的国家。

我們印度人的祖先仇視英国的統治，認为它是一种异族的、邪恶的制度，这是一种民族感情的表示，他們在1857—58年的革命斗争中冒着生命的危险向英国鬼子作战，正表示了爭取独立自由的民族意志，民众企图使被废的皇帝和国王重登宝座，正表示他們要求建立民族主权的愿望。

由于当时民族觉悟程度的限制，我們起义者祖先們恢复了莫臥儿的巴哈搭沙，馬拉塔的帕失瓦和奥德的那瓦（王公）等作为他們国家的領袖。但是如果認为他們是落后或者反动那就全錯了。在当时的情势下，只有与被废的巴哈搭沙、帕失瓦和那瓦之流联合，才可以結成最广泛的反英的民族联合。我們将在另一段內說明印度的起义人民并不是想恢复英国統治以前的封建专制，而是想給在巴哈搭沙、那拿和奥德的那瓦名义下的革命政权，以新的群众性的民主色彩。拥立印度本土的統治者，赶走外国統治者，并且有力量和信心以印度人自己的方法，按照印度人自己的实力去对付我們統治者的弱点和短处，这正是一种很健康的民族情感的表現。印度的革命領袖們在1857年所作的正是这样。当然他們没有也不可能具有二十世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和其它反殖民运动的观念和思想。用現代民族解放运动來衡量1857年的民族起义是不合历史眼光的，无論如何也是不科学的。

在一件勒克脑发出的布告里說道："所有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知道有四样东西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最宝貴的：第一宗教；第二荣誉；第三生命；第四財产。这四样东西只有在一个印度人的政府之下才是安全的。"③

以上簡單地說明了是什么促使起义領袖們仇視英国政府，并使他們建立自己的政权。1857—58年起义的中心目的就是摧毁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政权，而代以印度人的自主国家。英国在斗爭中是破坏的部分，而印度是建設的部分。如果这一点不能使这次起义成为民族革命，还有什么别的呢？

（陈成章譯）

---

① 麦梯加尔弗："关于德里兵变的两件記述"，第1—2頁。

② 轉引自薩瓦卡书，第260頁。

③ 申书，第31頁。

本文系印度"1857年的起义（論文集）"中"我們历史上的1857年"一文的第一、二两节，題目系譯者所加；原文另有論述起义失敗原因的部分，本刊将于下期譯載。

——編者

雅各宾派专政的資产阶級局限性問題

刘宗緒

十八世紀末的法国资产阶級革命（1789—1794年），是近代世界史上的大事情，它"立刻把封建的废墟，正象用魔力一样，从法国的地面扫除掉"①。

在这次革命中，有一个雅各宾派专政的阶段（1793年6月—1794年7月），这一阶段是革命的最高潮，正是在这个阶段里，完成了资产阶級革命的任务。同时，这个阶段革命的民主性表現得也最为强烈，"无套褲党"的作用发展到了頂点。正因为如此，列宁才对雅各宾派的功績給予了很高的評价，說他們是伟大的资产阶級革命家。历史事实証明，这个評价是完全正确的。

現今出版的一些有关法国资产阶級革命史的书籍，有不少对于雅各宾派的专政，着重地称贊了一番，而对于雅各宾派政权的局限性，談得就显得不足，很多书籍中都没有用一定的篇幅和必要的笔墨来叙述这一点。

世界近代史是講資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同时也是无产阶級产生、发展、壯大并准备夺取政权的历史。因此在說明資本主义在其产生时的进步性的同时，也必須揭示出它还在刚刚产生时（甚或是在萌芽时）就已經显露了它的內在固有矛盾，以論証它必不可免地将被更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所代替。这一点，在十七世紀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級革命中显得比較突出。長老会派、独立派等的保守性是很明显的。而在法国革命时期，出現一个雅各宾派，它的确是个坚决革命的派别，也敢于和人民群众結成联盟。这就更加重了我們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我們要在闡明它的革命性、民主性的同时，指出它的资产阶級局限性这一事实，以使大家清楚認識到，即令是最革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級分子，也还充分保有他們的阶級本能。即令是象法国资产阶級革命这样彻底的革命，也不可能長时期地将人民群众团結在自己的周围；也不可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就这一問題，談談个人的体会。

要談雅各宾派专政，首先得解决一个重要的前提問題，即专政的阶級性質問題。曾經有人把雅各宾派专政說成是小资产阶級的专政。这显然是不妥当的，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它是资产阶級的专政。自然，在一定时期內，它是依靠了人民群众的专政。

怎样說明这一点呢？我以为出发点有两个：第一，从专政建立的背景看专政的任务；第二，分析雅各宾派的各項措施，究其实質。

1793年前半年，法国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侵略者的軍队从北部、东部、东南部和南部攻来，共和国遭到严重的包围而处于危机之中。

汪德郡的王党叛乱在不断扩大，英国艦队在援助他們，并封鎖了法国港口。5月31日——6月2日革命后逃到各地去的吉伦特派分子也挑起了所謂联邦派的叛乱，而且很快地蔓延了西部、南部和东南部的大片地区。而且，就在巴黎內部，王党分子也一直在进行活动，7月13日馬拉的被刺就是証明。

土地問題还没有解决，而这正是革命的主要問題。

上述一切說明，法国资产阶級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共和国有被顚复的危险。換句話說，布尔邦王朝的复辟还严重地威胁着革命的共和国。要想完成革命，就必須使它再前进一步，这一步就是雅各宾派专政的建立。可見，雅各宾派专政之出現，乃是革命延着上升路綫发展的必然結果。它只是为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譯文引自"世界通史参考資料"（近代史部分第二輯），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版，第48頁。

了完成資产阶級革命的任务，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阶級的任务。雅各宾派专政既然是应此要求而出現的政权，它自然是資产阶級的政权了。

当然，为了完成資产阶級革命的任务而建立的政权，不一定都得是資产阶級的政权，但是在那一时期，能够領导革命的阶級只有資产阶級一个。这就是注定了这个政权的性質必然是資产阶級的。

不錯，雅各宾派是实行了若干民主性很强的措施，使人民群众也得到了一些革命的胜利果实。应該承認，雅各宾派的活动家們，是把"无套褲党"看成自己反对封建势力的同盟者的。1793年5月8日，罗伯斯庇尔在与吉伦特派斗爭中，不是就走向去呼吁"无套褲党"了嗎！他說："在各区你們有不少的貴族，驅逐他們罢！你們要救护自由，那么，宣布自由之权利而表現你們的能力罢！你們有一大群无套褲者，他們是很純洁而且很有力量的，他們却不能离开他們的工作，那么，使富人来償付他們吧！"①但是，他們的政策，却一項也没有超出資产阶級所要求的范疇。

1793年的宪法，可說是一部近代資产阶級的最民主的宪法。它宣布："社会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可是紧接着又規定，政府所要保障的权利"就是平等、自由、安全与財产"②。可見，作为雅各宾派专政的根本大法，就明确規定了要保护資本主义的基本原則——財产私有制。

雅各宾派的土地法是很民主的法律，法国革命之所以彻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系于这个土地法之实施的。可是它哪里显出什么超乎資本主义原則之外的东西呢？

最激烈的法令，要算是关于限价的法令了。也許有人会認为：限制价格，还不是对付資产阶級嗎？这样想就錯了。在当时情况下，革命如果不前进，就会被扑灭而使前功尽弃。故而任何一件事物，只要它阻碍了革命的进展，那么，不管它的操縱者是王党抑或是某些資产阶級分子，它都变成了資产阶級革命的敌人，客观实际就是如此。1792年8月10日革命前斐揚派的情况和1793年5月31日—6月2日革命前吉伦特派的情况不就都是这样的嗎？所以，如果不打破这些障碍，革命就不能前进，就可能被扑灭。而物价昂貴、奸商的投机，正是造成了共和国的威胁，要实現資产阶級革命的任务，就得打击它！严禁囤积垄断法令及限价法令所施行的，正是这种打击，即是为进行資产阶級革命而施行的打击。这是就其目的而言。另外，从实行情况来看，它絲毫没有破坏私有財产，限价之意，就是政府要在产品的分配方面进行一定的干涉，而不是在生产上进行限制，当然更談不上破坏私有制度了。正因为如此，在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情况下，这个法令是不可能彻底实施的，投机、走私現象，一直沒能消灭。所以这个法令仍旧是个資产阶級的法令，它最終地是有利于資产阶級本身的。

雅各宾派左翼代表人物肖美特(1763—1794年)的激烈主張，也不能被視为是触动私有財产的。他曾使巴黎市府要求国民大会"注意于原料品及工場，对自动歇业之囤积者及工場主应予懲处，并征用其原料与工場；甚或收归国家經营，国家并不缺少經营的劳力"③。与上述道理一样，肖美特只是認为这些"歇业之囤积者"是对革命的破坏，因而要把他們作为資产阶級革命的敌人来懲处，要把他們的生产資料收归国家經营。这与后来圣鞠斯特（1767—1794年）在使国民大会通过"万托玆月法令"的演說中所宣布的："显然是国家敌人的人不应再有产业"④的原則是一样的。他們之所以发出这种呼声，决不是不滿于私有制度。

雅各宾派在实施各項政策时，采取了革命的恐怖手段，通过了"嫌疑犯律"。然而就是在那些最严厉的日子里，它打击的仍然是資产阶級革命的敌人。关于这一点，馬克思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打破資产阶級的敌人，即打破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儈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⑤

还有一个問題必須弄清，列宁曾經說过："国民会議正是下层阶級的专政，这就是說，是城市和乡村貧民的最下层的阶級人民的专政。在資产阶級革命里面，正因为有这样全权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面站在統治地位上的，并不是大的或是中等的資产阶級，而是普通的人民、貧穷的人民，这就正是

---

① 馬迪厄："法国革命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05頁。

② 世界史資料丛刊初集"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級革命"，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0頁。

③ 同①引书，第375頁。

④ 同①引书，434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44頁。

我們所称謂的‘无产阶級和农民’。”①这样看来，雅各宾派专政倒底是个什么性质的专政呢？应該这样来理解列宁的話，列宁是說，不是資产阶級在把持和左右革命的整个进程，而是人民群众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群众强使国民大会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活动。因为在国民大会里，没有一个工人阶級的代表，也没有一个农民的代表，人民用示威、請愿的方式，說得明白一点，是用武力的压力，使国民大会施行了民主的措施。

雅各宾派的領导人物，有不少是出自中、小資产阶級之中，或是資产阶級的知識分子。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小資产阶級的专政。决定一个政权性质的，不是执政者的出身成份，而是它的政策实质。雅各宾派所施行的政策并非只是代表中、小資产阶級的独特的利益，而是最終地代表所有工商业資产阶級的利益，因为它用坚决的手段为資本主义工商业扫清了发展的障碍。应当这样看：正因为他們出身自中、小資产阶級，所以他們的革命性才最强，才敢于和人民群众結成联盟。

所以，雅各宾派专政只能是个資产阶級的专政。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它的資产阶級的局限性。

但是应該指出，雅各宾派的革命家，只是在人民的推动和压力下，才被迫前进了一步；也应当指出，他們伟大之处，就是在人民激烈斗爭的革命浪潮面前，能够和人民保持了联盟，継續共同打击王党，从而也实行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措施。

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革命是取得了胜利，但这是个不巩固的胜利，国内外的敌人还严重地威胁着共和国，同时国內的經济情况也十分困难，粮食的恐慌使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在这种情况下，最早提出限价的并不是雅各宾派，而最早主張实行革命恐怖政策的也不是他們。不唯如此，他們还把主張打击敌人和投机商人的忿激派領袖查格·卢监禁了起来。查格·卢曾无情地揭露了在革命中以投机手段发財致富的新富有者，他說：“所有那些四年来获得巨大产业的坏公民，那些利用国家之不幸而发了財的自利者，那些在未入議会以前每天没有多少錢化而今拥有巨产的議員們，那些以前住在陋巷做屠戶而今拥有漂亮住宅的議員們，那些在不曾到薩伏依及比利时以前只能在小店里吃飯而今則能盛开宴会、出入剧場、畜情人而且雇人来捧場的議員們，必須把他們所得的吐出来。”②忿激派的另一領袖勒克雷克也一再要求逮捕嫌疑分子，鎮压革命的敌人。他为自已的主張呼吁說：“我說，有人說我是主張流血的，因为我曾公开承認革命者应当以冷酷态度为革命而牺牲万千恶棍，假使非此不可的話。好吧！法兰西人，請了解我的整个意思吧，我要对你們預言我們会走到那么一步，即倘非我們的敌人死便是我們死。”可是这些主張，一时并不能被雅各宾派的当权人物所接受。于是他在8月6日直接指責国民大会：“人民們，你們没有理由埋怨你們的立法者嗎？你們要求他們限定一切必需商品的价格，而他們拒絕了；要他們逮捕一切嫌疑人犯，而他們不通过；要他們把貴族与僧侶摒斥于軍民行政机关以外，他們也不答应。那么，为着謀祖国之安全，只有訴之于革命行动，惟如此才可閃电般地激励全国各地的无数居民。”③在忿激派的活动下，巴黎街头出現了标語，要仿效1792年9月的情形，再次处死各监獄中的嫌疑犯。可是雅各宾派政府的态度如何呢？他們在报紙上攻击这些活动，說他們是煽动者。他們的这种态度就使得王党分子和背叛革命的吉伦特派分子更加猖狂活动了。在围繞着1793年8月10日結盟节事件的斗爭中，反动分子建筑师谷什瓦就曾于7月底在巴黎策动反对革命政府的阴謀，馬拉和沙利尔之被刺，正說明勒克雷克之主張是正确的。

这里特别应該提到的是1793年9月4—5日巴黎人民的活动及其后果。9月4—5日，巴黎圣安东区的工人、城市貧民和手工业者，手持武器走上了街头。他們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全面限价；保障劳动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无情的斗爭。这次运动是“忿激派”的宣傳家所准备的。这說明人民群众不滿于雅各宾派的态度，而出来迫使它滿足人民要求。

这时，雅各宾派內部已經有了分化。左翼分子肖美特、艾貝尔等把这次运动的領导权掌握到了自已的手中。他們排挤了忿激派，同时也接受了忿激派的許多要求，可是他們則力图将基本上是反資产阶級的群众运动，局限在革命的資产阶級的范围之内④。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217頁。譯文引自“世界通史参考資料”（近代史部分第二輯），第53頁。

② 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339頁。

③ 同上书，第339——340頁。

④ 参閱 Акаб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Т.Ⅱ.Москва.1958.Стр.49。

然而，人民群众的这次发动是有着巨大意义的。就是在这次发动之后，雅各宾派才采取了坚决的革命措施，决定成立"革命軍"；通过了严禁囤积垄断法令、嫌疑犯律、全面限价律等等。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即革命不应归結于資产阶級的上层領导机构，而应归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恩格斯曾說道："这次，也和往常一样，資产者太懦弱了，以致不足以捍卫他們自己的利益……从进攻巴士底之日起，平民就不得不替他們担負了全部工作，……如果没有平民在7月14日、10月5日至6日、8月10日、9月2日的参与和其他行动，封建制度必然会取得对資产阶級的胜利，而同宮廷相联合的反法联盟就会把革命鎮压下去……可見，正是这些平民完成了革命。"①

以上，是說雅各宾派专政是个被迫而出现的专政，是在人民群众推动之下，才使革命走向了高潮。

其次，再看看雅各宾派各項政策的資产阶級局限性。談到这点，首先就会使人想到反工人的列·霞白立法令。制宪会議議員列·霞白立借口反对行会而主張禁止工人結社，他說，要"废除属于同一社会地位和同一职业的公民組織各种行会既是法国宪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所以必須禁止在事实上将其恢复，无論其借口和組織形式如何。"并提出对"由手工业者、工人、工匠、短工所組成的聚众会合"要以武力"予以驅散"，并对"肇事人、教唆人和首領以及对于一切犯有違法行为和暴行的人，均应依法严懲之"②。这个提案被通过了。通过这个提案的罪过，虽不应完全归在雅各宾派身上，但問題在于，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这个法令并没有废除，而是継續生效。正象馬克思所說的那样，"这种法律，借国家警察权，把資本与劳动間的斗爭，限制在有利于資本的范圍內，并且經过几次革命，几个朝代，照样保存下去"③。馬克思更进一步批評罗伯斯庇尔說："罗伯斯庇尔最主要特征就是正当用1789年会議的精神制定宪法被認为是值得断头的罪恶时，这一会議反对工人的一切法律却継續生效。"④

还須提出的是雅各宾派对工人工資的限制。1794年春天和夏天，雅各宾派放松了最高限价措施，而使物价增加了一倍的样子⑤。可是工資額則仍然是原有的水平。只要看一看专政期間工人为爭取提高工資而斗爭的事实，就能够清楚地証明这一点。在各种部門的工人中，一般說来，軍械工厂的工人要求改善待遇最为迫切。因为他們的劳动条件很坏，工資也很低。例如，巴黎的普通小工、搬运工人、車伕和挑水工，每天能得20——24鍾的收入，生活已属十分貧困。而軍械工人中的一流技术工的所得，每天却只不过16鍾的样子，最低者甚至是3鍾。这当然就促进了他們的斗爭。工人們要求提高工資并要求派代表与公安委員会的代表进行商談。但都被政府拒絕了，他們不打算对工人情况作任何改善，巴黎市府对集会的工人也提出了警告。这就是雅各宾派对待工人的态度。当然，工人的斗爭是有成效的，巴黎郡政府由于自己的妥协条件未能緩和工人的情緒，而不得不中止了它所进行的工程。

此外，在1794年春季，政府强行"征发"农民播种，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很大不满。

雅各宾派的土地法，是近代資产阶級相当民主的法律之一。但是其資产阶級的局限性仍然是明显的。1793年6月10日的土地法令的第四节第九条規定："本法令的精神不在于侵害个人的和平占有，仅在于制止濫用封建权力和豪夺。"⑥可見，雅各宾派所做到的，只是没收了一些逃亡貴族和教会的土地，并分成小块卖給了农民；同时还无偿地废除了封建义务，只此而已。它并没有触动地主們的土地財产。实际上，雅各宾派在彻底满足广大农民的全部要求上，是表現得无能为力的，农民不仅仅为了反对封建义务而斗爭，而且还为爭取土地，特别是为分割庄园土地和废除对分制地租而斗爭。对分制地租是种半封建的剝削形式，它在法国广泛地被采用。这些要求雅各宾派都没有能满足。事实上，奴役广大无地，少地农民的租佃关系依然被保留着。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8卷，第81頁。譯文引自列甫宁科夫"世界近代史讲座"，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64——65頁。

② 世界史資料丛刊初集"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第46——47頁。

③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37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3卷，第234頁。譯文引自曼佛列德著"十八世紀末叶的法国資产阶級革命"，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34頁。

⑤ 参閱K.杜布洛柳布斯基："評A.曼佛列德著'十八世紀末叶法国資产阶級革命'"，載"史学譯丛"，1956年第1期，第187頁。

⑥ 世界史資料丛刊初集"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第106頁。

雅各宾派从来也没有无偿地分給农民土地①。对于所謂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制度，要有正确的理解。所謂彻底摧毁之意，是指它完全废除了封建式的剝削，而代之以資本主义式的剝削。旧日地主的土地，仍然依旧，所有权并没完全轉移。因此，它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問題。

最后，談談雅各宾派和人民之間的关系問題。关于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在反对王党、旧貴族的斗争中，雅各宾派——資产阶級民主派是与人民群众有着联盟关系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在1789年間，資产阶級是和人民結成同盟反对了君主政体、貴族和統治教会的。"②这是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一个最大特点。應該承認，雅各宾派在革命斗爭中，是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同盟者的。这也正是它的力量的源泉，正是它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可是，能不能說雅各宾派专政是資产阶級民主派和人民大众的联合专政呢？勿庸置疑，雅各宾派专政只能是个資产阶級专政，而决不是什么别的。这一点并不和它与人民的同盟关系发生矛盾。

在革命期間，作为資产阶級的政权机关，其主要鋒芒是針对封建势力的③。在打击王党过程中，雅各宾派实施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措施。然而其目的，与其說是为了滿足人民要求，还不如說是为了打击王党，即为了实现自己阶級——資产阶級的要求。例如，他們曾宣布"显然是国家敌人的人，不应再有产业"，并要把这些产业分給"不幸者"，即穷苦大众。显然，其目的是在于打击革命的敌人。可是他們看到自己力量的源泉是人民，人民是革命的支持者，是自己的同盟者，于是就把这些財产的一部分宣布分給群众。这正是他們民主的地方，正是和人民結成同盟的体现。可見这只是在反封建基础上的同盟，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础，如果人民提出了超出这个基础的要求、提出了有碍于資产阶級利益的要求，那么情况就会是另个样子了。每当一遇到这种情况，雅各宾派对人民的关系就不是表现为联盟的关系，而是使出了鎮压的手段，即对人民实行专政。雅各宾派不就曾利用列·霞白立法而鎮压这一次工人运动嗎？在农村中，貧农与富农发生冲突时，政府人員不是往往都站在富农一方嗎？从一份农民呈給国民大会的請愿书中，就可看出这种情况，有一份請愿书这样写道："你們建立了产业和地位平等。請你們同样也使我們有可能擺脫現在吮我們的血汗的富人……"④总起来說，作为資产阶級专政，其在革命时期，固然主要专政对象是封建势力，然而不能因此抹煞資产阶級和人民群众之間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当时不是主要的，但却是存在着的。这样，資产阶級对人民可能表现为联盟的关系，但也会在一定情况下表现为专政的关系。

关于雅各宾派专政的資产阶級局限性之主要表现，暂时归納为以上三点。下面再总括一下：

恩格斯曾經这样写道："为了要使資产阶級能够取得即令只是那些当时已經完全成熟而只待收获的胜利果实，都必須使革命远远超过这一目的；1793年在法国……，情形也都是如此。大概，这在事实上是資产阶級社会发展的規律之一。"⑤这段話的意思是說，旧封建統治阶級虽已处于死亡的边緣，但如没有一种力量去推它，它也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换句話說，資产阶級的胜利果实虽然"已經完全成熟而只待收获"，但是没有人去摘它，也是枉然。无論"推"或"摘"，都不是容易的，"都必須使革命远远超过这一目的"，走得更远一些。

法国的情况恰恰如此，要想取得胜利，必須使革命走得更前一些，甚至連資产阶級本身的利益，都要暂时限制一下。这一步，就是雅各宾派的专政。雅各宾派实行了限价，对囤积居奇者进行了打击，从而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盟，并因此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即摘下了胜利果实。

在摘取胜利果实期間，資产阶級为了本身真正的利益，可以容忍专政对它的暂时限制。可是一当外敌赶跑了，叛乱平复了以后，它就不能再忍受这种限制，这就使作为資产阶級专政的雅各宾派政权，无法継續存在了。雅各宾派的分裂，丹敦派⑥的大

---

① 参閱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Т.Ⅱ.Стр.44。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43頁。

③ 这里是专就法国資产阶級革命而言。

④ 曼佛列德著"十八世紀末叶的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第160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105頁。

⑥ 在革命期間，許多資产阶級分子和农村中的富有者，利用革命的困难和战争的时机，大肆进行投机活动。不少雅各宾派内部的分子，如弗勒漠、巴拉斯及丹敦等，也利用"革命"的幌子，从事着这些发国难財、发"革命"財的勾当。这就形成了新資产阶級集团，这些人正是后来特米多尔月反革命政变的主要策动者。丹敦这个追求生活享受的个人野心家，就成了这些人的代表人物。故而这里用"丹敦派"来說明新資产阶級的态度。

肆活动，其根本道理就在于此。也就是說，資产阶級要把走得更远的那一步退回来。

退回一步，就意味着資产阶級与人民群众的联盟已不能保持了，联盟的基础已不存在了，事实正是如此，随着雅各賓派专政的不断取得胜利，其对人民的要求也越来越不能滿足，而到1794年甚至放松了对物价的限制。不錯，雅各宾派的一些活动家們，象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他們是希望能継續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联盟，但是他們的資产阶級局限性，使他們不可能提出任何有效措施来做到这点。正象圣鞠斯特自己所承認的那样："革命冻僵了。"确实如此，革命已不可能再向前发展，再进一步就要触动資产阶級本身的利益，这是办不到的。

因此，雅各宾派专政的被顚复是不可避免的。特米多尔月(热月或新十一月)的反革命政变，就是这种矛盾的結局。資产阶級与人民联盟的破裂，雅各宾派专政的社会支柱之丧失，使它无力抵制特米多尔月的反革命政变。政变是法国資产阶級的終結。政变后，法国資产阶級的眞正面貌也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这一切表明，即令是法国这个彻底的資产阶級革命，也"不能在若干長久时期內把千百万被剝削劳动群众团結在資产阶級周围，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剝削劳动群众；而无产阶級革命要想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即巩固无产阶級政权，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的經济，却能够而且应当使这些被剝削劳动群众去同无产阶級結成長期的联盟，正因为他們都是被剝削劳动群众"①。斯大林同志所作的这个鮮明的对比，就足以說明雅各宾派专政之局限性了。

以上，对于雅各宾派专政的資产阶級局限性的分析，目的是要說明，即令是最民主的資产阶級政权，还在其反封建的革命时期，就与人民群众②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因为它是以一个剝削者集团去代替另一个剝削者集团去执掌政权。資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因此，我們在教学中講述雅各宾派活动时，必須指出它的資产阶級的局限性。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166——167頁。

② 本文一再用"人民群众"这一詞，是因为当时无产阶級还沒有形成。城市工人基本上是手工工人，不具有产业无产阶級的特点，还是无产阶級前身，不能从一般劳动者中分别出来。

对于北美"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的理解与分析

王 荣 堂

十八世紀末，北美独立战爭和法国資产阶級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中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北美独立战爭是美洲历史的里程碑。通过这次革命，英属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不仅摆脫了英国的統治，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也剷除了內部的封建殘余势力，促进資本主义因素的成長；同时，这次革命的胜利大大地推动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統治下的中南美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推动了欧洲的革命。关于北美独立战爭，馬克思曾写道：这次战爭"为資产阶級开辟了新的高涨时代"①，"为欧洲的中等阶級鳴起警鈡"②。1789年的法国資产阶級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的里程碑。法国革命較諸十六世紀尼德兰革命和十七世紀英国革命更深入，更前进了一步。它不仅在法国內部較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制度，使資本主义关系获致充分的发展；而且也深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俄文版，第21——22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頁。

刻地动搖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基础，促进了欧洲各国的革命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广泛成長。自此，資本主义在欧洲走向确立的道路。

这两次革命，都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宣言。北美在独立战爭中提出了"独立宣言"，法国在革命中提出了"人权宣言"。这两个宣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它們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說；同时也具有很大的資产阶級局限性与虛伪性，資产阶級口是心非没有使宣言中的人民主权思想完全实現。我們在教学北美独立战爭与1789年法国資产阶級革命时，必須对这两个宣言的进步性与局限性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深刻地体会資产阶級革命与无产阶級革命的根本区别，并認識到資产阶級即便当它在历史上还是进步阶級时，也是非常虛伪的。至于今天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当权的反动資产阶級，更露骨地践踏了他們前輩提出的人民主权思想，瘋狂地鎮压与迫害革命者。由此可見，正确地理解"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的本質与意义是具有現实意义的。

北美的"独立宣言"

北美"独立宣言"并不是当时占居領导地位的資产阶級与种植場奴隶主主动地提出来的，而是在殖民地工人、水手、农民与手工业者已經展开了轟轟烈烈的反英武裝斗爭以后，在群众革命的压力下，資产阶級与奴隶主才于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議正式通过了这个宣言。

"独立宣言"的全部內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闡明殖民地人民爭取独立的理論根据，从而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說；第二部分列举英王对殖民地实施的不可容忍的各种暴政；第三部分鄭重向全世界宣告，联合殖民地从此与英国断絕一切政治上的附屬关系，而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

仅就宣言第一部分加以分析，我們就可以理解这个宣言的基本思想。宣言开头写道："我們相信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一切人生而平等；上帝賦予他們某些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为了要保障这些权利，人們就成立了政府，政府的合理的权力是被治理的人民所授予的。任何政府一旦損害到这些权利，人民就有权利变更它或废弃它而成立新的政府，把新政府設在最能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的原則之上，并用符合于这种原則的形式組織它的权力。"①在这里，宣言提出了資产阶級民主的基本思想。首先指出一切人都应平等，其次肯定了生存、自由与追求幸福等权是人們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权，最后又宣告任何时候无論何种政权形式，只要它破坏这些目的时，人民有权改变或消灭这个政权，并根据他們認为最适于实現自己安全和幸福的原則和形式，建立新政府。这就体現了人民主权思想原則。

独立宣言所提出的这几种权利，尤其是其中关于人民主权的学說，虽然在措詞中还带有"造物主"与"天賦"的不正确字眼，但它的宣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的。这种进步意义，一方面表現在它宣布了与英国决裂，滿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同时也宣布与殖民地內部封建势力进行斗爭，为資本主义在北美十三州的发展开辟道路；更重要的是，这个宣言提出的人民主权原則，明确地肯定了人民本身应該决定自己命运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头一次把人民政权原則表达在全国性的正式文件之中。馬克思曾把宣言称之为"人类中第一个权利宣言"②。

但是，独立宣言的进步性是有限的。因为它没有宣布废除奴隶制度，且是在巩固与发展資本主义与种植場主經济这一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没有任何能够实現人人平等、个个自由的物質保障。所以宣言所提出的自由、平等与民主，仅仅是資产阶級（当时也包括奴隶主）的自由与民主；它所宣布的人民主权思想，也没有超出資产阶級的范围。宣言中所謂的人民，实質上指的是有产者白人。因为在資本主义与奴隶主經济存在的条件下，不会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平等和政治权利。只有工厂主和土地所有者才能掌握到国家权力。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資产者阶級共同事务的委員会罢了"③。

美国資产阶級与奴隶主的虛伪性在当时历史事实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証明。独立宣言頒布后，人民群众，其中还有黑人与印第安人都积極地投入了战斗，并促成了独立战爭的胜利。可是資产阶級与奴隶主并没有把宣言中的主要思想加以实現。例如1781年的联邦条例，还保留了选举权中的財产資格限制和奴隶制度，对于印第安人仍然进行压迫和屠杀，对于雇佣劳动者的殘酷剝削有加无减。这样，在独立战爭胜利后，便引起了1786年美国农民、手

① 哈第："美国第一次革命"，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18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俄文版，第一部，第21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1頁。

工业者和工人的不断起义，其中最大一次是1786年年底的謝斯起义。这些起义意味着民主运动的高漲，意味着美国人民群众要把革命継續深入一步。可是資产阶級与奴隶主在鎮压了謝斯起义之后，便急忙地制定宪法，企图用宪法巩固中央权力，保証他們的統治。在1787年宪法中，并未把独立宣言包括在內，甚而关于言論、出版、信仰及其他公民自由这些最起碼的資产阶級民主都未敢提。后来由于人民群众継續爭取民主斗爭的結果，資产阶級与奴隶主当权者才被迫于1789年9月通过了宪法的十項补充条款，这才将資产阶級这些最起碼的民主即言論、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包括进去。1787年宪法仍然保留了可恥的奴隶制度，維持种族歧視；不給予印第安人公民权，也不承認他們原来的土地所有权，継續掠夺与屠杀印第安人。1787年宪法没有規定选举資格，而把这种权利授与各州。可是各州在規定选举法的条文中，都把財产和居住期限做为选举权的資格限制。各州都没有給妇女以选举权。所有这些，充分說明1787年宪法根本没有体現眞正的自由、平等与民主。因此，不难理解人民主权这一进步学說，在資产阶級革命时期，資产阶級利用它发动群众，反抗宗主国和內部的封建势力；当革命胜利后，資产阶級用以巩固資产阶級与奴隶主政权。总之，資产阶級倡导的人民主权思想，只不过是用以欺騙人民而已。

法国的"人权宣言"

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同样，也不是在革命开始时由資产阶級領导者自动提出来的。它是在法国城乡人民群众已經掀起了广泛的革命运动之后，才在1789年8月26日立宪会議上通过的。

人权宣言共包括17条。第1条开头写道："人們生来在法律面前是自由和平等的。因此，他們应該自由的、平等的生活着。"这一条肯定了人們之間的权利平等，反对封建特权与等級的区分。第6条写道："法律应当是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而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参与法律之制定，无論是由个人直接或用代表的方法。"这一条肯定了人們在法律面前平等，并指出法律是总的意志的表現，在这里便体現出資产阶級的人民主权原則。第10条写道："如果人民的表示，不扰害由法律而建立的公共秩序，則不拘何人，均不会因其意見、甚至宗教的事件，而加以迫害。"这一条肯定了資产阶級的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第12条写道："公共的权力是为全体的利益而有的，不能由那些受委托者来特别使用。"这一条肯定了政府只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安全和权利，否則就应改变它。在这里否定了君权神圣和肯定了人民有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利思想。最后一条又規定："私有財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一条非常明显地把宣言中各条都打上了資产阶級的阶級烙印。总之，"人权宣言"宣布了自由、財产和安全是人們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权；宣布了人民主权原則和宣布了全部基本的資产阶級民主自由的理論。

"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一样，有它的进步性，也有它的极大局限性。就进步性来說，十八世紀末叶正是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資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所以人权宣言在当时反对封建专制統治的斗爭中还具有不可抹杀的进步意义。因为它揭穿了君权神授的鬼話，否定了封建等級，給封建特权阶級与封建专制制度以严重的打击。人权宣言发表后，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与劳动人民都受到莫大的鼓舞。例如俄国的进步思想家拉吉舍夫和諾維可夫把人权宣言的思想，拿来在俄国到处宣傳。德国著名詩人克洛朴斯托克說："为什么我不長出一百張咀去歌頌法国的自由呢？"。英国的民主派在法国革命影响下成立了革命的团体。瑞士、意大利、普魯士和奥地利等国家的人民都由于法国革命和人权宣言的影响而行动起来。比利时在法国革命的强烈影响下于1790年发生了革命。所有这些，都是人权宣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进步作用。

但是"人权宣言"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人权宣言"一方面宣布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則；另一方面又把私有財产規定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此，这种自由、平等、博爱是建立在貧富悬殊的基础上的。这样，"人权宣言"的所謂"自由"只是改变了封建的人对人的从属关系，即农民对地主的人格依附关系；而建立了一种新式的人对人的从属关系，即工人对資本家的从属关系。所以并不是眞正的自由。"人权宣言"中所提到的平等，只是消除了出身的不平等，而建立了一种新的財产上的不平等，所以并不是眞正的平等。实质上，在資产阶級私有制下，不論把民主与自由提得多么高，多么响亮，也仅仅是那些拥有資本的人們才能享有自由，享有一切政治权利。至于一无所有的劳苦大众，根本就得不到什么自由和权利。

由此可見，"人权宣言"仅仅是資产阶級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思想武器。它不过是宣布了資产阶

級私有制的确立，宣布了資本主义剝削制度代替了封建剝削制度而已。

資产阶級就其阶級本質来說，都带有欺騙性与虛伪性的。就是在历史上当資产阶級还处在进步阶段时期，这种欺騙性与虛伪性也是非常显著的。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級革命时期的法国資产阶級和北美独立战爭时期的北美殖民地資产阶級一样，发表宣言是一回事，制定宪法和执行政策又是一回事。他們所制定的宪法和行动往往是違背他們自己所发表的宣言精神的。例如法国的1791年宪法，其中規定以財产多寡把公民分成积极与消极两种。只有年滿二十五岁，有不动产，不是佣工，而且能交納至少相当于三天工資的直接稅的积极公民才有选举权，至于立法会議的議員候选人的資格，則是能交納五十法郎直接稅的积极公民。没有以上条件者均被称为消极公民。消极公民根本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就更談不上了。这算什么平等？宪法还列入了“列·霞白立条例”。根据这个条例，禁止罢工和在工人中間成立任何組織。这算什么自由？宪法对农民运动加以严格限制，其中“懲罰法”規定，凡反对封建义务而采取武装行动的人都处以极刑。这又是保障什么安全？

由此可見，1791年宪法根本違反了“人权宣言”的精神实質。如果說法国的1791年宪法是由金融資产阶級与自由派貴族制定的，局限性自然很大，那末就是在法国革命达到最高阶段时期，即雅各宾专政时期的1793年宪法，也没有充分体現出人权宣言的精神实質。1793年宪法虽然取消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区别，确立了普选权，規定人民对法律有复决权，还給予人民劳动权与生活权的諾言，但是这个宪法仍然把財产宣布为“人的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劳苦大众仍然不能有任何物質保障来享受那些权利。这只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諾言而已。1793年宪法也没有超出資产阶級統治的范疇，而且这一宪法也未付諸实行。总之，只有通过无产阶級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眞正的人民主权思想，才能眞正得到实現。

× × × × ×

最后談一談人民主权思想的历史根源問題。无論是北美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包括有人民主权的思想。北美的“独立宣言”多半受十七世紀英国資产阶級哲学家洛克、十八世紀法国启蒙学派和百科全书派学說的影响；而法国的“人权宣言”，除了受十八世紀法国启蒙学派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影响外，特别受到北美“独立宣言”与卢梭学說的指导。实質上，人民主权这一人民本身应該决定自己命运的进步思想，并非是十七与十八世紀那些英、法启蒙学者所独創的。归根結底，这种进步学說还是历来人民运动的产物。

在欧洲中世紀黑暗的封建統治时代里，封建貴族、僧侶对于农奴与貧民进行极为残酷的压迫与剝削，从而便激起了不断的农民运动和城市平民运动。劳苦大众在不断的斗争中，就逐漸地具有了推翻封建专制統治，不能取得土地和自由的內心要求。但是由于农民和貧民的阶級狹隘性和統治者造成他們的愚昧，还不能提出一套反映本阶級要求的革命理論来。只有資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成長起来，有了資产阶級以后，資产阶級在封建社会中虽也是被压迫的阶級，可是他們有經济力量，有文化教养，因此在他們中間便涌現出一些資产阶級哲学家与文学家。这些資产阶級哲学家的学說主要是为資产阶級革命找理論根据。例如洛克与卢梭提出的国家契約学說与人民主权思想，百科全书派宣傳的无神論等，都是抨击当时封建統治者的君权神授、君主专制、封建貴族特权和封建等級身份。这些学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广大劳苦群众的摆脫压迫的心理。可是，无論是洛克、卢梭或百科全书派，都肯定財产的不可侵犯性。因此，十七与十八世紀英法启蒙学者（除少数平民思想家外），提出的人民主权和理性王国，实質上就是資产阶級主权和資产阶級王国，所以，他們的学說便成为当时資产阶級革命的理論武器，成为欺騙群众、利用群众为資产阶級打天下的旗帜。这是在封建社会向資本主义社会过渡，而近代无产阶級还未出現的历史时期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規律。

就人民主权思想本身来說，它的进步意义即便在現在的資本主义国家中，也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它否定資本家有压迫工人和迫害革命者的权利。現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反动資产阶級，尤其是美国的垄断資本家企图抹杀他們前輩們提出的人民主权学說，准备赤裸裸地迫害革命者与鎮压罢工运动。可是，誠如福斯特所說：“这是徒劳无功的措施，因为当人民大众通过現政府来解除痛苦的一切手段被剝夺掉而决定采用革命的手段的时候，他們就要行使他們这个固有的权利，不管衰朽的統治阶級用什么样的理論与威胁来对付他們。这是1776年革命所教导的伟大眞理之一。”①

---

①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160頁。

关于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期問題

——与李建青同志商榷——

胡 大 澤

"历史教学"1959年第三期上登載了李建青同志所写"关于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几个問題"一文，文章中提到了編写"国史"的特点、原则、分期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很有益的意見，对我的启发也很大；但由于文章所涉及的方面較多，其中有不少的新問題值得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和討論。現在，我准备专就"国史"的分期問題，提出一些与李建青同志不同的意見来商榷。

首先，我感到要研究这个問題，必須弄清分期的标准和根据是什么，以及我們在現阶段用什么样的原则来处理这九年多历史的分期分段問題較为适宜。按照李建青同志的意見，"分期主要应当根据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規律，阶級力量和阶級斗爭狀况的变化，以党的总路綫为中心綫索，运用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的原理，找出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质的規定性"①。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在說明要"找出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质的規定性。什么是"质"？

"质，是事物的本质的規定性，即事物所固有的性质、特征、特点的規定性，由于这些性质、特征和特点，事物才是这样的一种事物，而不是那样的一种事物，才和其他事物有区别。"而且，"新质态的产生是一种质态飞跃式地轉化为另一种质态的結果"②。这就是說，事物需要有飞跃式的本质的变化，才能称为质变。以此原则作为划分"国史"的标准和根据是否妥当？这是个值得研究的問題。如要承認这个标准，就要承認我国过渡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內还有本质上不相同的几个阶段。然而，以我看来，从过渡时期的整个社会性质来說，其間也并不存在有几次质变。馬克思說："在資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③这整个的轉变时期过渡完了，才能在历史进程上起一个质变。决不能把历史进程中一些阶段性的任务的完成就認为起到了质的变化；否則，也就会混淆质的概念，使人看不清历史进程中的大阶段中所包含的无数小阶段。

現在我們虽已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經济、政治、思想战綫上的决定性胜利，然而我們仍处在过渡时期內，我国的社会性质从1949年10月至今仍不能認为有了本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工业化才奠定下了初步的基础，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事业都还沒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怎么能說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就有了几次质变？現在摆在我們面前的任务，是要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些任务都还沒有实現，过渡时期还沒有过去，这又怎么能認为在历史进程上发生了几次质变？

在李建青同志的原文中，对于什么是决定各个发展阶段中的质的規定性的东西，也談得比較含糊，令人有些难以理解；在具体划分中，每个时期的本质的特点是什么也沒有清楚地說明，这就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难。譬如說，把1949年10月至1952年12月称为"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計划进行国民經济建設的准备时期"；把1953年1月至1958年5月称为"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計划地进行国民經济建設的时期"④。第一

---

① 見"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第5頁。

② 罗森塔尔、尤金編："簡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9頁及680頁。

③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1頁。

④ 同①。

个时期是有計划的国民經济建設的准备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进行时期。这两个时期是很明显的两个阶段，是誰都承認的；但是在它們之間并不存在有質的区别。在前一阶段內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后一阶段內是継續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两个阶段是同为一种本質的东西，并不存在着質变。如果硬要用質的規定性来划分这两阶段，那就是要把本質上相同的东西，硬分为两种本質上不同的东西。这应認为是不恰当的。如果从这两个阶段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資产阶級与无产阶級的矛盾来看，主要矛盾既没有变化；社会性質也没有变化，怎么能認为其間有質的不同？把一件事物的发生、发展与轉化阶段割裂开来看，显然是不够妥当的。特别是将事物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中所表現出来的一些特点，将它夸大或誤認成为質变，这在实踐上会造成抹煞阶段性的結果，在理論上会造成为否認質变与量变的关系。同时，李建青同志在实际划分各个时期时，也没有交代清楚是什么不同的質的規定性規定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質的差异。因此，我不同意在目前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用質的規定性来作为分期的标准。同时，我感到如仅就編写的方便来講，目前在书中可暂不用分期两个字的含义，而在大阶段中划分若干小阶段，用章、节、目的方法来反映历史的来龙去脈与每个小阶段中的历史全貌。因为已过去的九年多，就其意义来講，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几千年；而就其发展阶段来講，还只不过是整个过渡时期的这个大阶段中的几个小段落而已。所以从編写一般大中学校的教材和有利于群众閱讀的方便来看，目前可以运用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的原理，本着如实地反映阶級斗爭与生产斗爭的客观形势和历史进程的原則，按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內的主要任务，作为划分段落与編写章、节、目的依据。

为什么要这样？除了在上面已談到的理由外，还因为要从現实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那么如何能如实地反映历史客观規律，如何有利于編写，如何有利于讀者閱讀等問題，就应被提到首先考虑的地位。因此，我以为編写时采用划阶段分章的方法就自然地反映了历史时期。比如說，从建国以来至1952年底，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国民經济恢复时期，这是大家都承認的。而从1953年以后至什么日期为止算一个阶段，又称为什么时期，目前还是众說紛紜，莫衷一是。意見尽管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如何如实地反映革命发展的阶段与历史事件的彼此联系的关系。本着这样的看法，在下面很簡略地提出我对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章意見来，就正于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同志們。

一章：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党的七屆二中全会的召开，到1950年6月党的七屆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一阶段。

二章：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經济的恢复。

三章：有計划經济建設的开始和人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从1953年开始至1955年7月左右为止。

四章：經济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从1955年7月底毛主席在省、市委和区党委书記会議上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作为这个阶段开始的标志，至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貫徹为止。

五章：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决定性胜利，第一个五年計划的超額完成。这阶段的下限大体是到1957年底为止，也不防碍論述在1958年內进行的整风运动。

六章：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全国农村实現人民公社化。从1958年1月至12月党的八屆六中全会的召开。

七章：为实現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斗爭。从1959年元月以至目前。

按照上述的分章，可以把第一、二章合为一个較大的阶段，或者称为一个时期吧；把第三、四、五章合为一个較大的阶段，或称为一个时期吧；六、七两章又可合为一个阶段。第一个大阶段中的主要問題是：土改、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以及国民經济的恢复和发展。第二个大阶段中，論述时应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和計划經济为一根横貫在其中的紅綫，較突出地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展，以及由农业合作化高潮而带动起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的情况。党的对私改造的历史經驗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报告的伟大意义，也应予重視和論述。第三个大阶段，应以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为一根紅綫，全面地反映大跃进和进入以技术、文化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并充分論述人民公社出現的伟大意义及其优越性。这三大阶段之間，虽各有特点，各有突出的中心历史課題，甚且在每一章中都存在这种特点与它的中心，但它們之間是既有阶段性的存在，

也有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性存在。其实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內所提出的路綫、政策和主要任务，也就是反映这阶段內的阶級斗爭和生产斗爭的形势的。所以只要我們严格地尊重客观史实，以党中央的方針政策为根据，以党的中心任务为标志，就能解决分期分段的問題。

× × ×

其次，在李建青同志的文章中，把第二个时期与第三个时期的界限，以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議的召开为标志，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提出来供商榷。

李建青同志把1953年1月至1958年5月，称为"有計划地进行国民經济建設的时期"，而又把这以后称为"人民公社化和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新时期"。再按照这样的分期标准，就得承認其間存在着质变，旣有质变，后者就不应是前者，后一个时期就不应是有計划的經济建設时期。然而事实上，我們現在仍然是处在有計划的經济建設时期。有計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則，是社会主义的經济法則，我国的經济建設越往前发展，要有計划地进行就越显得重要，今年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就正是这种規律的反映。因此如按李建青同志的分法与說法，就会使人产生錯觉和誤解。

同时把第三个时期称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的提出以后开始的人民公社化和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新时期"，这样的提法，在文句的含义上不够确切；把人民公社化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也是值得研究的。按字面了解，"公社化"应是指实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我国农村基本上在1958年底以前就实現了。能否把这个波涛汹涌的短短发展过程，視为一个历史时期？或者認为要等到全国各大城市都基本上实現了公社化，才算結束这一时期？这是說得不够清楚的。从原文中，也容易使人感觉到人民公社化的开始，好象主要也是由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提出而促成的一样。其实人民公社的出現，"是我国經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产物"①。公社之所以出現的主要原因，应認为是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生产力发展了，必須要促使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改变，这是生产关系必須要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法則所起到的作用，而不应当被認为单单是由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提出，才促使其产生的。

談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时期的起点，李建青同志把它从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正式提出的时間(1958年5月底)算起，这也是一个値得商榷的問題。"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誠然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議上正式提出的，但它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这个总路綫是吸取了各兄弟国家的建設經驗，总結了我国自己的建設經驗，并接受了自1956年以来的馬鞍形的教訓而制定的。它的正式公布，标志着我国人民已經进入和正在进入一个以技术、文化革命为中心的建設新时期，而并非标志着进入这样一个时期的起点。

我以为党的任何一次重要会議，都要向全党全民提出一个历史任务，显示着一定历史时期內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主流。但是，是不是就应以这个会議的召开日期作为一个时期的起点，或者認为它的召开就是开始这个时期的唯一标志，这得要看具体历史情况，不能机械地一律如此。以我們建国后的情况来說吧，公認的計划經济建設的开始日期是从1953年1月算起，开始进入过渡时期的日期是自1949年10月算起，但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則是在1953年底提出的。为何如此？因为每当我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客观条件都已逐步形成，新生事物都已經开始萌芽，或者是已經开始发生和发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也开始行动了起来，党才能根据客观規律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将它集中起来，制訂成为党的方針路綫，又让它回到群众中去成为巨大的推动力量，鼓舞群众为其实現而奋斗。所以一种路綫的正式公布，并不等于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开始，也就不应当完全能标志着这个历史阶段的开始。

我以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时期，是在1957年底至1958年初。它的客观根据是什么？在这个时候，世界形势发展到了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的轉折点。正如毛主席所論断：东风已經压倒西风。这大大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在国內，由于国家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全面超額完成，为大跃进奠定了物质基础；反右派斗爭的彻底胜利和全民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开展，为大跃进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已經建立起来近两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經巩固，大面积高額丰产的事迹已經开始出現，为农业大跃进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树立了旗帜；再加上干部下放参加农业劳动，国家对农业的財政支援日益增多，科学技术的面向生产实际；所有这一切就促进了农业大跃进形势的首先形成。1957年冬与1958年春空前規模的兴修水利运动的显著成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中央委員会第六次全体会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頁。

績，就是吹响了跃进号角的具体說明。农业一馬当先的跃进浪潮就推动了工业生产的高潮，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与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始兴起，又掀起了文化革命与教育革命的浪潮。于是一幅百花齐放、万馬奔騰的跃进局面也就在1958年春天出現。正如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議上的报告中所說：“一九五八年的春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开始全面跃进的春天，无論工业、农业和其他事业，都有比以前更大更快的发展。”这就清楚地說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究竟是在什么时期开始的，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和出現的。再让我們仔細讀一讀刘少奇同志在同一报告中所讲的如下这段話：“提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这就是說，我們的不断发展的革命，現在又需要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党的这个及时的号召，迅速受到了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識分子的热情的响应。事实上，人民群众已經行动起来了；在許多地方，征服技术落后和文化落后的伟大的进軍，已經轟轟烈烈、蓬蓬勃勃地开始了。”①很清楚，向技术、文化革命进軍，群众已經行动了起来。这种群众的实际活动，确实是在1958年5月以前就已开始了的。至于說“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这条总路綫，是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議上所通过而正式公布的，那么，我們还不应忘記，这条总路綫是在八年建設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在正式公布前，毛主席就不止一次地在很多地方提出过这种思想。不能以它公布之日作为划分时期的界限，而应从它在实际上发生主要作用之时算起。

在划分历史阶段时，我們还应注意到历史面貌的各个方面，抓住主流，照顧全面，完整地反映一个时期的历史也是很重要的。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应着重于抓住政治和經济的两个方面，不要只抓住了政治而忽略了經济，只看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忽略了社会主义建設。革命与建設是相互交織，而同时进行的。1957年底到1958年春間，我国历史正是处在一个由社会主义革命逐漸开始轉向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我国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1957年取得的。1958年春在广大的农村中，大跃进的洪流已經逐漸发展成为历史的主流，波涛滷涌，气势磅礴。虽然在1958年3月党中央还发布了“反浪費反保守”的指示，并以整风为綱推动生产大跃进，但从历史发展的来潮与主流来看，这时已經开始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設的新时期。否認革命与建設的交錯形势是不对的，但看不見历史来潮的主流和新生事物逐漸占居主导地位的情况，同样也是不对的。

如果从經济的角度来看，为了反映生产发展的历史，为了明确地反映我国有計划的經济建設的阶段，我們也应在1957年与1958年之間作为一个断限。因为它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和第二个五年計划的交接綫。我們不能把界于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計划間的断綫割裂开来，而把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开头五个月吊在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尾巴上去。1958年的全面大跃进是完整的一个阶段，工业、农业、文教卫生事业从年初到年底都有个完整的发展綫索，我們也通过这一年取得了很丰富的建設經驗。党的建設总路綫和一整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也是从这一年的年初就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貫彻执行的，因而在这一年內才使得我們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并在此基础上出現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人民公社。我以为1958年，可以用“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实現”的标題载入史冊，这也将是完整的、极其光輝灿烂的一頁，似难将它割裂成为两段。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也指出：“八屆六中全会总結了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經济发展的主要經驗。”而同时指明：“一九五八年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是一个伟大的实践。通过这个实践，我們不但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并且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取得了丰富的經驗。”②这也就清楚地昭示了我們，1958年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小阶段。周总理在最近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是一再地把1958年的大跃进作为完整的一阶段而提的。总理在报告中說：“第二个五年計划的第一年，即一九五八年，出現了一个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民經济的大跃进”。总理又說：“显然，一九五八年国民經济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前进，而是一个巨大的、全面的跃进。”③因此在事实上和理論上，我都以为应将1958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

---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頁及第20頁。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中央委員会第六次全体会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頁及第5頁。

③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見1959年4月1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关于"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始"一章的教学

天津市第十六中学历史教研組

本学期初，在党的領导下，我組同志集中检查了过去我校历史教学中存在的問題。通过分析学生試卷、互相听課和对教学目的的检查，我們感觉到，有两个問題迫切需要解决。一是在教育革命中，如何結合历史教学业务改造教师的立場和观点；一是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如何把历史知識的傳授和思想政治教育很好地結合起来。我們在討論中，一致認为抓集体备課和課堂教学是解决問題的两个中心环节。如果在集体备課过程中，大家把各种不同的看法都摆出来，經过充分討論，某些認識方面的問題是可以解决的；錯誤的立場和观点，在同志們的帮助下也可以得到糾正；而教学思想会更加明确。教师的教学思想明确了，就会加强課堂教学中貫徹教学目的的自觉性，知識傳授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結合进行也就有了保証。为了把我們的認識貫徹在实踐中，本学期我們組織了一次校内的观摩教学，选定的教材是初中二年級中国历史第二冊第九章"全国抗日战爭的开始"。下面介紹的是我組在集体备課过程中討論的問題、主講教师的課堂教学活动記录和对这一章教学的反应与分析。

（一）集体备課和确定教学目的。

大家在討論这一章教学的目的和重点时，一致認为在教学中应該突出說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保卫者；教学重点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建立"和"抗日战爭中的两条路綫和两个战場"两个問題；"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只是給以后講日寇对蔣介石进行政治誘降留下伏笔，不是重点。

在討論这一章教材的目的性时，有两个問題爭論较大。第一，講授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形成原因时，应着重說明这是由于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給予压力的結果，还是着重分析这是由于美英帝国主义及四大家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到底誰是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建立的主要力量。开始討論时，有些同志認为后者重要，对人民群众压力的作用是較忽視的，經过辯論才搞清楚，两者都是原因，但应突出人民群众的压力所起的作用，否则不能說明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爭时期所表現的动搖性和采取片面抗战路綫的根源。因此，对这方面不能講得过少而显得不突出。第二，大家虽然都同意在教学中应把党的領导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体現出来，但有些同志却主張把党和群众的作用分开来講。如果分开講，不但講述的系統性会受影响，最重要的是也就不能把党和人民群众相互結合的密切关系講清楚，影响了教学的思想性。經过討論，大家共同的看法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領导的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抗战，因而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講授时应該突出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在講授两条路綫两个战場的时候，应該突出講述平型关大捷；而講平型关大捷，又应該把党的領导和群众的支援突出出来。这样，才能使学生进一步認識：中国共产党是祖国民族利益的保卫者。过去我組存在的一个較大的缺点是，原則上承認人民群众的力量在革命斗爭中的巨大作用，但在实际教学中却没有把它具体体現出来。通过这样一番討論，使我們从思想上开始扭轉了这一傾向，大家普遍要求在具体教学中，把人民群众的作用体現出来。最后，我們确定了如下的教学目的：

"講解抗日战爭的开始，使学生了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由于中国共

产党領导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抗战，于是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正式建立起来了。但代表大地主、大資产阶級利益的国民党政府，执行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綫，压制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战場上出現了兵敗如山倒的局面，使大片国土淪陷；而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全面抗战路綫，深入敌后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发动一切抗日力量，創造了輝煌的战績。通过以上史实的講述和分析，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是祖国民族利益的保卫者。”

（二）課堂教学記录。

由于前一章刚講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学生对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建立的基础已有所了解，所以，教师在这里就只用几句話概述了在党的領导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以后国民党的态度，指出他們不得不改变他們的內战政策及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的主張。接着說明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中国軍队奋起抵抗，全国的抗日战爭就爆发了。

由此开始导入新課，教师在黑板上写出了講課提綱：

一、全国抗日开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建立

授課教师先說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的时間、地点、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借口的挑衅行动和中国駐軍奋起抵抗的情况。接着教师以充沛的感情指出“七·七”事变震动了全国的人心，爱国的人民无不奔走相告，一致要求全面抗战。这时候，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任务就是击退侵略者保卫祖国。党在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号召全面抗战，敲起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钟，使大家知道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能挽救民族危机；提議立即团結全民，实行全面抗战。教师通过这一段叙述，說明了党和人民的抗战决心。

接着教师指出，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这緊急关头，仍然跟日本侵略者进行秘密的卖国談判，企图継續妥协。但日本侵略者却节节进逼，8月13日在上海发动了进攻，遭到上海守軍的坚决抗击，这一进攻大大地震动了国民党政府。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正式成立，7月中旬，中共中央就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給国民党，并約定由他們发表。但国民党又拖延了一些时間，到了9月22日才发表。无論如何，中国共产党領导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在这时就正式建立起来了。对国共合作的其他具体表現教师也做了介紹。叙述到这里，教师着重分析了国民党不得不抗战的原因，正是由于人民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全国人民抗日的怒潮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如果国民党政府仍然实行不抵抗政策，它就无法継續維持它的統治地位。这样的叙述和分析，就突出了党領导人民坚决抗战和国民党政府被迫抗战的情况。对国民党暂时抗战的內在原因教师也做了分析，指出日本侵略者发动“八·一三”上海事变，直接侵犯到四大家族的利益和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是国民党的态度有某些轉变的內在原因。这样，学生便認識到党和人民是促成統一战綫的主要力量，也明确了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本質和暂时抗战的內在因素，并为下一段講授两条抗日路綫准备了条件。

二、抗日战爭中的两条路綫

教师板书提綱后，提問学生“根据上面的分析，你們看抗战开始时，有哪几种不同的抗日态度？”学生答：“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共产党的坚决抗战，另一种是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接着教师便开始講两种态度、两条路綫的具体表現。

（1）抗战开始后两条路綫的出現

教师带着极憤慨的感情指出代表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国民党蔣介石反动集团，对抗战本来就是动搖的，企图妥协苟安，虽然被迫抗战，但只要日寇不过分地侵犯美英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的利益，他們还是要妥协投降的。因此，他們是：一方面被迫抗战，而另一方面，却反对中国共产党領导全国人民抗日，并竭力設法摧毁人民的抗日力量，解散中华民族先鋒队等九十个抗日团体，逮捕很多爱国青年。这就是国民党所实行的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綫。

教师紧接着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根本相反，从抗战一开始，就坚持人民的全面抗战的路綫，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党号召全民总动員，一致抗战。党为了团結全国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共同抗日，在解放区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在国民党統治区也积极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經济权利。教师明确地指出发动人民群众共同抗战就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綫。而这样的抗战路綫正是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只有这样做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才是眞正的抗战，才能打退侵略者。为了启发学生进一步考虑两条路綫将会产生什么不同的后果，教师提問道：“在这样两条不同路綫的指导下，其結果将会怎样？”学生回答：“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必定会造成

失敗，党的全面抗战一定会胜利，因为党的路綫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这样就为下面講述在两条路綫的指导下出現了两个战場的問題做了准备。教师肯定学生的回答后，就开始講两个不同战場的具体情况。教师板书了講課提綱，挂上了事先繪制好的“抗日战爭形势图”。

（2）两条路綫指导下的两个不同战場

1.一潰千里的国民党战場

“抗日战爭形势图”上，标明着抗战开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中，为国民党所丧失的祖国河山。学生一看就可清晰地知道国民党所弃守的国土，已經占去半个中国了。教师指出这就是国民党政府执行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綫的結果。教师指着地图說，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間里，华北、华中、华南大块土地都淪陷在敌人手里，沿海半个中国的錦綉山河，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主要城市，都被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教师的愤怒的思想感情激发了学生，他們痛恨日本侵略者，也不滿国民党政府的反人民路綫。接着教师写下新的标題，把話題轉到講述解放区战場。

2.节节胜利的解放区战場和敌后根据地的建立

对于解放区战場的講授，是以平型关大捷为中心內容的。教师在指出抗战一开始解放区战場上就出現了节节胜利的局面之后，着重描述了平型关大捷的战斗場面。教师引用了“紅旗飄飄”中輯录的“首战平型关”的一段材料，来說明林彪同志指揮的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开向平型关时，沿途受到老乡們夾道欢迎和支持的情况。描述說：那些扶杖的老太太和老大爷，抱着或背着嬰儿的年青母亲……，一見到八路軍，都悲喜交集地围上来，詢問他們是不是到前綫打鬼子的。尤其是那些东北流亡学生，夜深人靜，还挤在車站唱着悲愤的流亡歌曲，欢送八路軍。八路軍的战士們，看到同胞們的流离失所，想到祖国所受的灾难，真是已經到了生死的最后关头，他們奋勇杀敌的决心更加坚定。教师講清楚了战役的时間、地点后，又引用“紅旗飄飄”的材料叙述了9月24日八路軍在风雨飄搖、山洪暴发的黑夜里，赶路行軍和埋伏在山上的情况，以及25日的战斗过程。講到战役将要結束的时候，教师以喜悅的心情引用“紅旗飄飄”上描述那次战役我軍胜利的情景說：举目一望，十多里長的山沟里，到处狼借着日軍的尸体、死馬、大車、汽車，堵塞了公路。白色的公路上，血迹斑斑，躺着三千多个血肉模糊的兽兵……。这是日本侵略者在侵略中国的战爭中第一次嚐到中国人民鉄拳的厉害！附近的老乡听說我們打了胜仗，高兴得跑来参战。几千老乡帮我們抬伤員，搬胜利品。这次繳获的胜利品，单是軍用大衣就足够全师每人一件。这时学生已經受了深刻的感染，露出了兴奋的表情。教师接着便启发学生說：“这次获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学生很快地回答：“这是由于党执行了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綫，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才取得了这样的胜利。”随后教师就开始分析平型关大捷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次战役是日本侵略軍在中国第一次遭到失败，也是中国軍队第一次大胜利。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教师随着便轉入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闡述，指明为了使抗战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在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軍一方面在山西战場上継續抗击敌人，另一方面，深入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爭，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时教师挂上“抗日根据地略图”，并指图說明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华中、华南分布的情况。学生通过地图的直观，可以与国民党一潰千里的战場做一个鮮明的对比，因而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最后教师叙述了新四軍及其他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情况，指出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八路軍和新四軍迅速地发展起来，使敌后战場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場和后来的反攻基地。

教师根据教材簡要地分析了汪精卫投敌时的国內外形势，突出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給敌人以严重的威胁，日本侵略者便改变了战略，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誘降为主、以軍事打击为輔的方針，而用主要力量来进攻解放区根据地。教师以鄙視的感情講述了国民党的亲日派首領汪精卫在这个时候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的情况。教师提出这一点，只是为以后講解日寇通过汪精卫向蔣介石誘降打下了基础。

最后，教师提出一系列的問題以巩固新知識。問題有：为什么在抗日战爭中会有两条不同的路綫？什么是全面抗战的路綫？什么是片面抗战的路綫？各代表誰的利益？平型关战役在什么时候？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学生的回答基本是正确的。一个学生对“什么是片面抗战的路綫”的回答說：“这是由于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利益，他們反对我們党領导和发动人民起来抗战，他們既怕人民起来抗战，又怕人民把他們的政权推翻。”这說明学生不仅理解了片面抗战路綫的一般含意，而且理解了問題的本質——这种路綫所代表的阶級利益。

最后，为指导学生的复习，教师布置了以下的复习思考題綱：

（1）国民党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抗战的？

（2）抗日战爭中有哪两条不同的路綫？什么叫做片面抗战？什么叫做全面抗战？都是誰領导的？

（3）平型关大捷发动于何时？有何重大意义？

（三）对这一堂課的反应和分析：

課后，我們召集了一部分听課学生举行座談。学生們反应，对于党是民族利益的保卫者这一事实，有了較深刻的理解，較具体地認識了党的領导和人民群众力量在抗日战爭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有的同学說，过去听人說抗日战爭是党領导的，国民党不积极抗战，但怎样不积极并不清楚。通过这次听課，知道共产党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的，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是想尽办法进行抗战的，因此它的抗战路綫是全面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勾勾搭搭，出卖主权，妥协退让，是在人民压力下被迫抗战的，还害怕人民抗战，因此它的抗战路綫是片面的；有两个抗战路綫，也就有了两个不同战場。另有一个同学已經开始运用这堂課学得的历史知識对其家人进行教育。他說，抗日战爭胜利后，国民党在过去的淪陷区宣傳，抗战胜利是由于他們的力量而得到的，我外婆就很相信，在小学我虽然也学过平型关大捷的历史，可是因为体会不深，总說不服她；这次学完这一課，我就把这段历史講給外婆听，她也相信了。

結合学生的反应，进行了教学討議。大家認为这堂課的教学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因为講的具体、生动，分析清楚，所以学生对抗日战爭开始时的一些基本史实，对两条抗战路綫和两个不同战場这一中心內容是能掌握的。在思想教育方面，由于教师的阶級情感显明，給学生的感染是較深的；对党是民族利益的保卫者、党領导的中国人民是抗日战爭的主要力量，也有較明确的認識；对日本侵略者侵略气燄和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同学們是十分气憤的；对国民党在抗日战爭爆发前后的立場和态度，同学們也能从阶級本質上来認識。課堂上使用的两个战爭形势图，虽然画得相当簡单，但前后对比显明，給学生的印象也較深。这堂課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比如，講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正式建立問題，对国民党被迫抗战的原因，只照課本所提"人民的压力"講了一遍，没有引用具体的史实加以說明，因而說服力还不够强，需要今后努力改进。

通过这次教学活动，我們感到，第一、教师的观点和思想感情是决定一堂課教学方向的根本問題，有些观点問題可以通过集体討論得到解决，而阶級情感还是需要依靠教师自己不断地努力改造思想，提高阶級觉悟；只有如此，才能在教学上做到观点正确、爱憎分明。第二，抓备課和課堂教学这两个环节，是推动教学改进的必要措施，这样，才能使教师的教学思想明确，知道在教学中应抓住什么綫索，进行什么思想政治教育，然后才能做到目的明确、重点突出，把使学生牢固地掌握历史知識和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这个双重任务在課堂教学中很好地給結合起来。

我在"中国紅色政权的建立"一章教学中的一些做法

北京市第五中学　張东浩

初中課本的"中国紅色政权的建立"这一章教材，內容比較复杂，需要給学生講清楚的至少有以下五个問題：

（一）1927年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所做的英勇尝試。

（二）毛澤东同志在革命实踐中所摸索到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就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三）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和土地革命的阶級路綫。

（四）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四次围攻的被粉碎。

（五）中国共产党領导根据地人民所进行的經济和文化建設工作。

这五个問題包涵着丰富的內容，是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好材料。具体說来，可帮助学生形成以下几点認識：

（一）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在反动的独裁

統治者的血腥屠杀下，“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絕”，为了爭取中国人民的幸福和革命事业的胜利，而勇往直前地継續战斗；党永远領导中国人民前进。

（二）使学生初步認識毛澤东同志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問題——工农联盟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有初步的理解；从而受到阶級教育。

（三）使学生树立一种思想——当革命是在毛澤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就胜利、就发展；而当革命脫离了毛澤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就失敗、就后退。使他們更加热爱伟大的領袖毛主席。

（四）通过講述革命根据地經济的发展經过，使学生进一步認識劳动人民对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对推动革命事业前进所起的巨大作用，培养学生尊敬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通过講授当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学生認識党的教育方針的伟大正确，并自觉地去貫徹这一方針。

对初中二年級的学生来說，这些問題并不是很容易理解的。怎样在叙述具体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入淺出地分析問題，把道理講清楚，使学生領会这些問題的基本精神，是我們完成这一章教学任务的中心問題，我試着做了一些努力，現把具体的做法簡介于下，希望同志們給予帮助指正。

这一章教材，共用两个課时来講授。第一节課，包括“八一”南昌起义、井岡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三个小标題的內容。

在講課开始，我首先对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失敗后的革命形势做了分析，然后叙述了南昌起义的經过，并着重分析了这一英勇行动的重大意义。我着重闡述的包括以下三点：

（一）南昌起义大大地鼓舞了从武汉退出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武装，使他們从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

（二）南昌起义是在革命形势一落千丈的时候，在白色恐怖下，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猖狂进攻的伟大壯举。

（三）192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革命軍队的誕生日，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領导武装革命的开端。从此，中国人民有了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战斗的軍队，将中国革命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

在总結了南昌起义失敗的教訓以后，我把学生的思路引导到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問題上来。对秋收起义做了簡要的介紹，然后就着重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中心問題：紅旗要不要継續打下去和怎样打下去。明确地告訴学生，毛澤东同志在革命的实踐中，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教訓中，摸索到了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从城市退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以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为了使学生充分理解这一問題，我提出了一系列启发性問題，并且进行了必要的分析。为什么毛澤东同志領导起义的队伍去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呢？为什么說它是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呢？我指出，这要从城市和农村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任务的需要，中国革命斗爭要依靠什么力量等几方面来考虑。我首先說明当时的形势是处在低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不是跟反动势力作决战的时候（暗示在当时条件下，将主要鋒芒集中到城市、組織武装暴动的方針是行不通的）。然后引导学生就城市和农村的反动势力的統治力量来做比較，看在哪些地方他們的統治更稳定一些，哪些地方更薄弱一些，結論自然是反动統治力量在农村較为薄弱。再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来看，我指出当时要解决的首要問題是几亿农民的土地問題。而要解决这一問題自然应該是到农村去大搞革命。我又問学生搞革命要依靠誰呢？学生說要依靠群众。再問，誰是群众的最大多数呢？答案是除了在城市有几百万工人群众外，最主要的就是几亿农民群众。从这些談話中，学生已初步理解了为什么鬧革命要到农村去的道理了。随后又提出一个問題：为什么毛主席能找到这样一条最正确的革命道路呢？我直接地告訴学生，这是毛主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与中国革命实踐相結合的結果。使学生認識到，要革命就必須按照毛澤东同志指出的道路前进，也要学习他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

如何将毛澤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思想深入淺出地講給学生，是一个比較复杂的問題，由于年龄特征的关系，理論不能講得过深。我是这样考虑和講授的。对于党必須掌握革命武装的道理，学生已有初步的認識了，但对为什么还必須有革命根据地就不清楚了。我为了使学生易于領会，給他們做了这样的解释：干革命就必須要与敌人周旋；敌人有大后方，打疲倦了，便回去休整，然后再来围攻

我們。同样，我們也必須有战斗后的休整，养精蓄鋭以后才能对付敌人战胜敌人。我們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必須建立革命根据地，好使革命武裝有存身立足之地。接着我又启发学生，仅仅有了革命武裝和革命根据地是否就够了呢？怎样才能使革命武裝不断扩大，才能使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呢？我指出，毛澤东同志告訴我們說，还必須有土地革命。只有大鬧土地革命，挖掉封建統治的基石，使农民群众从長期的奴役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他們才能真正靠攏我們，发揮出他們对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成为发展革命力量的无穷无尽的源泉。反过来說，要搞土地革命，也必須有軍队、政权給群众做后盾，不然也是没有保障的，这三者是互相依賴互相影响的，必須把这三者緊密地結合起来。

在講土地革命时，我着重講解了"依靠貧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級"的土地革命的阶級路綫。其中特别是关于依靠誰、联合誰、反对誰和为什么要这样做是需要突出說明的重点問題。学生对依靠誰、反对誰的道理还比較清楚，对为什么联合中农和限制富农就不易理解了。于是我就将邓子恢同志在"福安农民运动的开端"一文中談到的故事講給学生听。故事是这样，大革命失敗后，有些群众受了国民党的欺騙宣傳，有許多疑虑和恐惧，对共产党有不少誤解。当时邓子恢同志到福建福安去做发动农民的工作。一天晚上，有貧农、雇农、中农、富农等各种成份的人到邓子恢同志处去"聊天漫談"；当时富农提出了許多問題，說什么"人家都說共产党共产公妻"、什么"种地不交租，欠債不要还……这也不公道"等等。邓子恢同志当場就給他們做了正确的解釋。貧农、雇农听过后，疑虑立即烟消云散了，而中农始終不表示态度。这时我就启发学生，为什么富农提出許多反面問題，中农不表示态度，而貧雇农一經解釋就搞通了呢？我就这件事告訴学生說，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不同地位不同阶級的人，对待問題的态度就是不同，革命的領导者就需要根据他們对革命的不同态度，而采取不同的对待方法，这就是党制定工作中的阶級路綫的根据。經过这样講解，学生受到了生动的阶級教育，他們开始認識到做革命工作必須树立无产阶級的阶級观点，走无产阶級的阶級路綫；否則就要失敗。

第二节課的主要內容是講革命根据地如何在軍事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扩大。我們要以生动的事实来說明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所走的这条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并向学生进行辯証唯物观点和劳动观点的教育。

1930年底——1933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四次猖狂的进攻，但是在毛澤东同志的英明領导下，都一一地打退了；根据地不是縮小而是扩大了；紅軍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这个胜利是怎样取得的呢？主要是由于执行毛澤东同志正确的軍事路綫的結果。在講四次反围攻的斗争时，我将毛澤东同志在战略上藐視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視敌人的道理，滲透在叙述和分析中。我指出，我們在任何时候都要透徹地清晰地看出敌人腐朽垂死的本質，坚定我們必胜的信心，但对具体問題又应做十分严肃的分析，認真对待，不可馬虎从事。在講几次围攻和反围攻斗爭的战术时，我特別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来加深学生对这个問題的認識和理解。比如：敌人如以"長驅直入"、"分进合击"，我則以"撒开两手，誘敌深入"；敌人施以"步步为营，穩札稳打"，我則以"避其主力，各个击破"；运用这种作战方法，就粉碎了在数量上多于我軍几倍的敌人的进犯。这样講，就使学生懂得了战略战术两者間的辯証关系；也有助他們去理解冲天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結合的革命道理；最重要的是树立了只要有毛澤东同志的英明領导，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思想，使学生更加热爱和尊敬我們的伟大領袖毛主席。

在第二次国內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經济和文化建設工作，对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我在講述这一問題时，首先指出經济建設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这革命的动蕩年代里，为了保証紅軍战争的物質供給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必須努力进行經济战綫上的艰苦斗爭。当人民群众亲身体驗到了革命带来的好处，就会更加靠攏革命支援战争，例如当时有許多青年男女踴跃地参加了革命軍队(上杭县才溪乡参軍的男女青年占88%)。提到当时的发展經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时，我向同学进行了工作必須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教育；并指出，依靠和发揮群众的力量，是战胜經济封鎖的重要关鍵，只要相信群众并充分地依靠群众，一切困难就都好解决了。

在講文化建設工作时，我着重介紹了当时苏維埃文化教育的方針政策，并与今天党的教育方針联

系起来进行教育，让学生明了我党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和为誰培养的問題。課本上提到的高尔基戏剧学校是个典型例子，他們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該校学生下农村、上火綫，为当时的革命斗爭和生产斗爭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通过以上不一定妥当的想法和做法，我有以下几点認識：

（一）要想通过教材的分析講述講解，达到进行四个基本观点的教育之目的，我們必須从思想上对貫徹党的教育工作方針有很大的自觉性，这样就能抓住一切适合的史实来进行教育。同时自己要提高政治理論水平和实际觉悟，否則講出話来往往使人有牽强附会之感。

（二）我們应仔細地剖析教材內容，重点和目的，找出教材內在的关連性、系統性；因为实現一个教学目的，往往需要通过对許多方面的分析和闡述，不能孤立地只从某一个方面去进行教育。

（三）和当前的斗爭結合起来，用学生現有的感性知識，帮助他們理解过去的問題（如联系教育方針）。这种做法本身便富有現实意义。当然不能联系过多，以免犯喧賓夺主的毛病。

进行展覽复习教学的尝試

福建省龙岩二中　陈怀信

运用历史大事年表、图解、表解、历史地图和历史图片等直观教具，以展覽的形式进行单元或期終复习，在我校是一种新的尝試，收到了較好的教学效果；現在把我們的一次单元复习的做法簡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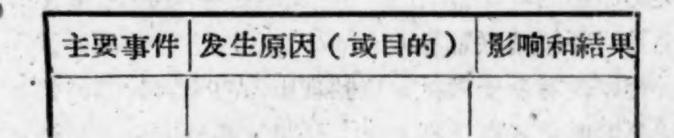
展覽室里的布置：在展覽室里，我們将有关准备复习的这一单元的直观教具，如大事年表、各种表解、图解、历史地图、主要历史人物表和历史图片等，都按講解的順序排列整齐。对比較重要的图表，在篇幅上和字体上要比其他图表略大一些，以突出重点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图表之外，另設意見箱和解答牌，备課外輔导之用。

展覽复习的过程：我們要介紹的是初中中国近代史課的第二編“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产生　甲午中日战爭”的阶段复习課。复习开始，我們首先让学生观看的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历史事件的年表，表式如下：

年　代	重　大　事　件

看这一幅年表的目的，是使学生对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帮助他們掌握主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順序。教师根据年表順序做了講解說明，講解的內容包括这一編教材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如中国无产阶級的产生、民族資本主义的产生、中法战爭、中日战爭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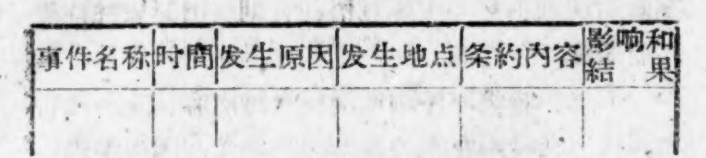
第二个图表的內容是民族資本主义产生和洋务运动，表式如下：



主要事件	发生原因（或目的）	影响和結果

看这幅图表的目的是想把学生已学过的有关民族資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洋务运动的知識集中起来，系統化起来，并給学生以新的启发。教师在講解中国无产阶級产生的原因和壯大过程时，按照图表着重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級的出現早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这一历史特点，告訴学生这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質决定的；也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級的历史任务。对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緩慢的原因，对洋务运动的实質和它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都尽量利用图表加以說明。这几种历史現象之間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作用，有些部分是可以在图表中反映出来的。

教师講解的第三个图表是中法战爭、中日战爭一覽表，表式如下：



事件名称	时間	发生原因	发生地点	条約內容	影响和結果

这一部分是这一阶段历史課的复习重点。教师对时間、地点、战争发生原因和战争过程，只做了略述，着重地复习了中日馬关条約的內容，并和1842年中英南京条約的內容做了比較，包括賠款、开放通商口岸、割地等各个方面，最后突出地分析了允許日本在中国直接开办工厂的影响。这样，学生对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就有了深刻的印象。

利用这三种图表复习了这一阶段教材后，学生基本上已經能够掌握这一阶段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了。其他有关的历史地图、图片、主要人物表等只做簡略介紹，留給学生課后自由观看，这样可以避免分散学生听复习課时的注意力。这堂課，除教师講解外，还留几分鈡时間，叫学生到前面来細看一看图表，以加深他們的印象。

这堂复习課，主要是由教师来講解的，学生活动較少，因而我們另外又安排了一节課，让学生按照布置的提綱进行討論并提出問題，最后由教师作总結。这样会增强展覽复习的效果。

寒假期間我校的参观訪問活动

哈尔濱第十六中学历史教研組

参观乡土的革命史迹和訪問革命老战士，是在历史教学中进行革命傳統教育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一項重要的輔助性活动。哈尔滨市是一个具有革命傳統的城市，它是东北抗日联軍的活动基地，許多革命先烈在这里抛头顱洒热血，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現在哈尔滨市的領导同志中，有不少是当年抗日联軍里的老战士。为了进行革命傳統教育和編写乡土教材，我們利用寒假十天时間，組織学生参观了东北烈士館，訪問了几位革命老前輩——东北抗联的林排長和張連長，会見了哈尔滨烟厂老工人馬天路、焦克量、郭立塘三同志。除搜集了一些有关教学的参考資料外，在我們的思想上，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

到东北烈士館参观学习过程中，观看了党在各种不同历史时期中領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政治活动与革命斗爭，是那样艰巨，又是那样无比的頑强。尤其是东北抗联的英勇艰苦斗爭的伟大場面，更深刻地感动了我們，如有的学生参观后在自己手册上写道：“我的家，在松花江畔。过去認为故乡的美是山明水秀，风光明媚；現在才眞正懂得自己家乡的可爱，是无數革命先烈抛头顱、洒鮮血的英雄故乡。”有的同学說：“过去老师講革命的艰苦，体会极不深刻；但是从楊靖宇烈士壯烈牺牲后，殘暴的敌人解剖他的遺体，发現胃腸中只有草根和树皮，心里难受极了，平时最不爱哭的我，也不禁泪珠儿滚下来了。”在全校学生会担任文娛部長的一位同学說，他过去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往往就低下了头，不能坚持干下去；看了罗登賢烈士那种不怕困难的战斗精神，覺得給了自己以百倍的勇气和干劲，他表示一定要学习罗烈士那种热爱党的事业、战胜困难的精神，来更好地完成自己所担当的工作。

訪問革命老前輩——东北抗联的林排長、張連長时，他們都以亲身的經历，为我們講述了許多有血有肉的艰苦頑强的英勇斗爭事迹，使我們进一步認識我們的革命老一輩是怎样經过了极其曲折不平凡的道路，才有我們今天这样幸福生活的。

前东北抗联林排長現在是一个大型制材厂的厂長。当我們訪問他时，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精神飽滿的老人，穿的又是那样的朴素，一身黑色的旧棉服，頸上围着一条破了許多洞眼的围巾。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們，并以极謙虛的口吻給我們講述了許多生动的战斗故事。他是在1937年参加抗日的。当时作战条件异常困难，沒有枪炮子彈，三个人一小队，七个人三支枪四顆子彈，三顆坏的一顆好的，要武器彈药只有向敌人夺取，有一次他們十八个人突击敌人，当場打死敌人二十八

个，并活捉了两个日本軍官。又有一次，打垮了敌人，得到了五十多支枪。没有衣服穿，就把打死的敌人的衣服脫下来，变成了自己的服装。軍粮补給困难，秋天在山里吃橡子、臭李子、山丁子、蘑菇、野葡萄，春天吃野菜苦菜，难得吃一頓小米；但同志們斗志高昂，不断取得对敌斗爭的胜利，队伍日漸扩大，发展到几千人。他們的政委是李兆麟将軍，他經常恳切地告訴同志們："要革命，必然会有困难，只有想办法克服；怕困难的人，是不能革命的。"东北抗日联軍在山上住了八九年，除了吃野菜，就是吃橡子面，老乡們看見同志們生活太苦了，不畏敌人的迫害，将自己的存粮送上山去，有的在路途上牺牲了，鮮血洒在粮食上。这就是軍民的血肉关系，这就是对敌斗爭！林厂長最后說道："只在在党的領导下，同志們才能有这样的机智勇敢，不怕流血牺牲，为了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貴的生命！"

东北抗联三軍三师四团一連張凤岐連長，現任哈尔滨森林印刷厂的党委书記。他正在因病休养，但听說我們要訪問他，热情地抱病接見了我們，他很关怀我們的学习和工作。提到他过去的战斗生活，他謙虛地說："过去虽然抗过日，为人民做了点工作，算不了什么，这都是由于党的培养教育。"接着他就給我們講了許多他亲身經历的故事：1936年，他在东北抗日联軍軍事政治学校学习。那时学习条件是很艰苦的，校舍建立在五馬嶺嶺后的原始森林里，教室是与地洞差不多的房子，有时用樺树皮代替黑板；每天上課，老师只能用半根粉笔，另外半根要留給学生下午复习演算用。在部队行軍时，仍然坚持不懈地学习（在每个同志的背包上写上字，一面走路一面学习，休息时間也不放过，用木柴当笔在地上写字）。1938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張連長接受了师部的一个紧急任务，带四名同志下山，通过地方关系买子彈和战斗用品。他們突破了敌人的封鎖綫，找到了地方上抗日救国会的同志，經过了无数波折才买到一袋子彈。但在回来的路上，被敌人发觉了，他們五个人与一百多个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彈打中張連長的右臂和腰部，腸子被打坏了，他不能行走了，要同志們先把子彈送回去，但这四个同志坚决不肯，并說："要死就死在一块。"他說，当时他躺在地上寻思："我愿意单个儿留在这里嗎？不！但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整体的利益，我必須这样做。"于是他就硬着心腸严肃地命令他們赶紧出发，冲破敌人包围，把子彈和他的枪交給組織，不要管他。同志們没法，流着眼泪走了。他一个人就隐蔽在小山坡上，等了一天一夜，伤口痛得难以忍受，几次爬起来又跌下去，但他仍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回队。果然到第三天拂曉，同志們抬着担架找到了他，把他重新接回部队。接着他又談到在医院里休养的情况。一个多月来，天天上葯，可是伤口老是不見好，后来出院才知道这种葯粉是化学唱片磨成粉制成的，同志們起了个革命的葯名叫"精神治疗葯"。出院后，伤口虽然好了，但打坏了的腸子却失去了控制能力，老是冒屎。他說："我不能因此而不坚持对敌斗爭。腸子虽坏，仍坚持以机枪来杀敌，同志們当时为我起了个綽号：冒屎腸子射手。"

訪問哈尔滨烟厂老工人馬天路、焦克量、郭立塘三位同志时，他們向我們介紹了烟厂的历史：烟厂的創办，离現在有四十年了，当时厂主是波兰資本家，以后又相継归了英国、日本資本家。那时候，工人过着象牛馬一样的生活，每天干十小时到十一小时的活，吃的是掺有大量爐灰渣子的高粮米。上厕所要拿牌子去，时間長了就挨打受駡，甚至还要扣工資或被开除。資本家的残酷剝削迫使工人不得不起来斗爭。在一次要求增加工資的斗爭中，在群众压力下，資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但心里有所不甘，想尽毒辣办法来迫害工人代表李勇貴，但几个月也没找到李勇貴的一点差錯。有一次，李勇貴的妻子为了家务事到厂找李勇貴，在門外吵嚷了几句，資本家就以"不守厂规"的罪名开除了工人代表李勇貴。在旧社会，工人阶級頑强的斗爭性和高貴品质，有許多极其生动的事例。有一位姓刘的工人，工資低，家中人口多，他恨透了資本家，拿切絲刀把电門关閉，全厂停工。工人們就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要資本家增加工資，資本家被工人斗爭高潮所吓倒，只好答应。另一个工人楊好才，家中生活困难已极，每頓飯都吃不飽，他憤怒不干了。到管事那里去結算工資，当时資本家的狗腿子赵一弗假心假意要多給楊好才一点錢，楊好才不但不要，并当众痛駡狗腿子一頓，大踏步地走出工厂。最后他們以喜悅的心情告訴我們，解放后的烟厂与过去眞有天淵之别，現在每天工作时間不超过八小时，有吸烟室、俱乐部、托儿所、幼儿园、职工医院、休养所、劳保待遇、困难补助金、政治文化学习和技术学校等各种福利設施和項目。他們

說，这种幸福生活是怎样得来的呢？这都应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現在全厂工人干劲冲天，月月超额完成生产計划，新的大跃进气象，数不尽說不完，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很多同学都表示要学习他們的精神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通过这几次参观訪問活动，我們認为至少有以下两点比較重要的收获：（一）使学生直接受到了生动的革命傳統教育，在阶級情感方面受到了很深的感染；对教师来說，也有助于进行自我改造。（二）搜集了一些乡土历史資料，可以丰富教学內容，帮助学生了解一些由于缺乏感性知識而不易理解的历史概念。因此，我們認为这种活动是一种好的輔助教学的形式，应該充分利用乡土的有利条件，配合教学有計划地組織一些这类活动。

消 息

北京中学教师集体編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开始出版

北京市中学教师最近集体編写了一套通俗历史課外讀物——“中国历史小丛书”。这套小丛书現在正由中华书局陆續出版。

小丛书的內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工人运动、农民战爭、劳动人民的重大发明創造等祖国历史上經济、政治、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問題；（二）辛亥革命以来一些革命先烈，如孙中山、李大釗等的傳記；（三）从秦末到太平天国革命以来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領袖，如陈胜、吳广、黃巢和李自成等的傳記；（四）对国家民族有重大貢献的英雄人物，如岳飞、文天祥等的傳記；（五）少数民族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清代苗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等；（六）科技人物和学术思想家，如孔子、張衡、祖冲之等的傳記；（七）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如屈原、司馬迁等的傳記；（八）革命青年和革命妇女中的英雄人物，如董存瑞、王孝和、赵一曼、刘胡兰等的傳記；此外，張騫、玄奘等重要历史人物和長城、运河等古代劳动人民的重大劳动成果，也列入小丛书的选题。

这套小丛书的編写目的是为丰富青少年和一般具有高小、初中文化水平的讀者的历史知識，帮助他們学习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正确地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而受到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小丛书的选题和編写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一）人物傳記与历史事件并重，可分别写也可結合起来写，要求在思想內容方面，立場、观点、方法正确；在艺术性方面，表現形式适合青少年閱讀，文字技巧要生动活潑，每本书的字数在一万到一万五千左右。（二）按照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精神，选擇历史上有定評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人物和事件作为編写对象，古与今、人物与事件，都有一定的比例。

小丛书的全部編写工作，是在党的关怀下，由北京市部分历史科学工作者組成的編委会的具体領导下进行的，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同志任主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室負責具体組織工作，北京市五十个中学的历史、語文、政治、地理、美术等各科教师参加了編写工作，并得到各校党政領导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在全部編写工作过程中，認真貫彻了党的領导和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并发揮了集体协作的精神。各冊內容都有較强的科学性和思想性，文字淺显，图文并茂，适合中学生課外閱讀，对中小学的文史教学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小丛书第一輯已編写完成。已出版的有“屈原”、“李冰和都江堰”、“陈胜吳广”、“范縝”、“三大发明”、“文天祥”、“清代苗民起义”、“秋瑾”、“詹天佑”、“二七运动”、“韦拔群”、“赵一曼”、“平西游击战”等十九种，正在排印即将出版的有“賈思勰和齐民要术”、“李时珍”，“林則徐”和“南昌起义”等十余种。小丛书的編委会計划在国庆十周年以前至少出版五十种，作为献礼。

（張习孔）



图 五



图 六



图 七



图 八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毛澤东主席在天安門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革命的偉大胜利和新中国的誕生，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發展軌道，而且使世界和平民主陣营与世界侵略陣营的力量对比發生了根本的变化。〔**图五**〕毛澤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图六**〕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向人民解放軍全体指战員發布命令；〔**图七**〕毛澤东主席在天安門前亲手升起了第一面国旗；〔**图八**〕参加开国大典的国际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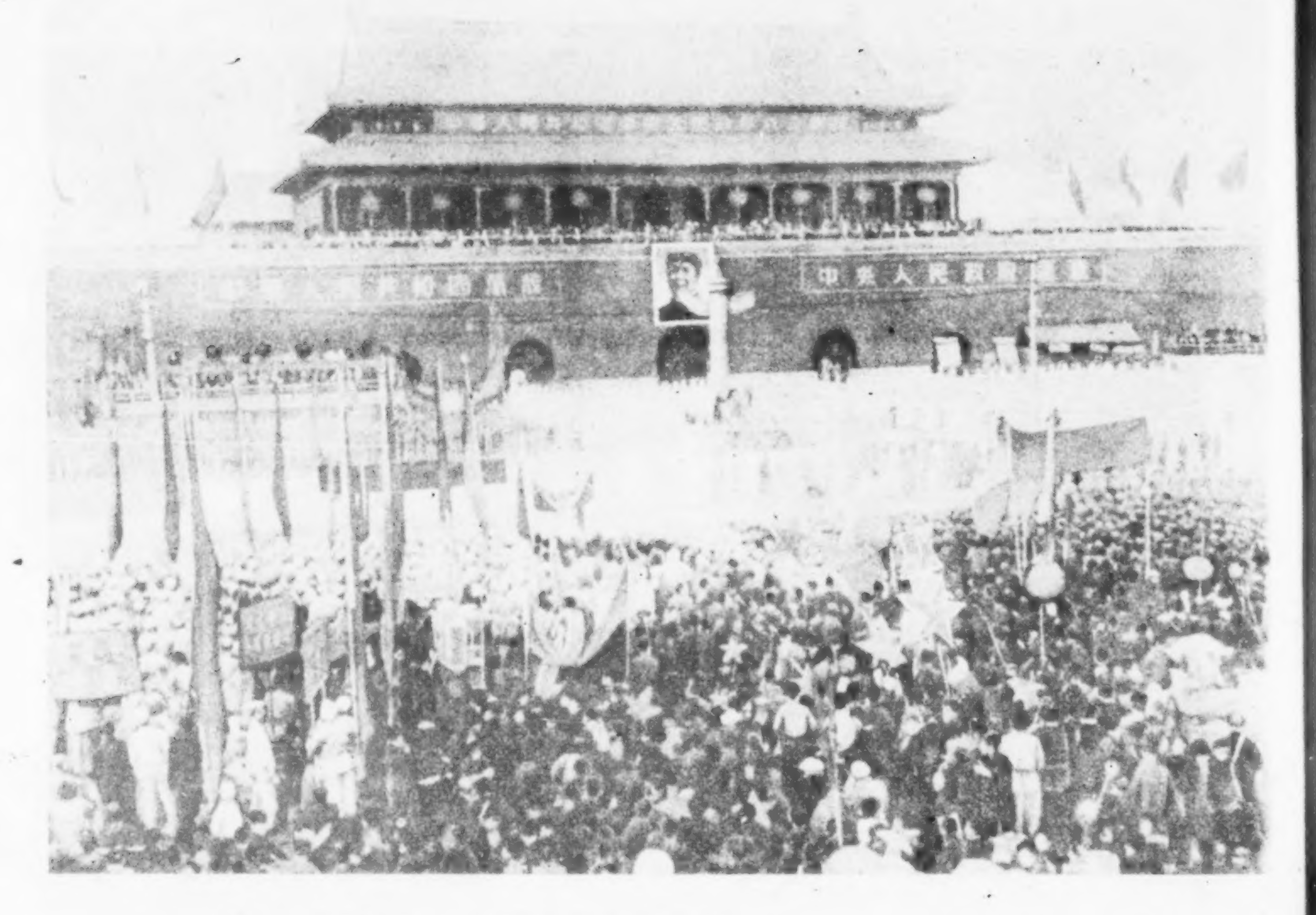


图　九　在天安門广場上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人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府背叛祖國，勾結帝國主義，發動反革命戰爭以來，全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況之中。幸賴我人民解放軍在全國人民援助之下，為保衛祖國的領土主權，為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爭取人民的權利，奮不顧身，英勇作戰，得以消滅反動軍隊，推翻國民政府的反動統治。現在人民解放戰爭業已取得基本的勝利，全國大多數人民業已獲得解放。在此基礎之上，由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業已集會，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了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為副主席，陳毅、賀龍、李立三、林伯渠、葉劍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吳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聶榮臻、周恩來、董必武、賽福鼎、陳嘉庚、羅榮桓、鄧子恢、烏蘭夫、徐特立、蔡暢、劉格平、馬寅初、陳雲、康生、林楓、馬敘倫、郭沫若、張雲逸、鄧小平、高崇民、沈鈞儒、沈雁冰、陳叔通、司徒美堂、李錫九、黃炎培、蔡廷鍇、習仲勛、彭澤民、張治中、傅作義、李燭塵、李章達、章伯鈞、程潛、張奚若、陳銘樞、譚平山、張難先、柳亞子、龍雲為委員，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決定北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於本日在首都就職，一致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互選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項政府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同時決議：向各國政府宣布，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特此公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图　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本刊代号: 6-